

目 录

回 忆 录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

-阿沛·阿旺晋美（1）
- 接管北平财经工作的回忆.....戎子和（18）
-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刘景范（47）
- 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金城（72）

专 题 资 料

党领导下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95）
- 满洲省委概述.....韩志峰 王家德（127）

人 物 介 绍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潘汉年.....刘昌亮（151）

大事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记述

.....晋察冀大事记编写组 (170)

小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籍贯概览.....李 伟 (242)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

阿沛·阿旺晋美

编者按：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晋美等五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举行谈判。经过多次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现将阿沛·阿旺晋美对这次谈判经历的回顾摘要发表如下。

(一)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象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后来，见到邓小平，他给我讲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讲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十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及进军的基础。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我对解放

军的信任程度。

在重庆停留期间，组织我们参观重庆钢铁厂。过去，西藏根本没有工业，连小型的工厂也没有。在这里参观工厂，简直是大开眼界。我们由阿乐部长陪同，平旺担任翻译，到了钢铁厂，参观结束后，工厂领导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广场上，要求我给工人讲讲话。天哪，真叫我作难！我从来没有当众作过演说，况且，对工人情况又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话呢？讲什么好呢？我实在讲不好，一再谢绝。可是，工厂又一再坚持，非要我讲几句不可。阿乐部长在一旁排解这个难堪的场面，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尽管讲，我给当翻译。”我当时发愣了。他根本不会藏语，怎么译语呢？翻译平旺就在身旁，是怎么回事？阿乐见我不解其意，便小声通过平旺对我说：“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熟悉工人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就不必担心啦！”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工人听了不断引起欢笑，代表团的藏族也在笑。工人以为我这位藏族上层居然把话说到他们心窝里了；藏族听了，笑我信口开河，也很开心。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从重庆乘机北上。金中坐在我后面，见机组人员来来往往走动，他现出惊惶紧张的样子，恐慌地说：“好危险啊。”

我立刻斥责他：“出了事大家都一样，你紧张有什么

用。”

当天风大，飞机只好在西安降落。这时，金中从舷窗里看见机场站着一位穿袈裟、胡须银白的老人，问才旦卓嘎：“夫人，那人是谁？才旦卓嘎一眼认出：“啊，是阿沛的老师。”

飞机停下后，我第一个走下来。这时，喜饶嘉错迎上来，喊着我的名字，一个劲地问我饭吃得怎样？觉睡得如何？又夸我身体好，精神好。接着，又转过脸去问阿沛，才旦卓嘎有几个孩子啦，长得怎样？一席家常话，轻松愉快，顿觉心里暖乎乎的。我从他的谈吐、表情上，也感受到，在新制度下，他现在的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

我同喜饶嘉错老师分别多年，这回见了面，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由于语言相通，倍感亲切温暖。1949年，西藏还没解放时，他曾对西藏发表不少广播讲话，号召和平解放西藏。他回忆这些说：“我为什么要讲那些话？我不是站在汉人一边讲那些话的，更不是随便站在汉人立场说那些话。我是为西藏的宗教利益。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不负责任的随便说说。”他不无伤感地说：“西藏没解放前，我回去过，但只到黑河，藏政府不让我到拉萨去，我吃了许多苦头。他们这种做法太不应该了。”

西安的一些领导宴请我们代表团，喜饶嘉错也应邀参加。他很自豪地指着我说，向汪锋等人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当了很大的官，是噶厦的噶伦，现在是西藏和平谈判代表，这也是我的光荣！”

喜饶嘉错是我信任的老师。他对我讲了许多为什么要

解放西藏的道理，对我帮助很大。同时，也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动。到车站欢迎的人很多，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有位名叫却鲁拉的，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他是汉人，在国民党时期，就在拉萨。他的藏汉文都很好，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也属于喜饶嘉错的徒弟之列。我原先在拉萨就听说过，但未见其人。后来他经印度跑到国内找国民党，在蒙藏委员会谋得一个头衔，又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解放后，筹办“民族出版社”时，他参加筹备工作。在北京车站欢迎我们时，他在人群中利用一个机会和我搭讪，自我介绍说：“我叫却给鲁珠。”因过去知道这个人，一说就对上号了。才旦卓嘎与我同行。这个人从人缝里挤到她身旁，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弄得才旦卓嘎很吃惊，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当着那么多欢迎的群众，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只好很难为情地接过来，一直捏在手里。到了下榻的北京饭店，才旦卓嘎才告诉我，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叫转给我。我接过这张用藏文写的纸条，内容是：“你不要看共产党表面一团和气，但他们是一伙老谋深算的人。这次谈判一定要小心警惕，再就是翻译很重要，如果选用不合适的人，翻译有误，会造成很大麻烦，一定要找个好翻译。为此，我可以给你们当翻译。总之，一要警惕，二要有好翻译。”我看过这张纸条想：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插足谈判。这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

以，我没有再理他。

接着，我们代表团中的路经印度的代表凯墨和土丹旦达到北京。凯墨早先在拉萨就认识却鲁拉。二次世界大战时，凯墨是“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在南京开会时就见过却鲁拉，以后他们相处亲密如家人。凯墨一到北京，却鲁拉认为好机会到了，马上去拜访，提出给代表团当翻译，说：“我一定能忠实地传达你们的意见，不会发生错误。”后来，凯墨找我，说有位很要好的朋友，要求当和平谈判的翻译，问找过我没有？我把他塞条子的事说了一遍，并说明不同意他当翻译的理由。凯墨也说：“尽管我们关系很好，但让他当翻译，我也不同意。”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翻译确实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有个彭措扎西作翻译，尽管会汉语，但却讲的是青海西宁一带的藏话，我的话，他可以听懂一点，他的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们代表团自己带的翻译尧西·彭措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姐夫，他的藏、汉语都不行。所以，大部分翻译工作都是由平旺担任。

(二)

代表团到北京后，朱总司令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五一”节在天安门上，我头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他们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我们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问寒

问暖，接待也很热情周到。我想，这实际上就是谈判的开始吧。

我们经陆路来的代表和经印度来的代表碰了一次头。他们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文件。我们在昌都时，曾拿到西南军区制定的十条，并且仔细地研究过，基本同意以这十条作为谈判的基础，打算在这些条条上作些改动定下来，变成谈判的协议。但是，和他们带来内部掌握的条件相比，两者的距离太大了。从噶厦的公开文件看，主要条件：一是表面上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实行独立自主；二是不要向边境派遣武装部队；三是和平谈判时，要有中立国（指印度）参加。其基本想法可能是，还按袁世凯时期的老办法。那时（1913年10月13日）曾经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过中国、西藏、还有英国参加的三方会议，就是这次会议，产生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次，他们还想如法炮制。内部掌握的精神是，如因中间国事影响谈判的基本条款时，可以放弃。问题是要坚持不准派解放军到西藏边防这一条，另外还坚持中央派代表只许派文官，而且在不多的随员中，还必须是信教的！这就更离奇了。共产党里面到哪里去找信教的？

在昌都时，王其梅对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十条作过认真的解释。当时，我觉得这些条件很全面，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稍加修改就行了。现在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一是不让向边境派部队，如果一定要派，应把藏军改作解放军的名义派出去，实际上是让藏军守边防。不让

解放军进西藏；二是派出驻藏代表，其随员只能带15人，不准带警卫。如果需要警卫，可从藏军里派出。这与十条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时，我发现经印度来的代表与从陆路来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了难以相处的局面。这样，我只好把准备谈判的根本任务暂时放下来，首先帮他们解除思想疑虑。我们同经印度来的两名代表和两位工作人员彭措扎西和桑多仁钦在一起，说是开会，实际是个形式，主要向他们介绍内地情况。我们从昌都来的，因与解放军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亲身体察过党的政策，对一些情况比较了解；而经印度来的代表，满脑子灌的是谣言，对情况不了解。这就有个向他们谈情况、统一思想认识，增加代表间的互相信任的问题。因此，先做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一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在谈判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我们内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协议条款本身，而在于对共产党的认识。因此，我没有单独就协议条款统一认识，从他们带来的噶厦为谈判而制定的内部掌握条件来看，没有谈判基础。要否定它，就要有个统一的态度，对中央、对噶厦都要有个一致的态度，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顾虑，肃清他们脑子里的谣言。我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颇和土登列门也介绍了在昌都亲眼看到

的情况。总之，通过这些去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

金中当时是下级官员，很有勇气，也跟他们讲了解放后的亲身感受，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我是首席代表，他们对我讲的事是真是假有些怀疑，所以在私下里询问金中。和我同路的桑颇比较年轻，思想开阔，接受新事物较快。他也做了不少解释和勉励的工作。总之，谈判前主要是统一代表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在五位代表中，有两位同我是亲戚关系，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还有一位与我关系也好。桑颇的奶奶同我母亲是亲姊妹，我是他表叔；凯墨的父亲同我祖母是亲姐弟，他是我舅舅。凯墨的夫人和桑颇的母亲又是亲姊妹。这样，我进行工作很方便，桑颇也好做工作。我和土丹旦达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我们俩曾在一起负责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在拉萨建造住宅。他当时是孜准，我是协邦，我们前后合作共事有四年时间。所以，我和他关系很近，说话也比较方便。我和土登列门关系不亲不疏，通过在昌都一段时间的相处，关系还好，也能谈得来。因此，我同他们之间商谈协议条款，认识比较容易接近。我同凯墨个别谈过必须同意往边境派驻解放军的道理，否则，就无法进行谈判；而要同解放军合作，就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样，凯墨没有什么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

代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一致以后，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你向噶厦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

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况且电报一来一往说不清楚，反而使问题拖延不决，无头无尾，更加复杂化。所以，整个谈判，只在班禅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直到和平协议签字以后，才由几位代表经印度返回亚东作口头汇报。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双方代表开始谈判。通过交换意见，酝酿讨论，我们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再就是，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我们还认为，象这样的意见，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我作为全权代表可以接受，但是，中央必须给我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就是：我们代表可以接受在协议上签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就在西藏呆不下去。我们的意见，应当允许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观察西藏的变化和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他对西藏解放后的情况了解了，疑虑消除了，愿意回来时，应准许他返回，并维持原来的地位和权利不变。我们提出把这一条列入协议。后经中央反复讨论，不同意写进协议；但可以形成一个附件，双方各执一份，对外不宣布，同样起作用。附件有七条，主要内容是，亚东噶厦如果不同意这个协议，达赖喇嘛可以到印度

住几年，研究一下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愿意返回西藏时可以回来，不降低他原来的地位和权利。这样，双方谈判取得了一致意见，协议也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估计亚东噶厦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也就没和他们联系。

(三)

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这是谈判中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历史上，噶厦与札什伦布寺之间发生不和，积怨很深。九世班禅跑到内地向国民党告状，以后，班禅从内地派人回过西藏，达赖喇嘛也派人到过内地，双方发生过联系，但结起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十三世达赖逝世，关系才有所改善。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给班禅写过信，意思是达赖已逝世，希望他回去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这是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规矩。很多年以来，找达赖灵童时，班禅负责；找班禅灵童时，由达赖负责。九世班禅接信后，确实由内地动身返藏了，大概在1937年或1938年间。他带有国民党500人的军队和自己的警卫部队，到了青海的玉树。噶厦提出不能带国民党部队进藏，后来班禅从玉树到囊谦，在热喜龙须寺住下来，双方又经多次交涉，都没有商量妥。最后，九世班禅死在玉树。这就把事情完全闹翻了，隔阂随之又加深一层。札什伦布寺与噶厦之间

的怨恨，有清朝留下的问题，有英国留下的问题，问题越积越多，怨恨积得更深。因此，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西藏代表根本不能接受。我们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的问题与此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先碰到班禅到北京，中央要我们代表团去车站欢迎，当时我们不准备去，并且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去。后来中央劝说我们，这是关系到搞好西藏内部团结的大事情，你们应该去，我们几个商量后，认为完全不去不行。于是便决定派代表团中名次最末的桑颇一人去车站欢迎，其他都没和班禅见面。

讨论班禅问题时，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炽烈起来。本来，我们与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谈判中一同交换意见，相互访问，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地发生了。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次到北京是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拉章^①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我们坚持它

^① 拉章，本意为大活佛的居室，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拉章都是活佛的管理财产和处理事宜的办事机构。因经济力量的不同，其势力大小是很悬殊的。

与协议无关，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双方坚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次，双方代表团在一起开会，中央代表团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我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推说地方政府只交代我们和谈问题，根本没交代我们谈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最后，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如不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我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四个代表从哪里来，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留在这里也行。”

这样，在一个星期内，谈判面临决裂，已达成的协议也面临被推倒的局面，代表团内部，也作好了回去的准备。我们铁心了。把札什伦布拉章的事掺在协议里，我们坚决不干！

一天下午，孙志远打电话来，问明天上午九点与我会晤行不行？我说行，我就是来谈判的，怎么不行？

第二天，孙志远准时到了北京饭店。我们俩个单独进行会谈，由平旺作翻译。孙志远仍坚持中央代表团的意见，他说：“中央和西藏方面的大事都已经谈通了，解决了，剩下札什伦布拉章问题是西藏内部问题，还没解决。这是件小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就统一不了？”我说：“是大事也罢，小事也罢，这不用你作解释，我们清楚。”

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谈判的必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协议签字，那就不要谈了。”我们不承认有这个问题，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

我们从九点谈到中午，三个人吃了饭又继续谈。孙志远还是继续解释，我就从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一直讲到下午五六点钟，最后，孙志远说了一句：“你看这样办行不行？是不是在协议里写上这样的内容？即：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这一句话打破了多天的谈判僵局，我想了一会，说：“单是这样写是可以的！”为什么同意这样写呢？从五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札什伦布拉章关系非常和好。这是历史事实，没有理由不同意。问题是到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地方政府欺侮过札什伦布拉章，札什伦布拉章也欺侮过西藏地方政府，矛盾是这样产生的。我把孙志远的这个意思和我个人的想法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承认了这一条。第二天重新开会时，就把它定下来了。因为这一条关系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请示。我在西藏铁兔年四月十二日给亚东噶厦发了报，电报大意是：“有关汉藏谈判出现了在昌都的汉官和驻新德里的袁大使均未提及的新问题，即班禅灵童问题……这里不可能通过书信把每一

个重要原则的细节报告清楚，我们经过商量，为了执掌政教者未来少受损害，我们忠实、慎重的想尽一切办法，打算尽快的解决……”四月十五日，我再次给亚东噶厦发电报：“共产党政府已决定承认班禅灵童，如果我们不承认，谈判就要破裂。因事关重大，我们已经决定承认，尊重班禅灵童本人和他固有的地位及一切。”

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亚东噶厦四月十九日复电说：“……汉藏和谈进展情况，希作进一步说明，以免悬念，因为事关重大，要经常发来毫不含糊的请示电报，是为至要。班禅灵童问题，札什伦布寺四个堪布与堪厅官员联席会议，竭力要求达赖喇嘛认定，此次汉方坚持要求认定班禅，我们驻阁驻外的也一致同意。”

至此，所有的问题都统一了。这场谈判也就顺利地结束了。双方立即在协议上签了字。

(四)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标志着藏汉民族团结关系的增强，同时，西藏人民也从此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协议签字后，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西藏代表团，他讲了很多话，他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我

听了后很受感动。我想：既然签订了协议，我一定做出最大的努力，使协议能够贯彻执行。我很乐观，协议一定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好处。协议签字后，土丹旦达对我说：“这下，达赖喇嘛肯定要出去了。”早在协议签订之前，对于达赖喇嘛可能出走，我已有所估计。现在我们已经离开拉萨一年多了，对西藏的情况不太清楚。但是，无论西藏发生了什么变化，即使达赖喇嘛真的出走了，协议既已签字，就必须贯彻执行，我义不容辞地要担负起执行协议的责任，这是历史赋予我的重大使命。贯彻执行协议，我是铁了心的。

代表团仍分两路，桑颇、凯墨、土丹旦达等经印度返西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作口头汇报；我同土登列门、金中等，由张国华陪同返藏。我们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时，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亲自在机场至市区途中举行仪式迎接。离市很远就是夹道欢迎的人群，手捧鲜花，载歌载舞，非常隆重，好象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这场面使人心情十分激动。

这期间，邓小平政委找我谈过多次话。主要讲协议签订了，部队要进藏，供给虽由中央负责，但由于交通不便，请西藏地方政府要进行帮助。今后，西藏的工作，中央交代要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这样，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如果我们或进藏部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直接向中央讲也可以，不要放在心里，要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同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李觉一起到昌都后，

进藏部队的先遣队已经组成。于是，我便随同先遣部队向西藏进发。我们同行的有金中、平旺和王其梅、陈竞波、林亮等，在洛隆宗遇见顾草萍等。我这时心情十分焦急，总希望部队走快些，再快些，早一天赶到拉萨，因为我担心达赖喇嘛会逃出西藏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贵族、官员会跟着逃走，那时拉萨成了个空城，如果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哪里，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混乱局面，形势便会陡转直下，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甚至还可能发生骚乱。基于这个想法，我把部队进拉萨看得特别重要。

在行军中，我看到部队缺粮等艰苦情况，我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早一些赶到拉萨。拉萨还有两位司曹，这样就能与噶厦接上头，一可维持社会治安，二可保证协议的执行。如果部队不能按时赶到，拉萨的贵族官员外逃不说，地面上再出点事，不仅不好执行协议，连个落脚处也没有。总之，协议是我签订的，我必须负责实现它，我有多大力量，都要全部使出来。

路上，部队的给养问题非常突出。王其梅对部队吃的问题很焦急。他担心由于交通困难，后面粮食运不到，部队携带的粮食难以为继，缺了粮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我的溪卡就在工布江达，到那里粮食不成问题，部队到拉萨的粮食供应由我完全负责。

我当即打发人先走，交代到工布江达后，尽量多运些面粉到嘉黎接济部队。我知道，嘉黎距工布江达有四天路程，道路艰险，运输十分困难。但我家有牲畜运输。赶巧，部队到了嘉黎确实断了粮，而从工布江达运到的四五

十驮面粉，解决了部队断粮的燃眉之急。后来，到了工布江达，我家里有的是粮食，只要能带动，就尽力携带。

一路上，我提前派人通知沿途地方为部队准备柴草。尤其是要进入荒凉贫穷的地区时，我很不放心，怕派去的人准备不好，影响部队行程。我便提前走一天，从边坝走到阿拉多住一夜。第二天，没翻鲁公拉山前，在一个马站，我见马草不好，便翻山到了阿拉加贡，草还是不丰富，其他条件也不行，虽然当地已经准备了，但还是不行。我考虑部队没法生活，中午便前往夏曲卡住下。等一天不见部队，等两天部队还没赶到，我心里急了。第三天，王其梅才率部队赶到。他见了我高兴得前仰后合，本来说在山那边等他们，结果往前赶了两天路，引起一场笑话和误会：他们还以为我溜跑了哩！

这时，噶厦派仁希多德赶到嘉黎，还带给我一本密码。我这才知道张经武代表和阿乐部长经印度已到达拉萨。达赖喇嘛一行与亚东噶厦也回到了拉萨，我悬在空档的心才放到实处。

接管北平财经工作的回忆

戎子和

1948年9月底，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我任财政部长。

1948年12月13日，接到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话，要我马上去他那里，有要事相谈。我立即前往。一波对我说：

“东北野战军大部已入关，华北野战军亦向平津靠拢，平、津很快就要解放。中央已任命彭真同志为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同志为副书记，叶剑英同志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并指派你跟随叶剑英同志负责接管北平财经工作。任务紧迫，今天就走。先到石家庄，剑英同志在那里等你。至于你这次去北平的具体任务如何，从石家庄怎样走法，剑英同志在石家庄有安排，会告诉你。”我回到华北财政部，立即找到刚从北平撤出来的地下党员刘正言（现任财政部办公室秘书）和两个警卫员随我前去当天到了石家庄。

我们到石家庄已是深夜了。住在市政府招待所。第二天早晨，叶剑英因有其他要事，派北平军管会、市委秘书长韩钧见我，传达剑英的指示，说：“时间很紧，给你们一辆卡车，今天就走，先到保定。工作任务、组织机构、人事等等，到那里后再说。”我们当天傍晚出发。因为平汉

铁路线保定以南一段破坏严重，又为了防敌机轰炸，绕道唐县去保定。15日黄昏到达保定，住在一个监狱的大院里。翌日一早，我去见叶剑英、彭真，话没多谈，当日继续北上，到达涿县。在涿县住了两三天。这时剑英才把接管北平的机构、人选的安排轮廓告诉了我。军管会下设三个部门：一是北平市政府，副市长是徐冰，秘书长和各局长还没有定，他们主要接管旧市政府，组成我们的新市政府；二是物资接管委员会，由叶兼主任，苏井观和我为副主任，负责接管市政府外的其他一切军政机关、财经公共事业、银行等部门；三是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是钱俊瑞，沙可夫为副主任，负责接管学校、图书馆、文化设施等单位。剑英还说：“物资接管工作包括内容很多、很复杂，你是搞财经工作的，主要靠你多做些工作。”我问他物资接管委员会的组织下属机构和干部配备是否已经定了，他说：“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以后再商量”。

时间紧迫。听说傅作义正在收缩兵力，北平四郊的通县、黄村、丰台、长辛店、门头沟、石景山、昌平等重要地点已全部解放，我们需要赶快北上进驻长辛店，开展工作。到长辛店后，正碰上傅作义部队反攻南苑机场，炮声隆隆，这里不安全，住了一天，18日即退驻良乡县城。物资接管委员会驻在县城西南角一个大户的院子里。在这里，立即开始工作。

一、配备干部，正式成立物资接管委员会

到良乡后，中央、华北局从各地区调派的干部已经陆续报到。截止12月底，约到1000余人。到1949年1月底，

已近2800人。干部的来源，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调来的，大多数是领导干部；二是从华北机关和冀中、北岳、冀南来的，其中除部分是领导干部外，大多数是中下层骨干；三是华北局城工部刘仁从平、津动员来的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熟悉城市，了解平津情况。

物资接管委员会经过军管会批准，正式成立。委员名单，除叶、苏、戎三人外，还有王净、刘建章、童陆生、徐驰、张云天、赵介、韩克宁、石金奎、程宏毅、赵子尚、李公侠。物资接管委员会下设五个部，部下又分设若干处。（1）财经接管部，部长由我兼，下面有财政接管处，处长赵子尚，副处长彭涛；金融接管处，处长张云天，副处长贾星五、殷玉昆、秦炎；企业接管处，处长徐驰；贸易接管处和城市供应指导处，处长赵介，副处长彭城、石金奎；农林水利接管处，处长陈凤桐；后勤接管处（后改为接管部），处长韩克宁，副处长霍嘉霖、邱一适。（2）交通接管部，部长王净，副部长刘建章，下面有铁道处，处长刘建章（兼），副处长鲁文；交通接管处，处长马奔；电讯接管处（后改为接管部），处长王净（兼），副处长王子纲；邮政接管处，处长成安玉。（3）卫生接管部，部长苏井观（兼）、副部长殷希彭、鲍敬恒，下设医院接管处，防疫接管处，制药厂接管处，市属医校接管处。（4）军政接管部，部长童陆生，下设军校接管处（军校、营房等），司法接管处（法院、监狱等），军政机关接管处（上述两个部所设处的人选，我都记不起

了)。(5) 房地产接管部, 副部长马溪山, 下面有房地产接管处, 处长马溪山(兼); 工商企业接管处, 处长张通。物资接管委员会本部设秘书、人事两处, 负责人有刘正言、李成瑞和冀克等同志。

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整顿接管干部队伍

我们的干部队伍庞大, 来自四面八方, 工作经历不同, 思想水平不一, 特别是绝大多数人对接管城市工作没有经验, 不大了解党的城市政策, 有不少人甚至从未进入过大城市, 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常识都不懂。不经过教育整顿, 很难完成任务。可能还要出大差错。因此, 军管会的领导要求对干部进行深入的政策教育、时事教育和纪律教育, 还要讲一些城市生活常识。思想统一, 步调一致, 才能很好地完成接管任务。

在政策教育方面, 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1948年12月23日布告《约法八章》。八章就是党的八项城市接管政策, 不但被接管的旧机构人员要遵守, 我们接管人员更要模范地遵守。叶剑英、彭真等领导同志多次向大家做报告, 讲解八项接管政策, 反复说明道理。使大家明白, 我们是代表党和人民去接收城市、管理城市的, 不仅要懂得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 还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管与国民党的“劫收”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接管好大城市的。

在时事教育方面, 主要学习新华通讯社播发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要求

大家充分理解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已经面临着全面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政权，着手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人民政权。我们对北平的接管就是这个新天地的开端，要求大家满怀革命热情去完成这个任务。

在纪律教育方面，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军管会的入城守则。要求大家坚决做到“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一针一线，不动一草一木，模范地遵守纪律。对一些农村来的干部和战士，请来自城市的同志向他们介绍一些城市生活常识，电灯、电话、电车、电梯，交通规则，文明礼貌等诸般生活琐事，使他们思想有准备，很快适应。不闹笑话，不出“洋相”。

在我们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之后，又特别进行了一次和平接管的教育。因为和平解放与战争解放不同，对方是起义，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了，已成为一家人，是主动的移交，和平的接收。因此态度要和蔼，避免盛气凌人。事实证明，以上这些教育，对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思想保证作用。

三、调查研究接管对象，进行接管准备

首先是调查研究接管对象，有多少个单位，隶属关系如何，在什么地方，主管单位负责任的人是谁，以及人员、设备、物资等情况。资料来源，主要依靠地下党组织提供，还有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电话簿等。地下党组织力量特别强的电信局，曾把该局的情况和处以上人员的名单、简历都整理出来送到良乡。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按照

政策界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仔细审查，确定应否接管，归谁接管，并汇编成册，共计1061个单位，印发各接管部、处，据以核实接管。

与此同时，我们着手对已解放的郊区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仓库进行接管，为进城接管取得经验。这也是一种准备。北平的一些大企业多数在郊区，比如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门头沟煤矿、琉璃河水泥厂、清河制呢厂、长辛店铁路大厂、丰台仓库、西郊农业试验场、黄村、双桥电台等，都是在1948年12月下旬陆续派人接管的。北平郊区是打下来的，是战争接管。12月15日郊区解放时，我们还没有来，暂由部队和解放区的地方政府派人接管。我们的人员一到良乡，就派出铁道、邮电、企业、农业接管处去接管。实际上他们是边接管、边学习、边总结经验。在郊区接管中顺藤摸瓜，了解集聚了许多城内的情况资料。这一段工作对后来进城接管起了良好的先验作用。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调集粮煤油盐，保证生活供应。我们物资接管工作的任务是：一面接管，一面注意组织人民生活供应。估计到北平城被围已久，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市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彭真、叶剑英一再指示，要及早准备调集粮煤油盐，供应市场，平抑物价，解救城市人民的生活困苦。因此，我们特意成立了“城市供应指导处”，负责这项工作。并报经华北人民政府同意，确定从华北农村征收的粮油中，调集一部分粮食和食油，从门头沟调集一部分煤炭，准备进城供应，大约够全市200万人将近一个月的生活需要。为了配合市场供应，还准备了7

亿元人民币，以兑换收回国民党发行的已大大贬值的金圆券，使人民币迅速占领金融市场。

为此，赵介、彭城等一到良乡报到，就接受任务立即去张家口、冀中催调粮油；同时要求徐驰同志负责，迅速恢复门头沟煤矿生产，供应煤炭。在华北解放区各地方政府和门头沟等地职工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都如期完成了任务。我们接管门头沟煤矿后，第一件事就是发给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借支工薪，解决手头急需。这样一来就博得人人高兴，个个欢喜。有的职工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说“人民政府为人民，说到做到，我们只有加劲生产，多出煤炭才能对得起共产党。”

四、参加和平谈判，组织和平接管

我们在良乡驻了整整一个月，过了1949年元旦，因为与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接近成功，市委、军管会即于1月18日转移到北平西郊青龙桥。物资接管委员会驻在四亩村的程砚秋先生别墅里，所属接管部、处大部分同志仍留在良乡。

1月19日，剑英告诉我说：“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话叫你和徐冰去通县司令部，参加同傅作义方面的谈判。”我和徐冰立即驱车绕道沙河，第二天黎明到了通县。早上见到林彪以及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等（当时聂荣臻因事外出，未在场）。这时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剩下的就是签字了。林彪说，现在决定派陶铸、徐冰、戎子和三人为我方代表进城，任务是一面促成傅方签字，一面同傅方协商具体交接方式和办法。罗荣桓接着讲：我们

的方针是，原则问题不让步，军队要整编，接管要彻底，但方法可以灵活。和平接管和战争接管不同，对傅方应当客气一些，尊重他们。

我们三人随即由傅方代表周北峰先生带领，并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王越周护送，于20日从通县出发，经朝阳门进入北平城（负责前一阶段谈判的苏静已先随邓宝珊将军进城），住在御河桥傅方的贵宾招待所，受到了傅作义将军的热情接待，并于当晚设宴欢迎。我方代表进北平本来是秘密的，不知何故，消息传了出去，驻在御河桥北对面的国民党空军俱乐部的人员夜里捣乱，向我们驻地大放手枪、步枪、机枪，傅作义怕危害我们，特加派一个营的兵力把守宾馆四周。21日，协议14条签字，随后即商谈交接事宜。双方几经协商，决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由我方代表四人（叶剑英、陶铸、徐冰和我），傅方代表三人（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共七人组成，叶任主任，郭宗汾为副主任，负责处理双方和平交接事项。协议成立后，剑英于1月29日在颐和园景福阁设茶点，召集两方代表开会，宣布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办事处的办公地点就在御河桥傅方的贵宾招待所。至此，和平谈判任务全部完成。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按照协议从西直门开入闻名中外的古都——北平，和平解放成功。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叶剑英为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物资接管委员会于2月2日入城，先驻在刑部街的北平最高法院，后搬至东单黄兽医胡同河北省参议会旧址（原曹汝霖的公馆）。和平接管正式开始。

五、繁忙的工作，顺利的接管

物资接管委员会所要接管的范围很广，除了北平市政府和文化教育单位之外，都归我们接管。其中包括军政机关、后勤补给、工矿企业、交通邮电、商店银行、房产仓库、部分医院以及这些单位的人员档案、物资帐簿等等。不仅要接管，还要清点、处理。同时，中央还要求我们在接管的同时，立即恢复生产，组织市场供应，保证北平市200万人民的生活，真正从国民党专制压榨下的困苦中解救出来。任务十分艰巨。整个接管期间，特别是2月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吃，觉也睡不足。经常是每天晚上开会、听各接管部、处汇报情况，研究问题，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上午8时到军管会（崇文门内德国饭店）向叶剑英主任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再传达给有关同志；下午去联合办事处开会，商谈问题，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下面接管部、处领导人也非常忙，白天工作，晚上汇报，汇报中有好多事关系到政策，都要认真对待，不敢有丝毫马虎。所幸当时大家都处于青壮年时期，精力充沛，热情高，虽然苦一点，紧张一点，仍然精神饱满，坚持不懈，完成了任务。

接管工作虽然很忙，但做起来却比较顺利。今天回想起来原因有三：一是和平接管的确不同于战争接管，有对方的合作，总是比较好办的；二是叶剑英、彭真等领导抓得紧，使我们能及时得到指示，政策掌握较稳；三是物资接管委员会所属部、处的领导干部配备得比较强，比如王

净、童陆生、刘建章、徐驰、陈凤桐、王子纲、成安玉、赵子尚、韩克宁等，不但政治、政策水平高，而且业务工作能力也很强，所带来的骨干大多数都是从事本部门工作多年的业务尖子、技术能手，他们工作深入、细致，所提出的意见措施能使被接管单位的人员心悦诚服，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工作起来自然会顺利的。

物资接管委员会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接交阶段，清点阶段，人员、物资处理阶段。从2月接管到5月底处理完毕，共四个月。

1. 接交阶段。我们从2月1日进点联系接管，到2月20日为止，基本上接收完毕。

接交的办法，一是实行军代表制。由我们向联合办事处提出被接管的单位和军代表名单，经同意后，军代表以军管会的身份进驻被接管单位，宣布接管开始。军代表的任务是宣布与执行政策，接管与掌握物资、人员、档案，管理生产、业务，组织职工学习，处理人员、物资。军代表下设联络员协助工作，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军代表必须严格按政策办事，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理人员、物资。

二是自上而下按系统接交的办法。这是过去接管其他城市和北平郊区已经证明了的好经验。我们的接管，不但打乱原单位的系统，而且还要利用这个系统，先接管首脑机关，找到它的负责人，请他先行清交全系统的人员、物资、档案。比如企业接管处长、军代表徐驰一进城，先找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就顺利地接管了所属

八个大的厂矿企业；军政接管部长、军代表童陆生接管伪河北省政府，找到了省主席楚溪春，就推动了下属几十个单位、几千人的接管；邮电接管部长、军代表王净、王子纲接管国民党第七区电信管理局，找到了局长聂传儒，就顺利地接管了所属北平电信局等十几个单位。当然，也有未按系统，而是拆散开来接管的，比如联勤第五补给区，是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后勤总部，机构庞大，人员很多，我们把其中的军医院交卫生接管部接管，电讯系统交邮电接管部接管，军工厂交企业接管处接管，等等。有人把自上而下按系统接管的办法说成是“原封不动”，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们只是在接管初期，为了有条不紊地顺利交接，才采取不打乱原系统的办法，实际上接了以后还是要整顿改造这些机构系统的。特别是那些军政机构，在接管之后，必须彻底改造或者完全撤销（比如法院、警察局、省、市政府机关等），重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人民政权机构。我们在接管了北平国税局之后，没有注意及时改造为新的人民税局，用原税局的人去收税，就遭到了屠宰场的职工抵制。他们说：解放了，你还有资格收税吗？我不认识你，不给。这就充分说明，和平接管也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能是“原封不动”。

三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接交。对于那些属于国民党政权的军政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公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民党的战争罪犯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他们非法侵占的敌伪财产，要严格清查接管。对于私人工商业和外国人的财产严加保护，不受侵犯。对于私营企业中

应接管的股份，要据实上报军管会，听候处理。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厂长、经理已逃跑，企业无人管理者，暂行代管。经过认真地发动市民、职工群众查对核实，在我们准备接管的1061个单位中，查无对象的279个，经查实属于私人产权不应接管的51个，因故暂不接管者（待查、缓办）97个，新增接管单位231个，实际接管的共865个。

综计物资接管委员会接管的主要单位：

国民党军政机关有：河北省政府和保安司令部，热河省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联勤第五补给区司令部，平津区敌伪产财处理局，冀热区国税管理局，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和空军第四大队，太原绥署驻平办事处，河北省营房管理处，励志社驻平俱乐部；

工业方面有：冀北电力公司及其所属石景山发电厂，华北钢铁公司及其所属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中英、西山、城子三大煤矿，华北水泥公司及其琉璃河水泥厂，第70兵工厂，北平第一机械厂，平津被服总厂，清河制呢厂，燕京造纸厂，大兴造纸厂，中央印刷厂，中央地质调查所、矿冶研究所、工业实验所；

交通方面有：平津、平汉、平古、冀晋铁路管理局，丰台车站，长辛店铁路大厂，第八区公路工程管理局，第八区运输处北平分处，河北、山西、热河三省公路局，公路总局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北平分厂，联勤409汽车修理厂；

邮电方面有：北平邮政管理局和储金汇业局，第七区电信管理局，北平电信局，河北省电信专用局，无线电收

发信台一、二、三、四台，联勤总部电机修理所，联勤第五补给区电机修理厂和电焊厂，以及第九区电信管理局的在平人员；

农业方面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华北兽医防治处，中央畜牧实验所北平工作站，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华北棉产改进处，双桥励志社农场，大红门农场，裕民农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北平分公司，华北病虫害械厂，官厅水库筹备处；

卫生方面有：北平中央防疫实验处，中央卫生实验北平分院，联勤第五补给区第31医院，北平陆军总医院，北平医院及第一、第三医院，市立妇科、牙科、传染病、精神病、肺结核医院，市立第一助产学校，军马防疫所，陆军第二兽医院，兽医防治处；

银行方面有：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银行的北平分行，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中央合作金库北平分库，河北省银行，北平市银行，中央印刷厂。

2. 清点阶段。清理、移交财产、档案、帐簿等物资，是接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战争接管还是和平接管，凡是属于人民的东西，都要如数地交还人民。和平解放北平，就是要尽量减少损失，完整地把它接收过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物资力量。

清点工作一般是接收就绪之后开始的，到3月中旬，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起初由军代表责成原单位自己清理造册，负责移交；在交接时，经过查对，发现许多帐实不符的漏洞，就要求重新认真清查造册，具体点交。电信

接管部在接管第七区电信管理局中，军代表发动群众选出代表，同接管人员、移交人员共同组成清查小组，进行清点，单在“废品”中就清查出能用的电子管3千多个。这个作法，立即在各接管部、处中推广。在清点工作中，由于有职工群众参加，揭出了许多贪污盗窃、转移隐匿的物资，收回了不少散失无帐的财产，不但保住了国家的财产，进一步搞清了被接管单位人员情况，而且还锻炼了职工群众，提高了当家做主人的觉悟，培养了一批干部。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

这里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后勤接管部军械接管处在霍嘉霜的领导下，通过广大军械干部和技术工人日日夜夜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检查处理了散在各处的数百吨废弹药、雷管（包括天安门城门洞中的炸药、雷管，据说一旦出了事故，将毁掉故宫和附近的民房）以及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未发生事故，保证了安全接管，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为军管会领导所称赞。

我们接管到手的，除房屋、机器、设备外，可用的物资并不多。对分散、转移物资的追查，适可而止，限于当时的和平接管环境，也未彻底深究。但是，比起经过战争接管来说，其损失要小得多了。

根据当时的统计，我们接管的主要物资有：

（1）军械弹药类（不包括解放军缴械、接收部分）：各种枪支4.45万余支（能用的占30%），各种炮850门（能用的占70%），各种枪弹3792万发，各种炮弹71.8万发，手榴弹等65万枚，各种引信雷管67万个，各种炸药

270吨。

(2) 车辆类：铁路机车95台，客车174辆，货车963辆，各种汽车2540辆（可用的1752辆），自行车1618辆。

(3) 燃料机油类：煤炭9万吨，各种油62920桶，其中普通汽油7174桶，航空汽油11173桶，普通机油28684桶，航空润滑油5489桶，其它还有柴油、煤油等。

(4) 粮食类：各种粮食2570万斤，其中细粮1147万斤，粗粮1324万斤。

(5) 被服类：各种军大衣17万件，各种军服25万套，各种雨衣4.5万件，各种军鞋25万双，军毯5万条，棉被7.5万套，各种毛皮4万张，牛皮5千张。

(6) 电讯机件类：各种电报机2357台，无线电报话机288台，有线电报机370台，广播电台1座，各种电话机5千多具，各种真空管（电子管）9万个，电池5万个，电讯零件3万件又356箱。

(7) 电机类：发电机190部（包括石景山发电厂四部发电机5.5万千瓦），电动机1500台，变压器2万个。

(8) 机器类：各种机器710台，其中各种机床2200台，军工专用机器60台，矿山用机器200台，农用机器120台（其中拖拉机11台），纺织机械600台，缝纫机1100台。

(9) 航空器材类：各种飞机28架，飞机发动机320台，其它发动机304台。

(10) 卫生器材药品类：盘尼西林制造设备一套，疫苗血清制造设备一套，X光机71部，显微镜300台，分析天

平30台，各种药品约400吨。

(11) 气象仪器类：主要是北京气象台的仪器，共计5887件。

(12) 纺织品类：各种布9.2万匹，麻袜252万条，纱线1421捆又3.3万轴。

(13) 材料类：钢铁10万吨（不包括石景山钢铁厂），铅丝元钉880吨，水泥3400吨。

(14) 图书类：共52万册。

(15) 档案类：约计25万卷（册、宗）又51万余件。

(16) 金银货币：黄金528两，银元3470枚，美钞5742元，金圆券2523万元。

3. 人员、物资处理阶段。主要是3月中旬到4月底，共1个多月的时间。

中央、华北局都十分重视人员、物资的处理工作，一再指示我们，要认真、仔细、慎重地做好这项工作。北平军管会3月10日发出指示，要求在三四月份重点做好处理人员、物资两项工作。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关于被接管人员的处理，物资接管委员会于3月中旬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我为主任，童陆生为副主任，由各接管部、处领导任委员，展开工作。接管开始时，被接管人员的心情是紧张的，搞不清共产党的政策，不少人受反动宣传影响，有些恐惧心理，不完全信任我们，怀疑我们会不会也是国民党的“劫收”，顾虑失业，生活没有办法。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再三宣布，凡留守原岗位的，都原职原薪，安心工作，听候

处理。同时，在留守期间，实行预借薪金、预领粮食，安定了人心。然后，我们下到基层，调查摸底，并宣布反动党团、特务办理登记，结果清查出了少数反革命分子。敌我分明了，不但解除了绝大部分人员的顾虑，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怀疑变成了拥护，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思想。但是，究竟自己的去留如何，仍然是大家最关心的切身问题，要求迅速解决。

关于人员的去留处理，总的方针是：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的现行盗窃私匿资财者外，一律去留自由，量才使用，负责到底。具体处理分为四类：一是愿意留下的，按照业务、技术能力分配适当的工作，担任相当的职务；二是业务能力差，暂时不适合工作的和愿意学习深造的，送各种学校、学习班学习；三是愿意回家或离开、自谋出路的，发给路费和一个月的薪金，携带证明文件，遣送回籍；四是少数特务和现行贪污盗窃分子和腐化不称职的，分别情况，应清洗的清洗，应惩办的送公安局、法院审理。

根据当时统计，物资接管委员会所接收的人员中，除企业的工人和商店的店员外，需要处理的，有13763人。处理的结果是：（1）留用者10082人，占73.3%；（2）送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学习和南下工作的354人，占2.5%；（3）由军事机关处理留用的1852人，占13.4%；（4）遣送回原籍的1326人，占9.6%；（5）清洗开除的80人，占0.6%，其中送公安局、法院的46人，占0.3%；（6）一时弄不清情况和其他原因暂不处理的69人，占0.6%。如果把留用的、学习的、军事机关处理的加在一起，

占89.2%，可以说，绝大部分留下了。即使如此，从事后的情况看，开除的34人当中，有个别高级职员还是可以留下的。比如第七区电信管理局局长聂传儒，虽然在职期间欺压职工，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但毕竟此人学有专长，经过教育还是可以改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留用的高级职员，在我党的领导下，都兢兢业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成就。象北平电信局副局长董兆龙，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后，随军渡江，在接管大城市的邮电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物资财产的处理，3月底成立华北局平、津、唐（山）、张（家口）接管财经资产处理委员会，由朱总司令亲自主持，统一制定处理方案。原则是：为支持解放军继续作战，解放全中国，凡军队需要的军需物资，首先拨归军队系统；不属于军队需要的，按类别、性质归属，分别移交中央、华北政府以及北平、天津市等各部门。北平物资接管委员会接管的部分，即按照处理委员会的处理方案于5月底前移交完毕。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一部分回归原来的单位，大部分随所接管单位的移交归属新建制工作，一部分另行分配工作。

六、抓住粮煤供应，稳定金融市场，解救人民生活困苦

北平，这个历史上的名城，长期以来兵连祸接，受尽了摧残和苦难。“七七”事变后日伪8年统治，人民在铁蹄下生活，苦难深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劫收”，3年多的反动统治，勒索压榨，通货膨胀，物

价上涨，民不聊生，使北平成了一个半身瘫痪的残破城市。根据统计资料，八年抗战时期，北平市场零售物价上涨了3200多倍；国民党统治3年，又上涨了800万倍。这些天文数字，听来就令人心寒。到解放前夕，围城一个半月，供应不足，生活十分困难，是预料中的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原则是为人民服务，解救人民生活困苦，逐步建立新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旦解放，我们的头等大事，自然是迅速组织生活物资供应，稳定金融市场，解除生活痛苦。因此，早在良乡时，彭真、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就多次谆谆叮嘱，必须一面抓接管，一面抓金融市场，尽快恢复生产，做好物资供应。搞不好市场，人民生活不能安定，老百姓就不拥护我们，接管了物资也等于零。我在根据地搞了多年财经工作，这个道理是明白的。但那是战争时代，是农村，比较简单。现在，北平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怎么搞，心中无数。我同北平市委、军管会的主管同志多次开会研究，同物管会的部、处负责同志反复商议，特别是吸收了多年做商业、金融、财税工作的赵介、彭城、张云天、贾星五、赵子尚、彭涛等同志的意见，提出了方案，报经市委、军管会同意执行。这个方案大体有两个部分：一是抓紧市场供应，搞好人民生活；二是收兑金圆券，使人民币尽快占领市场，稳定市场物价。

（1）在市场供应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一是组织调运粮、油、煤、盐四种生活必需品，准备进城供应。北平城围困多日，吃的、烧的供应最困难。据地下党同志反映，缺粮十分严重，粮价上涨，有些家

庭已经断炊。因此，首先抓吃饭问题，有了饭吃，一切都好办了。关于粮、油、煤、盐的准备工作，在良乡时就积极着手做了。当时部队的供给，按中央指示，由东北供应3/5，华北供应2/5。在解放区人民负担已经不轻的情况下，再增加供应城市的任务，是相当吃力的。因此，我们只能先筹集4000万斤粮，160万斤食油，7万吨煤，加上进城后可能接管的一部分，预计能够一个月的需要，然后陆续从农村再调粮油进城，保证供应。

二是进城后具体组织市场供应。这个问题，主要是财经接管部、贸易接管处和市场供应指导处的赵介、彭城负责。他们仔细研究进城接管商业企业的对象，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了解可以利用的商业机构和商店，布置商业网点，准备进城后立即开门应市。记得他们共确定接管50多个国营商店，组织4个大煤场，在几个火车站设粮站、煤栈供应。2月2日进城，3日他们即按计划接收一个商店，就安排一个点，从粮站、煤厂进货，立即开门全天营业。原来囤粮惜售的私营商店，见公家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城，也陆续开门营业。不到10天，市场开始活跃，死气沉沉的古都开始显示出她无限的生机。

三是组织各接管单位借薪借粮，直接供应职工群众。我们所接管的商店有限，偌大的一个北平城，只有这几十个国营商店是不够用的。我们要求各接管单位的军代表，负责本单位职工群众的生活供应。同意他们借薪（工资）借粮，迅速把粮食发到职工群众手中，帮助商业部门供应。一般每个职工借薪2000元人民币，粮30斤，以后发

薪时扣还，得到了大家的称赞。有些单位在解放前，为了维持职工生活，组织了职工合作社，集体采购商品，分给职工。比如电信局的合作社，规模比较大，起了一些作用。接管后，我们利用这些职工合作社，略加改进，由军代表领导，同商业接管部门挂钩，直接组织粮、油、煤生活物资供应，并逐步扩大品种供应范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是正确执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充分利用他们，做好市场供应，稳定物价。在接管初期，由于我们物资准备比较充分，供应工作做得好，私商摸不清我们的底细，解放前嚣张的投机倒把活动有所收敛，市场比较稳定，物价平和，粮食（小米）价格是人民币7.8元1斤，还略低于农村市场价格。我们即趁势少向市场投放粮食，让私人粮店多卖一些；并且还暗地购进了一些，以资平糶。同时，我们还逐步注意掌握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比如，用向纺织厂加工订货的办法，掌握纱、布、针织品，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并为以后的市场经济工作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当然，从现在来看，那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权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只可以说我们在市委、军管会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工作。

（2）关于金融货币问题，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接管国民党公营银行，立即组织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金融接管处在10多天之内就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河北省银行、北平市银行及绥远、热河、山西3个省

银行驻北平的办事机构等11个公营银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市分行，掌握了主要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了金融货币市场。根据解放区多年来的经验，金融货币管理是必须集中的，要确立人民政府所发行的本位币的地位，丝毫不能犹豫和动摇。在经济工作中，必须集中金融货币的管理权力，掌握住了金融货币的管理权，别的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们一接管了旧银行，就立即建立起新的人民银行，统一发行，集中管理金融货币市场。对私营银行和钱庄、银号，有官僚资本的，我们要求它们清理股权上报，经核实后予以接管。同时要求一切私营金融事业都必须服从国家的金融法令，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进行业务活动。没有这个权力的集中，我们的金融市场等经济工作就根本无法开展，稳定金融物价就是一句空话。

二是兑换金圆券，确立人民币的本位币地位。这项工作 在进城之后立即开始。2月2日，军管会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废止伪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并规定作价、记帐一律用人民币为单位。鉴于郊区解放后，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都来这里使用，共有8种之多，也影响市场物价稳定。为了统一货币，不使8种货币涌进北平，命令还规定：除冀南币、东北币可作为辅币流通外，其它解放区货币一律不得进北平。关于兑换金圆券，市委、军管会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彭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发的金圆券应由国民党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我们兑换金圆券是向人民群众负责，因为人民群众手中有金圆券，为了

不使他们吃亏才决定兑换的，而且对劳动人民还要给予优待。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指示，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作出兑换办法的。办法规定持有金圆券者须在20天内（2月2日至2月22日）按比价（10元金圆券换1元人民币）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并且规定，对工人、职员、教员、独立劳动者、工厂职员、城市贫民、公务人员、警察等，按3元金圆券换1元人民币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圆券500元（后改为510元）。为了在新旧货币交替期间不影响市场交易，还规定在2月22日前，准许金圆券在市场上暂行流通使用，但人民有拒用和议价的自由。由于这种办法合情合理，对劳动人民有好处，货币兑换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按期完成了任务。到2月22日为止，共计兑进金圆券8.3170亿元，兑出人民币1.9841亿元。有99.2万人得到1.1524亿元（人民币）的优待好处，平均每人多得人民币116元。按当时粮价，可买小米11.6斤。旧社会，无论哪次货币改革，总是劳动人民吃亏，这次兑换，不但没有遭受损失，却获得了如此多的好处。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一措施的赞扬和拥护是很自然的。

银行兑换货币放出人民币1.9亿元，再加上我军政机关的开销和对接管单位职工的借支、发工薪，到5月物资接管委员会结束为止，共投放市场人民币7亿元，没有超过预定计划，而人民币从此则完全占领了金融市场。

三是打击金、银黑市交易。2月28日，军管会发布第2号通令，“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买卖”。在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通货恶性膨胀，币值迅猛贬

值，人们为防吃亏，多以实物和金银为交易手段。起初是用工薪购买金银、面粉、洋布等实物，避免物价上涨遭受损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投机倒把，街头巷尾金银黑市买卖普遍出现。解放初期，金银黑市交易十分猖獗，王府井、前门、朝阳门等通衢要道都形成了公开的银元交易市场，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人民币的稳固地位。对此，有必要严予打击与肃清，以安定人民生活。在当时来说，我们在调集物资供应市场平抑物价的同时，对金银采取了一面允许个人收藏，一面用打击、取缔黑市交易和禁止流通的低价冻结政策。我们的部署是：由人民银行和公安部门合作，先对黑市进行调查摸底作好打击取缔的准备；然后发出公告，严申禁令，并组织大的力量于3月4日一齐出动，严缉查拿，3天内共拘捕了金银贩子380人，查获银元1778枚，刹住了这股逆风。此后，虽有少数顽固的不法分子转入了地下隐蔽活动，但在我们继续跟踪追击之下，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犯罪活动，人民币的地位更加巩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在短时期内取得这样成果，实非易事。当时我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曾经接到金银贩子匿名恐吓信，内附一粒子弹，并在信后画一把刀刺进一个心脏，以红墨水显示流血，信中警告说：“戎子和，你要不停止这个禁止金银交易办法，请看你的下场！”由此可见，当年建立统一的单一的人民币币制，禁止金银外币流通，是经过怎样的一场激烈尖锐的斗争啊！

七、恢复生产、交通、邮电，管好城市

我们已接收了北平这样一个大城市，能不能管好这个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解放了北平城，接管了北平城，建立了人民政权，如果生产不能发展，就失去了革命的意义，人民是不允许的。所以，从准备接管北平的第一天起，中央就一再指示，要一面接管，一面组织恢复生产。物资接管委员会是按照党的要求这样做了的。

在郊区接管中，对几个大型工矿企业的接管与恢复生产，徐驰率领的企业接管处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一进厂就宣布：原机构人员不变，所有职工各守岗位，继续生产，继续工作。同时要求按系统办理移交，并且立即派出懂技术的接管干部，下车间了解生产设备情况，同职工一齐研究解决关键问题，迅速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

北平用电主要靠石景山发电厂。该厂发电设备容量5.5万千瓦，职工1000人左右，解放时少数职工搬入城内，大部分留在厂内。1948年12月15日，在解放该厂的战斗中，机器设备有所损坏，同时，通往各地的输电线路也需要修复。该厂接管后，便双管齐下，一面整修机器设备，一面修复输电线路，保证通电。同时，由于当时铁路尚未接通，烟煤无法运进，就动员职工挖掘库底存煤使用。经过这样不断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2月17日即恢复部分发电，19日向门头沟煤矿送电，21日向清华、燕京两大学送电，23日向长辛店送电，24日向南苑送电。26日，徐驰以军代表的身份，电话通知北平城内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鲍国宝说，我们准

备向城内供电，请他准备接电。鲍答应照办。27日即向城内送电1000千瓦。以后和平谈判有了进展，逐步增加供电，1月下旬达6000千瓦。在当时解放军围城的战争情况下，仅用了10多天的时间，就恢复了发电送电能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我党我军接管的电厂向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城市送电，更出乎人们的意外。难怪当北平城内市民获得光照电力的时候，迸发出了热烈的欢迎与赞扬声：“共产党真伟大！”

门头沟煤矿（包括门头沟矿、西山矿、城子矿）是北平市居民烧煤的主要来源。1948年12月14日解放，15日由华北人民政府北岳区地方政府接管。由于当时职工吃粮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生产未能很快恢复。物管会企业接管处同志进矿接管后，经过各方努力，借薪借粮，安顿了职工生活，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单是门头沟矿，到1月中旬日产量即达1000多吨，保证了城内接管期间200万市民的需要。

进城后，由王诤、王子纲、成安玉领导的电信邮政接管部门，恢复通邮、通讯工作，做得也是比较出色的。进城前，军委对电讯工作曾有指示，要保证“解放一城，通达一地”。为完成这个要求，王诤等1月31日随解放军进城，当天晚上就同北平电信局的地下党支部见了面，了解情况并商谈接管工作安排，并要求他们组织群众保护机器设备。2月3日王诤等进局后，向职工宣布，原管理机构不变，主管人员不动，各守岗位，通信不停，并派专人在局长办公室办公，负责审批申请安装电话的任务，优先保证了党政军市内通讯联络的需要。在接管之前，该局地下

党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借故组织指挥线路队修复郊区长辛店、通县、廊房的线路；接管后，陆续修复城内外、市内外的电报电话线路，并着手修通各大解放区和许多大城市的电讯线路，很快开通了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大沽、沈阳、济南的通讯；在无线电方面，也陆续开通沈阳、洛阳、徐州、郑州、开封以及华北一些重要城市的电讯联系。为迎接党中央、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又新建立香山专用电话局，扩建了西苑28局。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使北平逐渐成为通讯联络中心，为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的指挥联络作好准备。

邮政的恢复也比较快。随着各地的解放和交通的恢复，邮路陆续增多，人员逐渐增加，业务不断扩大，便利了通信，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为了便利全国人民的通信往来，我们还接待了上海国民党邮政总局的代表团（随南京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来北平），商谈南北通邮事宜。对方通邮谈判代表团共5人，团长梅贻璠先生；我方代表团长是苏幼农、成安玉。双方达成了协议，草签了协议书，最后因为国民党政府阻挠而告吹。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同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区的邮政通信并没有中断过。

白纸坊中央印刷厂（钞票印刷厂），恢复钞票生产也是比较快的。这个厂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北方印刷钞票的老厂子，是美国援助建立的，有先进的凹印雕刻制版机器设备。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几次要拆迁主要设备到上海，由于工人坚决斗争始终未成。到了解放前夕，虽然厂方最后将机器设备拆卸装了箱子准备运走，但由于职工群众坚

决阻止没有实现。当时，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初建，全国解放在即，需要大量人民币，而印刷力量不足，供不应求，所以很重视这个厂子，希望接管后立即开工印制钞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出由秦炎带领的一批政治强、懂技术的干部来参加接管，要求他们迅速地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是1月31日进北平的，第二天就进驻白纸坊中央印刷厂。进厂当天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接管，讲解接管政策和军管纪律，并召回散失职工（因生活无着落到街上摆地摊、拉洋车谋生），每人发生活费2000元，安顿家小。同时立即动手修理机器，准备开工生产。一个奄奄一息、死气沉沉的印钞厂，一下子活跃起来了。2月2日上午，用随身带来的人民币钞票模版翻制成印版，下午就开动机器印出了5元、10元、20元的人民币钞票。这是接管工作中恢复生产最快的一家。由于人民币要占领平、津、唐、张整个地区的市场，还要供给解放大军南下、西进，钞票的需要量很大。故恢复生产之后，又立即着手扩大生产能力，招收新工人，派人到几个刷印厂监督委托印制，千方百计增加钞票印制数量，最后基本上完成了接管时期的印钞任务。在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制版技师雕刻制做凹版票模，为发行新型的精密的人民币钞票作准备，为新中国的钞票印刷创建基础。朱德、林伯渠、彭真、李立三、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参观过这个工厂，看望过废寝忘食地劳动的职工；董必武同志还亲笔题字改中央印刷厂为“中国人民印刷厂”，给予职工群众很大的鼓励。

物资接管委员会的工作，从1948年12月17日开始，到

1949年5月结束为止，共6个多月。在这6个月中，我们执行了党的政策，完成了接管任务，对每一个参加接管的同志来说，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提高。我认为这一段经历，是值得纪念的。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刘景范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1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同新发展的苏区，划分为陕甘省、陕西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西北办事处设主席团，博古为主席，下设土地部、教育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劳动部、司法内政部和工农检察院。1936年1月，又增设外交部。西北办事处是当时苏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它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原则协议后，西北办事处即着手准备“更名”、“改制”工作。所谓“更名”就是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直属行政组织，但又保留相对的独立性。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即苏维埃制度）改为普选的民主制（即不分阶级的民主制），实行一种有利于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

此，“更名”、“改制”实质上是我党在策略路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3月，宣布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从7月开始，边区进行了乡、区、县三级选举，建立了乡、区、县各级政府。这次选举，实行了“不分阶级党派”的普遍选举。由于举行选举的区域是原苏维埃区，因此在当选的议员中，工农基本群众占95%以上。据固临、延长、安定、曲子四个县的统计，在县议员中，地主、富农、商人（边区没有工业资本家）占4%，在区、乡议员中，占5%。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党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张国焘、博古、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边区政府领导成员为：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边区政府下设：

秘书长 伍修权；

财政厅 林伯渠兼厅长（1938年5月由曹菊如代理厅长，同年9月任命曹为厅长）；

民政厅 厅长马明方；

教育厅 厅长徐特立，副厅长陈正人；

建设厅 厅长刘景范（前任陕甘宁省委书记，1937年9月调边区政府）；

保安处 处长周兴。

边区保安司令部也同时成立。保安司令部由边区所属的各地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而成，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从1939年到1946年，边区召开了三届四次参议会，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机构，是按边区、县、乡三级设置的，另外设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设置公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乡政府下有行政村和自然村。各级政权组织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同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参议会，是有根本区别的。国民党召开的参政会和各省参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参政员和省参议员都是由国民党选定的。边区参议会是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的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权力机关，它有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政务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的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及审查边区政府的预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的各项提案，以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等职权。

边区参议会选举议长、副议长主持全会工作，并选举包括正副议长在内的常驻议员组成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常驻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有权监督政府对参议会决议案的

执行，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出席政府委员会以及召集临时参议会等。

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组成政府委员会，负责全边区的政务，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边区政府委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是最高行政机关。

边区政府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按照边区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指导和监督所辖各县政务及边区政府驻在分区的附属机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专员、副专员，下设若干行政科室。

县级政权是推行边区各项任务的枢纽。县参议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县参议员由全县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县参议会的性质、职权与边区参议会大体一致。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委员，组成县政府委员会。它是县参议会闭会期间决定政务的机关。县政府下设秘书、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粮食、保安等科室，以及司法处、保安大队等机构。县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区公署，协助县政府指导所属各乡的政权工作。区公署设区长一人，区助理员若干人和自卫军营长，组成区公署，在区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乡政权是边区的基层政权组织。乡参议会为乡政权的最高机关，乡参议会休会期间，乡政府委员会为乡政权最高机关。在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乡参议员（后改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参议会不设议长和常驻会，只在开会时推选主席团三人（乡长为当然主

席团成员)主持会议。乡参议会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组成乡政府委员会,执行全乡任务,并对上级政府和乡参议会负责及报告工作。乡政府下设人民仲裁、锄奸保卫、卫生教育、妇女儿童、生产建设、优待救济等组织和自卫军连长,在乡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乡政府除乡长、文书为脱产或半脱产干部外,其他成员均不脱离生产。

乡政府下设行政村,设主任一人,辖若干个自然村;自然村设村长一人,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均不脱产。

以上,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整套政权体系和政权组织。边区的各项抗战动员和建设工作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这套政权体系进行的。

二、边区三届参议会概况

(一)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1937年12月,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会议员。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年7月,首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并制定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边区政府于1938年11月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并决定在1939年1月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原先选出的议员,一部分已经离开边区到前线去了,无法出席会议。边区政府决定召开各县议员复选会,由原选议员出席会议,互推原议员

的50%出席边区参议会。考虑到选举产生的边区参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进步分子，边区政府特聘了12名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10名）。毛泽东、洛甫、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这次会议的议程有三项：

第一，听取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作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林伯渠强调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在大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作了工作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其他单行法规。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

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给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保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革命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的工业”，“发展畜牧业”，“发展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

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这些提案，会后均由边区政府执行了。

第三，选举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员。

大会第一日，首先选举参议会正副议长，高岗当选为议长，张邦英当选为副议长。大会的最后一天，进行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

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高自立兼民政厅厅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审计处处长；周扬任教育厅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厅长，朱开铨为副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艾楚南为副厅长；高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兴为副司令；周兴兼任保安处处长。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于是日正式成立。

以后在人事上稍有变动，1939年6月，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曹菊如接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12月又决定南汉宸任财政厅厅长，霍维德任副厅长。1940年10月，决定由谢觉哉接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高自立兼任建设厅厅长，刘景范改任民政厅厅长。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这届参议会的不足之处是：政权机关领导成员中没有选进有代表性的非党人士参加。

（二）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它是我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同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绥德、鄜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同时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1/3，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以1/3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1941年1月，边区开始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全面实施“三三制”的政权建设。为此，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党中央和毛泽东研究修改后，于1941年5月1日发布。这就是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4月28日，施政纲领正式发布以前，毛泽东在给任弼时和边区中央局的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改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并张贴于通衢。《群众报》上，须为它逐条加以通俗解释。”“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并使干部人手一张。”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于4月30日作出《关于发布施政纲领的决定》，指出：“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向边区

人民提出的本党在边区的施政纲领，业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兹决定于五一劳动节发布。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对边区党外人士，应征求其意见，欢迎自由批评，对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及广大人民，须同样征求其意见，并欢迎批评。无论在选举前或选举后，一切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党员有违反此纲领之任何条文者，予以纪律之制裁。”这个纲领的基本精神，就是“团结、抗日、救中国”。其具体内容包括：边区境内各社会阶级、抗日党派，共同团结抗日；坚持与边区境外之友党友军团结抗日；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和做好优抗工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同非党人士团结合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改进司法制度，励行廉洁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普及国民教育，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健康；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坚持民族平等；保障外侨和外国人的利益；给社会游民以公民平等的权利；优待敌伪俘虏，等等。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化。

为了做好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选举，成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我被边区政府任命为选举委员会主任。选举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进行宣传动员和选举准备工作。

在党提出“三三制”原则以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切，选举工作的宣传，就以贯彻实行“三三制”为重点。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甚至怀疑，尤其是经过土改的原苏区的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通。他们说：“咱们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现在又让他们来参加，来管我们，敢保不吃亏上当？！”“不要他们该有多省心，何必自找麻烦。”“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地主、士绅，‘三分之一’呀！”一部分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害怕地主参了政，自己更没有翻身的希望。在一些干部、党员中间，思想也不通，有的认为“三三制”是“三分天下”，担心实行“三三制”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一些地主和开明士绅，一面称赞“三三制”表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从前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又能参加政权”，“尔今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公民权，同别人平等了”；一方面又怀疑“三三制”的选举，是“摆样子”。而多数的中间分子则持观望等待的态度。针对这些思想情况，选举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对地主、士绅说：“现在实行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的危亡。只要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我们一律采取团结的方针。”我们对干部和群众说：“大敌当前，只有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与阶层，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员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有很高的威信，一定能够也必须保证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在全体人民中间毕竟占

少数，我们一定要学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本领。”思想通了，选举工作就能比较顺利的展开。

在这个阶段中，边区选举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到延安裴庄乡进行选举试点。裴庄乡的选举从2月3日成立乡选举委员会开始，到3月10日乡参议会召开，历时一个多月。试点取得了两方面的经验：第一，在乡一级贯彻“三三制”的具体经验。裴庄乡共选出乡参议员25名（其中有妇女3名），候补参议员7名（其中有妇女2名）。从阶级成分看，贫农3名，中农13名，富农6名，士绅1名，地主2名，其中有共产党员9名，占1/3强，如加上候补参议员，则共产党员只占1/4。基本上符合“三三制”原则。第二，在选举过程中发动群众给乡政府的工作提意见，检查政府工作。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发现问题，以便改进政府工作；其次是识别人才，以便改选。

第二阶段，县、乡两级参议员的选举和参议会的召开。

边区政府原定6、7两月进行县、乡两级的选举，后因7月是边区夏收大忙季节，故延期到9月进行。9月底，各县和乡（市）的选举基本结束，并召开了县、乡两级参议会。

乡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边区政府的一切政策和任务，都要经过乡政府去执行和完成。乡的选举搞好了，县和边区的选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和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

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工作从6月开始准备。在“五一施政纲领”公布以后，各县即按照施政纲领的精神，提出符合“三三制”原则的候选人名单。7月，西北局同边区政府经过研究讨论，批准和补充了各县提出的名单。9月24日，西北局正式发出通知，对于确定候选人作出了三点原则规定：一、候选人必须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三三制”原则来确定；二、对于我党所提出的候选人，应向群众解释其履历，使群众了解和拥护；三、凡属当地提出的党与非党候选人，如有不当者，在不增加党员人数的情况下，可酌量变动。

在9月、10月间的正式选举中，由于有些党员干部，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工作不深不细，加以群众对某些非党候选人不满意，故选举结果，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士绅落选的甚多。在选出的242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候补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因为边区参议员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不能随便更换，所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共同决定，聘请46名非党人士（主要是开明士绅）为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参议员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三制”的原则。在这次选举中，有一批开明士绅当上了边区参议员，如米脂的士绅李鼎铭、贺连城，绥德的地主士绅安文钦、霍子东等。在当选的边区参议员中，有少数民族人士马生福阿訇（回族）、鲜维俊（回族）、那素滴勒盖（蒙古族）等6名。还有国际友人申健（日本）、武亭（朝鲜）、阿里阿罕（印尼）、巴素华（印度）等。这样，边区参议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又体现了党的政

策，也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到会的参议员219名（其中有18名候补参议员）。大会开幕那天，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晋察冀、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十八集团军的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等也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典礼。

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毛泽东号召参议员中的共产党员要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听人民的意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他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共同把国事真正办好。毛泽东的讲话，在参议员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高度的赞扬，成为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高岗当选为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当选为副议长。李鼎铭在当选副议长后，发表了很好的讲话，他说：“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

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棉力。”又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李鼎铭最后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李鼎铭的讲话，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李鼎铭后来在边区政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以来，边区政府实施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

后的中心工作和方针。经过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总决议。

这届大会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讨论和决定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向大会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提请大会采纳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5月1日颁发的施政纲领。高岗指出，实施这个纲领的基本方法，就是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大家都来参加政权工作，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在高岗向大会提出这个纲领以后，贺连城等108人，樊作材、习仲勋等73人，分别提出6个提案，提请大会接受“五一施政纲领”，作为全边区人民共同的施政纲领。经全体参议员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本会同人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高岗先生的报告，并详细研究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施政纲领之后，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指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

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六项单行法规。

大会一致通过1942年度边区财政概算。在讨论财政概算时，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提出“政府应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这一提案受到大会的重视，以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并“交政府速办”。这就是后来实行精兵简政之由来。

大会收到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妇女、儿童方面的提案399件，均经分组审查，提出审议意见，由大会以全体或多数票通过，交由政府分别执行。

大会最后进行边区政府领导人员的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依法，李鼎铭不能同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职务。大会免去李鼎铭的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职务，补选安文钦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大会选举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边区政府正副主席为边区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并为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故政府委员共18名，其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大会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胜利召开，为“三三制”的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届边区政府的机构设置和领导人员如下：

秘书长 谢觉哉；

民政厅 刘景范任厅长，唐洪澄任副厅长；

财政厅 南汉宸任厅长，霍维德任副厅长；

建设厅 高自立任厅长，霍子乐任副厅长；

教育厅 柳湜任厅长，贺连城任副厅长；

保安处 周兴任处长。

此外，边区政府还设立了下列直属机构：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通儒，委员谢觉哉、拉素（即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刘景范、马生福（回族）。专管少数民族工作事宜。

法制室 主任委员张曙时，委员鲁佛民、李木庵。执掌边区的法律研究、草拟、修正等事宜。

禁烟督察处 霍维德兼处长。执行边区境内鸦片及鸦片代用品的查禁事宜。

文化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玉章，委员有林伯渠、李鼎铭、徐特立、丁玲、贺连城、柳湜、李丹生、周扬、肖军、丁浩川、艾思奇、罗烽、欧阳山、李卓然、江丰、马济川、高长虹、何思敬、周文、柯仲平、吕骥、舒群、塞克、艾青等27人。领导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统一管理边区的文化团体。

审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伯渠，委员李鼎铭、刘景范、贺连城、毕光斗。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判决的刑事、民事上诉案，行政诉讼、死刑复核及法令解释等。

从第二届边区参议会到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的五年多的

时间里，边区政府根据“五一施政纲领”，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从1942年和1943年先后开始的带有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为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初步形成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教网络，人民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三）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的选举，从1945年10月开始，至1946年3月结束，历时4个多月。

参加第三届边区参议员选举的选民平均占82.5%，有些地区达到90%以上。共选出边区参议员170名，其中正式参议员135名，候补参议员35名；上届连选连任的57名，新当选的113名。从党派关系上说，共产党员61名，占35.9%；国民党员19名，占11.2%；救国会1名；无党无派（包括进步分子和开明士绅）89名，占52.4%。就阶级成分说：地主34名，富农26名，中农69名，贫农18名，工业资本家3名，中小商人9名，工人6名，城市小资产阶级3名，城市贫民2名。边区参议员中有少数民族6名，妇女7名，天主教徒3名。边区参议员的构成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各阶级、阶层、各民族的大联盟。

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139名（其中候补参议员21名）。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召开的，是一次民主团结

的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和平与民主，把边区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民主自治区。

大会开幕典礼是在隆重、和谐和欢腾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副议长谢觉哉致开幕词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他称赞了边区在八年抗战和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对各解放区和全国的伟大模范作用，希望把边区建设成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更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

大会的第2日选举正副议长。当大会主席团宣布各议员小组提出的9名候选人名单时，参议员习仲勋当即郑重声明：“候选人中共产党员已超出‘三三制’名额，本人提请大会准予退出。”选举结果，高岗当选为议长，谢觉哉、安文钦当选为副议长。

大会从第3日至第14日，进行各项政府工作报告、质询及讨论。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新阶段》的报告，李鼎铭作了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霍维德作了财政工作报告，霍子乐作了今后3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贺连城作了今后3年文教建设方案的报告，我作了复员方案草案的报告。阎揆要、贾拓夫、王子宜、周兴、唐洪澄等就军事、财经、减租减息、司法、保安及干部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在讨论政府各项工作中，大家都进行了认真、热烈的发言。发言中，大家赞扬了政府工作成绩，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政府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参议员们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政府领导人员能够虚心倾听意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农民参议员刘德富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

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

4月25日、26日，进行参议会常驻会和政府委员会的选举。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和我当选为副主席。马洛川、贺连城、霍维德、毕光斗、王子宜、王世泰、霍子乐、唐洪澄、霍祝三、刘文卿、阿拉并巴音（蒙古族）、杨正甲、蔡登霄、李仲仁、魏民选、靳体元为政府委员，连同三位正副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共19名。习仲勋、刘培基、曹力如、高愉庭、房文礼、霍仲年、蔡丰、谷莲舫、杜洪源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加上三位正副议长，共12名。会议选举马锡五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政府委员和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都只占1/3。

4月27日，大会圆满结束，副议长安文钦致闭幕词，强调“我们要求蒋介石实现四项诺言，坚决反对法西斯特务分子破坏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边区人民要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不达最后胜利，决不退让”。大会来宾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黎玉（山东省政府主席）、薄一波（晋冀鲁豫参议会会议长）、邓子恢（华中军区政委）在会上讲了话。贺龙特别强调，要更加加强边区的自卫力量。林伯渠最后号召“陕甘宁边区160万人民要成为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要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和平民主而奋斗”。

这届边区政府各厅、处负责人员是：

秘书长 王子宜，副秘书长常黎夫；

民政厅 厅长刘景范（兼），副厅长唐洪澄；

财政厅 厅长霍维德，副厅长黄静波；
教育厅 厅长贺连城，副厅长赵伯平(后为江隆基)；
保安处 处长周兴，副处长刘秉温、赵苍壁、李启明；
保安司令部 司令员王世泰，副司令员阎揆要。

第三届民选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调集军队准备向边区进攻，边区随即转入战争状态。第三届边区参议会通过的三年边区建设计划被迫中断。

三、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一个重要议案。毛泽东看了这个提案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2年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同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简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边区政府从1941年二届参议会闭会后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结束。这次精简，侧重于减少机构和缩减人员。精简结果，裁、减、并机构百余处，缩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第二次精简从1942年7月开始，9月结束，这

次精简，主要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的职能等。这两次精简，虽然有相当大的成绩，但尚未达到精兵简政的全部目的。

1942年12月1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主持起草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并于1943年3月明令公布，开始了边区政府的第三次简政。

这次精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简政实施纲要上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首先，边区各级政府都做到了生产第一，生产中又以农业生产第一。从1943年起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大家齐动手，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丰硕成果。1943年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比1942年增加16万石，棉花和日用工业品也有较大的增长，实现了自给和半自给。

第二，政府机构作了调整，人员作了精简。边区政府各厅处的内部机构裁减了1/4。边区政府本部原有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的附属机关原有1140人，整编为911人。各分区专员公署，原有101人，因为增设延属、三边两个分区，总人数增加到148人，但原有专员公署的人数减少了。各县原有1188人，整编为791人。边区共有213个区公署，原有1250人，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机关精简总人数为762人，占原有人数的23.5%。边区共有1270个乡，每个乡都增设了文书一人，调派1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乡政府工作，既加强了乡政权，又

锻炼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一部分干部由上往下移，如延安县的10名县级干部调区工作；20名区级干部调乡工作。初步实现了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的方针。

第三，加强了统一性。基本上实现了政策、法令、命令和指示的统一执行，干部的统一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本位主义的现象大为减少。

第四，提高了工作效能。许多单位过去由几个人做的工作，整编以后一个人就承担了。

第五，节约也取得了成绩。由于机关、部队人员减少，1944年节约粮食15000石。民力的节约尤为显著。如延安县1942年动员民力60000多个，1943年只动员了28000多个，减少一半多；绥德1942年动员民力97000多个，1943年少动员了900个。

第六，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了进展，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改进了领导作风，改善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

在这次“精兵简政”中，我曾担任简政委员会主任，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我深切地体会到：“精兵简政”是改善和加强政权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是一项经常要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我们的历次精简中，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不能推广经验，成绩不能巩固，特别是在形势发展、情况好起来的时候，故病重犯，又走回头路。“庙”也多了，“神”也

多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扯皮踢球、政出多门等现象也多了，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很大的祸害。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回想当年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同志，吃的是小米，少肉少菜；穿的是粗布衣服，单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住的是自己打的土窑洞，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出门下乡靠两条腿，餐风宿露，艰苦备尝；工作之余，还要自己动手种地、种菜、纺线，还有一定的上缴任务。然而大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不顾个人身家性命、荣辱利害和安危得失。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在我们的政权建设中，没有这样一大批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的人，是不能成功的。

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金 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不得不重视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强大的有生力量。英、美——特别是美国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于1944年3月向我党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我能配合反攻日本。

美、英两国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经党中央同意，由我党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

3月9日，周恩来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国民党顽固派深怕外国记者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我党、我军、我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拖延。但是这一要求主要出自美

国、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们一再追逼下，国民党最后只得表示同意。以CC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加强控制，想出一个办法，提出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骨干加强“领导”，派他们的人担任团长、副团长，并制定了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的纪律。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我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副主席亲自负责。我们交际处政治、业务上划归当时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领导。

周副主席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等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开了动员会，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交代了我们接待的方针、政策。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这次来希望了解（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3）日本俘虏情况；（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

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周副主席指出：他们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为了做好这次接待工作，周副主席、尚昆同志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

我所在的交际处，由杨尚昆同志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请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体指示。会上，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我们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一切造谣诬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的宣传反感甚深，认为国民党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

绝”，所以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上和我们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请客、宴会、欢迎晚会等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

周副主席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分子”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有明显偏见。他们在外国或中国影响作用较大，至于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作用，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抗日、坚持民主、坚

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千万不要搞铺张浪费。宴会也不用山珍海味。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刻苦耐劳的，在这次工作中更要发扬这些优秀品质。

记者到来以前，我们全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周副主席在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后表示满意。他特别欣赏我们自制的土沙发。这种所谓“沙发”，有的只不过在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土印花布，显得挺漂亮。周副主席也很赞赏我们交际处对当时同盟国“四大领袖”画像的挂法。我们的挂法是，既要从表面上看无高低之分而实际上则有高低之分，使国民党不能挑剔，又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我们的挂法是：从右到左为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按中国人的习俗是以右为大，因此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了首位，罗斯福第二，邱吉尔第三，斯大林放在了最后。而按外国人的习惯是从左向右排列，第一位是斯大林，把蒋介石、邱吉尔放在后面了，对外国人也不会产生不好印象。周副主席对这种安排很欣赏，他说这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体现了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后来延安其他单位挂像也都按这样的顺序。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我们向正、副总领队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检查

局副局长) 索取了全体记者及工作人员的名单。

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艾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良，国民党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

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他们还带了电台。代表团路经西安时，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这个特务科长的真正任务是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一看国民党来员名单，及其所带的电台，就可知道，顽固派和特务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记者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的人马全部出动了。他们企图把国民党在大后方压制人民民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动办法，不折不扣地搬到延安和解放区来，而且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大施其特务破坏活动的手段。

记者团在到达延安之前，曾先到南泥湾访问了4天。外国记者到延安的当日，即纷纷到邮电局向他们的通讯社

或报刊社发电报，报道他们进入边区后，特别是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

原来，记者团在5月下旬由重庆飞到西安后，领队坚持要先到山西看看，再去延安。所以记者团是从山西进入陕北的。

5月31日晚，住在陕北的凉水崖。6月1日晨，三五九旅王震旅长亲自从延安带着一大批牲口来接，同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记者团即跟随王震行走，当日宿营于固临。第二天下雨，记者团滞留固临，由王震旅长召开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建设南泥湾的经过。

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安，记者们参观了延安油田。6月4日准备起程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中央社的杨家勇和商务日报的金东平等，自进入边区后经常单独乱窜，企图找出一点可资攻击共产党的岔子来，王震同志看出他们的恶意，即当众宣布：“哪个中央日报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说话时，瞪着眼睛，目光直逼着张文伯等人。他又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弄得张文伯很狼狈。

或许有人要问，王震同志这样做是不是太“厉害”了一点？其实不然。大家知道，王震同志是我们党内既善于打仗，又精通生产，还擅长做统战工作。他对于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和重用，很早就在党内外出了名。他对于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十分谙练，表现得有圆有方。在原则问题

上，坚持立场，严肃斗争，寸步不让，表现为原则性的“方”；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则求大同，存小异，妥协让步，表现为灵活性的“圆”。

记者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当晚三五九旅旅部的指战员在金盆湾举行欢迎晚会。会上，王震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刚收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会者不分中外、不分党派，莫不欢欣鼓舞。

第二天，记者团参观了南泥湾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也不知道时，十分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艾泼斯坦，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党政府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

以后，记者团又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军兵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最后于6月9日满意地离开南泥湾，到达延安。

记者团到来的当天，首先由我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出面，与正副总领队谢宝樵、邓友德及全体中外记者商定他们访问参观的概略日程安排，确定程序是先在延安参观访问，然后去前方。在延安期间可边访问边参观，具体单位和时间由交际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安排，到时通知。中外记者完全赞成，谢、邓等人也表示同意。

下午5时，叶剑英以我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

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杨尚昆秘书长，边区政府刘景范厅长。

为了打破谢、邓对记者的控制，在记者团到延的当晚，我即用电话请示杨尚昆同志，说明我们不能让他们擅设电台，得到尚昆同志同意。为此我们与谢、邓的第一次斗争开始了。

10日早餐前，住在交际处旁边客店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把他们带来的电台，搬进交际处，预备架设发报。我们传达室的传达人员把他们挡住了，发生了争执。邓友德从住的窑洞直跑到交际处门口，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硬要让我们的传达人员放行。我见邓友德在交际处门口大声恶言争吵，也走去与邓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邓竟蛮横地责问我：“我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领队，你们有什么道理不让我们工作？”我也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接待你们的工作人员，我只能按边区政府的法令办事。没有经过边区政府批准，谁也无权在边区境内架设电台。”邓友德一时语塞，但摆出一副凶狠架势，支支吾吾地还想说什么。谢宝樵见势不妙，忙知趣插话说：“不要为此小事，有伤和气”，一面说着一面把邓友德拉走了。电台终于没有架成。

早餐时，中外记者见到一面盆一面盆牛奶或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狼吞虎咽，选其所嗜各自饱餐了。这时正是我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两年之后，延安已初步达到了丰衣足食。

这时，我们交际处早已不是抗战初期由苏维埃外交部招待科遗留下来的状况，在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已打了30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20来间客房、工作人员的宿舍，还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交际处的厨房能做中餐和西餐。为了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开荒、种菜、背柴的农业生产，而且自己办起了一个食品商店“足食园”。自己用土产作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除供应交际处本身所需外，还向市场供销。

国民党顽固派劝阻外国记者不要来延安的谎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中外记者们来到实地一看，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了。原来外国记者在重庆，早餐时也只是稀饭、馒头和咸菜，对牛奶已经“久违”了，有时偶尔买到一个鸡蛋，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早餐中间，我用勺子击盘向记者团宣布当天的工作日程及注意事项：

（一）今天下午朱德总司令接见和宴会，邀请中外记者团全体出席。

（二）外国记者先生们的新闻稿，按战时各国惯例，需经过检查才能发出。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们委托翻译组组长浦化人负责，由他审阅签发。

（三）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亦须经柯柏年同志检查。

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团。为了欢迎该团及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请延

安大学文工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在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人士欢谈之际，高唱四国歌曲，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在欢迎会上首先由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致词后，艾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首先开诚布公地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很愉快。”他说：“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这番话是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他接着又诚恳地说：“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最后，他对我国国内团结表示了热切的希望，他说：“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

讲话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第一首曲子是《同盟国进行曲》，然后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上的座谈。

12日下午5时，毛主席在中央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

外记者代表团，毛主席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对代表团来延适逢第二战场开辟表示热烈庆祝。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在致词之后，毛主席逐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主席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着重指出：“远东决战快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会见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很多领导同志出席作陪。晚间并请记者们观看了平剧（即京剧）。

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几天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先由史坦因私下向我们的翻译同志探问，说他想单独见一次毛主席。我们的翻译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可以。并

答应代为报告，史坦因非常高兴。

一天，毛主席决定个别接见史坦因，因此史坦因未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出发参观上车后，邓友德在清查人数时发现没有史坦因，他问我方人员，我们的翻译人员告诉他，史坦因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说，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史坦因为什么不去？他转过脸来责问我，我对他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史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史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还是嚷嚷不休，但并不行动，他很清楚，即使他自己去请，也会在史坦因那里碰一鼻子灰。我示意司机等邓友德，但是许多中外记者却等得不耐烦了，急着要求开车。司机就把车开出门外向北转弯而去。只见邓友德久久仍悻悻然地带着他那副可憎的尊容，在车上摇晃着。

经过史坦因这么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上车时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察觉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邓友德的控制而单独行动了。从此，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继史坦因之后，接着福尔曼公开提出来，我们立即表示同意。接着几个中国记者也提出，我们一视同仁地表示同意。

25日上午和下午，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应美报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进行了四个小

时的谈话。谈话中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负何种任务等。

从11日开始，中外记者团正式访问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等单位，对我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正确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我们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的成绩，民兵的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还特别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中与我军共同抗日而牺牲了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叶参谋长开宗明义地说：“为使各位中外友人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况，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这里所指的敌后战场，就是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坚持抗战的战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此种情况，就连中国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叶参谋长说：“我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

张，并且是极其复杂、曲折的。”

叶参谋长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1944年3月前的基本情况。

在敌情方面，叶参谋长说：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日军兵力共34个半师团，约56万人。从国共两党抗敌的情况看，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敌人64.5%，友军（国民党军队）抗击了35.5%。其原因是由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日军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地进攻共产党。而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望，袖手旁观。”

在伪情方面，叶参谋长介绍说：由于一部分国民党军卑鄙无耻地投降与作伪，使伪军在敌后战场有78万之多。投敌将级军官有67人之多。在抗战以前，老伪军只有20000人，至1938年止也只有60000余人。到1942年春开始，伪军猛然增多，这些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特别坚决。国民党不但不对投敌伪军加以讨伐，反而暗中联络勾结，搞“曲线救国”，使他们不仅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准备在将来，在日军失败退出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之时，好让这些伪军打起“国旗”，宣布反正，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共战争。日本投降后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叶参谋长的预言。

叶参谋长说：“我们的友军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自1939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搞磨擦。在正面战场上，都丧失战斗力。”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

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16%，即不足1/6。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叶参谋长义正辞严地对记者们指出：“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在谈到“我情”时，叶参谋长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中共1937年9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了15个以上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发展到47万，民兵200余万，人口为8600万。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突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由于我们密切地依靠群众，党政军民结合一体，我们能在七年当中毙伤敌军351113人，毙伤伪军239952人，使敌我伤亡比例总计为2：1。叶参谋长还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激。

叶参谋长在揭露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并阻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我党我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等恶劣作法后，于报告结束时，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

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

这是一次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在中外记者中反映十分强烈。在回交际处的路上，在饭厅里，多数人喜形于色。外国记者饭后立即回到自己房间埋头打字发稿了，但也有的中国记者装成“不以为然”的样子，环顾左右而故意另找话题。更有甚者故意乘机进行挑衅活动。如中央社记者徐兆镛，在听完报告发电稿时，有意进行歪曲。叶参谋长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就能将国旗插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城头。”而徐在发稿中却有意去掉了“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这一至关重要的句子，而将这句话篡改成：“在战略反攻时，一但时机成熟，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开入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将插上国旗篡改为“悬挂我们的旗帜。”这完全是一种蓄意挑衅的行径。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他根据叶参谋长的报告进行更正。然而这个国民党顽固分子仍不老实，继续玩弄花招，他在更改时加上这样一句话：“据此间当局通知”。想造成是我们更改的原文，他不得不随之更改的假象。我们再次严厉驳斥了他的谎言，他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根据原报告做了更正。

叶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失望的

美、英、法三个国家，开始关注共产党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就在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以后一个月，美军即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联络。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初来中国时也一再主张国共调解，发挥中共的抗战力量。总之，叶参谋长的报告在当时的形势下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多次报告，如罗迈（即李维汉）的报告，谭政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及各厅局长的报告等等。

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中外记者的集会，会上挂着联合国国旗。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以及边区生活等各种问题，会场上充满了轻快气氛。在分散闲谈一阵之后，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些情况，随后由丁玲、吴伯箫、艾青几位作家向记者讲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作他的朋友，在今年3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

“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是吴伯箫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

议带到西安去。”艾青在吴伯箫讲话之后也发表了一个抗议性的发言。他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郾县被保安队捉回了。艾青愤慨地说：“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逃呢？”

记者中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西安、重庆这种追悼活人、说没有良心话的行为，也感到愤愤不平。而被国民党派来控制记者的那些人听到这些话则如坐针毡，低头不语。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到大众戏园去看秧歌，记者们和在场的延安2000老百姓一起，不断为精彩节目鼓掌，笑声不断。有些记者十分喜爱秧歌这种形式，有的甚至提出希望能学会秧歌。

周副主席这段时间很忙，对外要集体或个别地接见记者，对内要审阅各单位的报告。我们除了有事随时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书面报告外，为节省周副主席的精力，总向尚昆同志请示。但周副主席每隔一两天就到交际处来探望一次。并帮助记者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他还分别约记者谈话，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我因为工作繁杂，一天电话不断，晚上更多。为了方便，我把内线电话搬在自己床边。一天早晨6点多钟，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周副主席的声音，他问我今天上午记者团采访日本工农学校，准备了几个日语翻译，我如实回答。他表示满意。他听我说话带着睡意，就问：“你还没有起床？”我只好承认自己尚躺在床上接电话。我知道周副主席每晚睡得很迟，但起得很

早，内心感到惭愧。

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前的那几天，正是连日大雨。在记者团离延的前一天，我接到尚昆同志的指示，说崂山公路可能被雨冲坏，要我们把交际处的两部汽车送到兵站检修好，另外准备四辆胶轮大车，万一汽车过崂山发生故障，可改用胶轮大车送记者团过山去。翌日黎明，电话铃又响了。我很快接起电话，是周副主席，问我汽车检修得怎样，胶轮大车出发了没有？我答汽车已经检修好了，四辆胶轮大车，5点钟即将先行出发去崂山，在上山的路旁等着。看来天气不会下大雨，汽车过去不会出什么问题。周副主席又问，你对负责胶轮车的同志是怎样布置的？我答：让他们在山下等着，看到汽车上山，才可回来。周副主席又问，汽车上了崂山，你认为下山会不会出问题。我答：“大概不会。”周副主席对我这一回答很不满意，说：“你只知上山会有困难，就不想想下山也可能出问题吗？你真是齐桓公用兵，既想兴师动众，又怕劳命伤财……做统战工作是和打仗一样的，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为什么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呢？”听了周副主席的批评，我自知不对，很快回答说，我立刻设法转告带领胶轮车的同志，必须跟着汽车上、下崂山，保证把汽车送上平路。周副主席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给了我极大的教育。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中，中国记者由于国民党的压力，一般表现得谨小慎微，不多言语。唯有副领队邓友德到处挑毛病，如到医院参观，我负责人介绍边区缺医少药

的情况时，他极不耐烦地说：“你们老说没药没药，大后方也不是王道乐土。”一次在解放日报看剪报时，他不仅随手乱翻，而且挑衅地说：“你们的报纸不报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还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对这种恶意挑衅，我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谢宝樵、邓友德、杨西昆等看到中外记者们在我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和招待，特别是外国记者敢于报道的真实情况越来越深入，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他们便改换伎俩，最后甚至不择手段，企图拉他们在延安的亲友回国统区。邓友德有个弟弟邓友信，是个革命青年。杨西昆有个女同学金鹤是个革命干部，那几年经过整风学习，他们对我党的信念更加坚定，见面时，邓、杨用转弯抹角的方法，想从他们口中套取一点可资他们作反共宣传的材料，可是结果也都落了空。邓友德苦劝硬拉，要弟弟邓友信离延安去重庆，也遭到坚决拒绝。

访问参观到7月上旬，中外记者都希望赴八路军前线访问，谢、邓等怕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又采取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要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去。由中央日报、中央社记者从中活动，逼迫态度中间的大公报记者出面，提出立即回重庆的要求。他们离延前，向朱总司令辞行，总司令接见他们并讲了话。7月6日，周副主席为他们饯行。11日，朱总司令再次在交际处为中国记者饯行，他们于7月12日离延返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记者回到重庆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仍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这也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1945年3月，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的都留在延安未走。经过我们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他们于8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离延前，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外国记者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防地。他们曾到离汾阳五里远的一个山头上，观看了我八路军拔日寇据点的一场战斗。据艾泼斯坦回忆，那是9月的一个晴朗的白天，在山头上看汾阳看得很清楚。战斗是罗贵波指挥的。我八路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以坑道为掩护。将炸药送到了敌人碉堡底下。一声巨响，敌碉堡炸毁了，八路军指战员高喊着杀声冲向残破的碉堡，打死和俘虏了很多日本兵。指战员将日本俘虏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外国记者还和日本兵进行了交谈，了解日本兵的思想情绪。除了参观拔据点的战斗外，外国记者还参观了袭击日伪火柴厂的战斗。当堆满了火药和木料的火柴厂被我军点

燃时，冲天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十分壮观，给外国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记者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许多人以翔实的文字，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普遍的关注。以后史坦因又写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之挑战》，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86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好。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比较客观。特别突出的是艾泼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以后他参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我们的重新认识和估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党领导下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从1938年冬起，到1944年9月桂林疏散止，前后持续了近6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它蓬勃兴起，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云集桂林，约有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有200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士集中到桂林，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我国半壁河山沦丧，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士需要往大后方疏散；（二）桂林是西南重镇，也是西南的交通枢纽，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赣江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南洋，进退都比较方便；（三）蒋桂有

矛盾，日寇又步步进逼，桂系既怕蒋系势力渗入广西，又怕日寇入侵广西，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表示开明，愿与共产党合作，借共产党的威望，招贤纳士，网罗人才，扩大它的力量和声势，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和开展抗日文化工作的需要。

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即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着手在文化教育界的各个单位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工作的领导。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周恩来曾三次来到桂林，就党的工作、文化工作和统战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1938年12月，他途经桂林时，曾和郭沫若一道会见了白崇禧，请白支持在桂林筹备复刊《救亡日报》。白当即表示欢迎，并答应资助复刊开办费。周恩来指示夏衍，在办《救亡日报》的时候，重点是宣传抗日和统战。在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的基础上，李克农以合法身份和桂系上层人物交朋友，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明我党在广西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挖广西的墙脚，希望广西当局开放民主，支持进步，坚持抗战。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得失，不但对我党在桂林的一些活动不予阻止，而且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

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下，桂林八办和广西省工委经过艰苦缜密的工作，在桂林的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等系统中，在青年、妇女抗日群众团体和一些工厂以及国民党的机关、单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

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中，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当时桂林各界进步团体和文化宣传单位竞相成立。各种报纸、杂志、图书纷纷出版发行。一个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桂林蓬勃兴起，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新闻方面 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出版的报纸只有广西当局办的《广西日报》一家。1939、1940年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重庆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桂林版）等。1940年以后，陆续办起来的还有《大公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自由晚报》、《民众报》等。至1944年，先后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报纸共有13家。当时，桂林的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中央社桂林分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等十来个。在诸家报纸和新闻单位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该报原创刊于武汉，在广州设有分馆。武汉、广州沦陷后，总馆迁重庆，分馆迁桂林。分馆负责人先后是张尔华（张思敏）和陈晃（陈东）。分馆于1938年12月7日开始在桂林发行航空版。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无理阻挠，1940年4月8日被迫停止在桂林翻印，但读

者仍可从桂林分馆订阅重庆直接寄来的报纸，它仍然是我党在桂林的一个重要宣传舆论阵地。该报在桂林的发行，对桂林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桂林新闻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救亡日报》，是在我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兴办的报纸。该报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经周恩来和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取得合法地位后，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周恩来曾对该报的办报方针作过指示：“总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①该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坚持宣传党的团结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全国文化界的广泛拥戴和支持，在广大读者中享有很高威信。从复刊至1941年2月28日被迫停刊，出版时间是两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发行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和南洋一带。该报的副刊《文化岗位》（林林主编），在促进思想活跃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开辟了寓教育于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新道路。

《广西日报》，是桂系的喉舌，1936年随广西省会从南宁迁来桂林。由于蒋桂矛盾，在抗战初期，该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间立场。从1942年5月至1944年秋桂林疏

^① 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记《救亡日报》在桂林，《新华文摘》1981年第9期。

散，该报曾邀请金仲华、傅彬然、张锡昌、秦柳方（均中共党员）任主笔，分别撰写时事、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方面的社论。实际上，我党占领了该报的社论阵地。该报的副刊《南方》、《漓水》先后由艾青、陈芦荻主编，办得进步新颖，生动活泼，很受群众欢迎。

《力报》，是从长沙迁来的，1940年3月在桂林出版。总经理张稚琴（张治中的秘书），总编辑先后为欧阳敏纳、冯英子。副刊《新垦地》的编辑先后有聂绀弩、邵荃麟、葛琴、彭燕郊、王西彦等，其作者多为留桂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如骆宾基、司马文森、黄药眠等。还有杨东莼、宋云彬、张铁生、傅彬然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该报撰写专论。其副刊《新垦地》的办报方针同《救亡日报》基本一致。所以，该报在贯彻我党的团结抗战路线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读者欢迎，在桂林出版不久，就成为一家拥有较多读者的大报了。

《大公报》桂林版，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1941年3月15日创刊。该报对蒋介石持“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该报编辑部负责人徐铸成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采取友好的态度，经常与张锡昌、秦柳方等联系，曾请千家驹等为该报撰写社论。在我党的影响下，该报做过不少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该报文艺副刊内容比较进步，经常发表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老舍、柳亚子、熊佛西、司马文森等的文章，因此，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桂林的进步新闻单位中，党直接领导的还有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新社在1938年10月20日

成立于长沙，同年11月21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总社。它是胡愈之、范长江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起来的。社长先后是范长江、陈同生（陈依非）、孟秋江，总编辑黄药眠。在香港设有分社，重庆、金华设有办事处。国新社不仅向国内各地发稿，而且还向国外发稿。其中多为战地通讯，也发一些论文和特稿，每周印发《国际新闻资料》。采用国新社稿件的报刊，除了《新华日报》、《救亡日报》以外，还有国统区和海外华侨报刊共150多家。该社正确、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众多报纸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对新闻的垄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青记会在1938年成立于汉口，后经长沙迁至桂林。1939年春，总会从桂林迁往重庆，在桂林设立南方办事处。它同国新社互相配合，并肩战斗。它抽调记者分赴各地，深入前线甚至敌占区，采访、撰写战地通讯，还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培养青年新闻工作者。国新社和青记会在团结桂林各个报社和通讯社的新闻工作者，繁荣战时进步新闻事业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

出版方面 1939年至1940年，桂林的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办起了许多书店、出版社。这些书店和出版社，一部分是由上海、汉口、广州迁桂的，一部分是一些文化人到桂林后新办起来的。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前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180多家，出版的杂志近200种，各类图书杂志，不少畅销内地、港澳，以至南洋。

在这些众多的书店、出版社中，党直接领导的有：《新

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文化供应社。受党的影响，以发行进步书刊为主的有：三户图书社、科学书店、开明书店、白虹书店、立体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广西妇女》社等。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反动文人办的有：正中书局、前导书局、国防书店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等。由我党直接领导和在党的影响下经营的进步书店、出版社，在出版发行界中占主导地位。

《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是一个新闻事业机构，同时又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它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同时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延安出版的书刊等。它先后发行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此外，还经销当时苏联出版的俄文报纸和书刊。

生活书店，1932年在上海成立，是邹韬奋、胡愈之创办的。抗战爆发后，迁武汉、重庆。1938年3月，在桂林成立分店。经理先后有中共党员邵公文等。胡愈之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张铁生任编审。该店主要出版社会科学和文艺读物，先后出版了《战时大众知识》、《战时社会科学》、《世界文学名著》、《新中国学术》、《青年自学》等几套丛书，极受读者欢迎。同时，发行了《国民公论》、《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

《战时教育》、《文艺阵地》、《读书杂志》、《理论与现实》等刊物杂志，其中不少在当时国内的刊物杂志中是最有影响、最富盛誉的。有许多图书是在桂林排版印刷，然后分运西南各地发行的。

新知书店，1935年秋在上海建立。抗战爆发后，先迁武汉。在武汉时，该店还承担了长江局的出版机关“中国出版社”的一切出版发行业务（一套人马，两个名义），总经理徐雪寒，副经理华应申，由凯丰领导。1938年秋，该店迁桂林，由华应申主持业务，并兼任中共支部书记。该店迁桂后，在南方局领导下，以出版政治理论读物为主，以新知书店和中国出版社名义，先后大量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著作，还出版了《吴玉章抗战言论选辑》、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通俗理论读本。这些书籍畅销各地。该店出版发行的《抗战新歌》、《大众新歌》等，更是广泛流传。此外，该店还经销《中国农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中苏月刊》、《少年战线》、《国际英文选》等多种杂志。

读书出版社，1936年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迁重庆，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分社。该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中，有许多很受读者欢迎，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多次再版，普及各地，对广大青年读者起过启蒙作用。该社出版的《鲁艺丛书》、《新中国文艺丛刊》、《新音乐丛刊》，其中许多作品都是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深受读者喜

爱。该社还发行《学习生活》、《文学月报》、《新音乐》等杂志。该社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在桂林发行，并由桂林转运到重庆、延安等地。

文化供应社，1939年10月22日成立，该社是由胡愈之设计，在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办起来的。董事长李任仁，社长陈劭先，秘书陈此生，编辑部主任先后为胡愈之、傅彬然，副主任姜君辰，出版部主任宋云彬。编辑中有邵荃麟等中共党员多人。该社密切配合抗战宣传，以编辑出版大众读物为中心，兼出抗战必须的工具书。该社初办的一年多，就出版了通俗文库、青年文库、少年文库、青年自学指导手册、青年知识丛书、中国近百年史丛书、文学创作丛刊等图书500多种。该社在各类读物通俗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党领导的几家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读物，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经常是“读者车水马龙，书店门庭若市”，同国民党官办书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少青年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走上了革命道路。

文学方面 广州、武汉沦陷后，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一大批文化名流和作家云集桂林。他们“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开展，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密切”^①，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于1939年10月2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

^① 方言：《救亡动态在桂林》；载《救亡日报》1939年6月12日。

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文协桂林分会是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文艺组织。它容纳了各党派各方面的进步作家。在其理事会中，党员作家占了1/3，黄药眠、林林、周钢鸣、宋云彬、司马文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秘书和负责组织、出版等部工作，掌握了该会的实际领导权。

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贯彻总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如1940年1月，曾组织文艺、新闻界桂南前线访问团，奔赴战地进行慰问采访，体验战地生活，从而产生了一批反映前线战斗生活的作品。二是组织作家参加和开展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如当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时，文协桂林分会立即组织文化界发表声讨文章，召开声讨大会，举行反汪肃奸公演，联合其他团体通电全国，愤怒声讨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三是召开各种座谈会。曾先后对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抗战小说的写作问题、文艺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民间文艺问题、文学语言问题、诗歌的新形式问题、如何开展街头诗歌运动问题、民歌问题、吸收西洋诗歌的问题、儿童文学问题、儿童戏剧问题和当前儿童读物的优缺点等专题进行讨论，探讨战时文艺规律，促使抗战文艺健康发展。四是开办文艺讲习班，培养文艺人才。该会曾多次举办了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讲习班，向青年文艺工作者讲授了关于“文艺写作的任务”、“怎样建立新的戏剧”、“诗歌的写作研究”、“题材与素材”、“典型的创造”、“舞蹈的创作、批评及欣赏”、“绘画艺术”、“怎样描写人物”、“怎

样作一个导演”等问题，为桂林抗战文艺队伍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五是进行保障作家创作自由和著作权益的“合法”斗争。该会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办法，限制印刷商无限增加印刷费，提高出版物稿费，拟订出版条例，救济遇难作家家属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文协桂林分会通过开展上述活动，把各方面愿意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党在抗战期间关于文艺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向前发展，促进了桂林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1939年至1940年，桂林就涌现了《抗战文艺》、《野草》、《自由中国》、《耕耘》、《前线》、《顶点》、《诗》、《中国诗坛》、《十月文萃》等一批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此外，《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和《力报》等开辟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大批文艺作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1938年12月来到桂林。他在桂林组织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曾亲自率领支部的第一工作队，奔赴桂南前线昆仑关一带用日语对日军开展反战宣传，并先后写了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为题材的《和平村》、《我们七个人》和《三兄弟》等文艺作品。

戏剧方面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的戏剧活动非常活跃。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有40多个。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广西艺术馆桂剧实验剧团、国防艺术社、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孩

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救亡剧团等，是桂林剧运的骨干力量。当时在桂林工作的戏剧界党内外知名人士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洪深、瞿白音、杜宣、洪遭、熊佛西、焦菊隐等，在南方局领导下，带领各戏剧团队和广大戏剧工作者，继承“剧联”的革命传统，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进行了不懈地斗争，推动抗战戏剧运动蓬勃发展。

国防艺术社，是广西省当局办的一个艺术团体，始建于1937年10月，初属第五路军政治部，后属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社长先后由政治部主任兼任，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李文钊。1939年秋，李辞职，孟超任总干事，聘请中共党员马彦祥、焦菊隐、熊佛西等到该社导演戏剧，先后演出了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编写的以抗战为主题的戏剧《青纱帐里》、《前夜》、《古城的怒吼》、《夜光杯》、《飞将军》等。还为《救亡日报》筹集资金公演夏衍编剧、焦菊隐导演的《一年间》出了力。

新安旅行团，成立于1935年10月。是党组织和领导的一个宣传抗日的青少年团体。团内建有党支部，书记先后是：徐志贯、张平、张杰、张牧、张拓、左林。该团在江苏省淮安县成立后，从淮安出发旅行，宣传抗日救亡，途经18个省、市，行程3万多里。1938年11月，新旅来到桂林。他们深入城镇、农村、工厂、学校，演抗战戏，唱抗战歌，画抗战漫画，讲抗战形势。他们还组织“岩洞教育服务团”，当群众到岩洞躲避空袭的时候，到各岩洞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进行识字教学。新旅还与在桂林的广州

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长沙抗敌儿童工作团、桂林中山纪念学校等单位，共同组成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定期在一起联欢、座谈，共同讨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问題，交流工作经验，互相配合在市内开展歌咏、舞蹈、戏剧、街头画展等各种宣传活动，成为桂林少年儿童运动的中心。周恩来非常关心新旅的小朋友，1939年5月初，他第三次到桂林时，亲自到新旅住地东江镇小学看望这些小战士，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仔细地查看了他们的睡铺，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学习、生活、健康情况，称赞他们的革命精神，使小战士们受到很大鼓舞。

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九队，曾先后到桂林演出。这些团队，有的建有中共党组织，有的有中共党员在其中任指导员。他们演出的戏剧的思想内容和工作作风，对桂林其他戏剧团队有很大影响，促进了桂林抗战剧运的发展。

当年桂林的抗日戏剧运动是群众性的。不少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他们除了在城里剧院演出外，还深入农村、兵营、防空岩洞，以至奔向前线，开赴海外演出。新安旅行团、剧宣五队、剧宣七队、国防艺术社戏剧队等，都曾分别奔赴江南敌后、桂南前线、湘桂沿线演出。还有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和张兆汉率领的厦门儿童剧团，于1939年先后到南洋一带演出，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传播到南洋各地。

为了使戏剧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一些戏剧作家对旧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其中突出的是欧阳予倩对桂剧的改革。1938年春天，他到桂林后几个月就改编出第一个桂剧剧本《梁红玉》，接着又把《桃花扇》改为桂剧。1940年他担任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后，又先后改编了《人面桃花》、《木兰从军》、《渔夫恨》，新编了《搜庙反正》、《胜利年》等现代剧，还帮助桂剧团改编了《烤火下山》、《断桥会》、《打金枝》等桂剧传统剧目。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也积极支持一个桂剧戏班搞改革，演出了一批新编桂剧。田汉在桂林进行了评剧改革，并支持民间剧团四维评剧社，搞了不少新编评剧。这些改革，促使传统戏剧艺术走上了为抗战服务的正确道路。

音乐方面 早在1937年冬，桂林就出现了一个由国防艺术社和乐群社发起组织的抗战歌咏团，举行过有几千人参加的火炬歌咏大游行。武汉沦陷后，音乐家、中共党员张曙、林路随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撤退到桂林，负责领导桂林新音乐运动。1938年12月下旬，日机连续轰炸桂林，张曙等组织举行“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推动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歌声很快取代了社会上的靡靡之音。不久，张曙在一次轰炸中不幸殉难，林路等继续领导新音乐运动。1940年，桂林音乐界举办了抗战三周年音乐会，规模盛大，气氛热烈，对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起了很大作用。抗战期间，桂林先后出版了《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与美术》、《音乐知识》等音乐刊物。这些刊物的内容各有侧重。《每月新歌选》

主要刊登新歌创作，是新歌曲的总汇，其中不少是延安和解放区的新歌，内容丰富健康，思想性、战斗性强，最受群众欢迎。

桂林的抗日救亡音乐运动，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扫荡报》首先跳了出来，要把抗日音乐“扫荡”一番。该报发表文章攻击说，这是无聊文人的“标新立异”，妄图否定新音乐运动，否定进步音乐家的战斗的音乐作品。音乐界进步人士在报刊上撰文据理批驳，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音乐运动的发展。

舞蹈方面 1940年秋冬间，新安旅行团演出由吴晓邦、盛婕编导的大型舞剧《虎爷》。1940年秋冬间，演剧七队到桂林上演民间歌舞剧《新年大合唱》、《生产三部曲》、《生产大合唱》和音乐舞蹈造型《黄河》。这些舞蹈在民族形式的创造上，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引起了桂林文化艺术界的普遍重视。民族新歌剧《军民进行曲》、《农村曲》等，在桂林演出以后，还到广西西江流域各县及广东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还随由演剧五队、七队基于组织成的中国歌舞艺术社，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撒播了中华民族新歌舞的种子。

美术方面 漫画与木刻，是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的又一支十分活跃的队伍。广州、武汉沦陷后，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和特伟、廖冰兄、丰子恺、余所亚、黄新波、赖少其、陈烟桥等一批进步漫画家、木刻家先后汇集桂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桂林美术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后来该全国协会也由

重庆迁到桂林)、漫画宣传队,兴办了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举办了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漫画与木刻讲座,创办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木艺》、《漫画木刻月选》、《漫画专刊》等刊物,还在《救亡日报》上开辟了《漫木旬刊》。当时桂林经常举办美术展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木刻十年展览会、留桂画家抗战画展。个人办的画展也不少,如徐悲鸿、关山月等名画家都曾在桂林办过画展。有的美术团体还到外地开展活动。如1939年5月,漫画宣传队曾派人从桂林出发,经阳朔、平乐、梧州、零南、桂平、贵县、南宁、柳州等地举行街头及室内画展,沿途还与各地美术工作者商讨有关美术运动的各种问题。各团体和个人展出的美术作品多是现实题材,有控诉日军暴行的,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阴谋的,有歌颂军民抗日斗争的,有反映人民战时生活的,还有配合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爱憎分明,尖锐泼辣,发挥了战时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投入抗日的战斗作用。

教育方面 当时在广西大学、逸仙中学、桂林中学、中山纪念学校、桂林师范学校、桂林师范学院、桂林女中等大中学校,均有中共组织。这些学校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教学中给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灌输进步思想,讲授革命道理,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少学校建立了剧团、歌咏队、漫画组,出版小报、壁报,成立抗日救亡俱乐部,举办时事政治周、讲习会、座谈会。各校师生还跨出校门,走上社会,投入到抗日文化运动的洪

流中去，与文化界各团体并肩战斗。如逸仙中学，桂林八办和广西省工委，都很重视这所学校。广西省工委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南委交通员张海萍，当时就在该校以教师身分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先后到该校任教的，还有其他共产党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多人。在他们的推动下，该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搞得很活跃，经常举办话剧公演，还创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招收附近文盲群众读书识字，灌输抗日救亡思想。

1938年冬，在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急关头，广西当局组织了第三届学生军，共4000多人，编成三个团。广西省工委利用这个时机，派杨烈、王祥彻、黄廷机、吴家宜、张熙和、李云高、靳为霖、丘文惠等80多名共产党员带动广大知识青年参军。这批党员的很大一部分，在学生军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政工干部，掌握实际领导权。1939年春，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曾邀请叶剑英、郭沫若、范长江、夏衍、鹿地亘等作报告，影响很大。他们还组织学生军进行街头宣传，传播抗日文化，发动示威游行，声讨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这些活动震动了桂林。集训结束后，他们又带动学生军在桂南、桂东、桂东南以及广东高雷和钦防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把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普及到了这些地区。

1939年春，广西当局举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经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同意，中共党员杨东莼应聘任该校的教育长。杨实际掌握办校大权。接着，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广西省工委推荐和抽调了秦柳芳、宋之

光、周钢鸣、蔡冷枫、林路、潘超、苏曼、张海鳌、杨江、路璠、粟稔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张景宁、汤有雁等爱国民主人士到干校担任各级干部，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他们参照延安抗大的方针办校，使该校被誉称为“南方抗大”。他们组织师生学习革命理论，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该校曾请叶剑英、徐特立到校作报告，请夏衍、田汉、胡愈之等知名学者到校演讲。经常开展演讲、壁报、歌咏、漫画比赛，与进步文化团体联欢，演出抗战戏剧，下乡和到前线宣传，积极参加桂林抗日文化活动。该校至1940年12月31日结束，共办了四期，训练学员共1400多人，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学员分配到全省各地后，成为地方基层工作的骨干，推动和普及了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

科技方面 当时，在桂林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主要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工业合作研究所和广西建设研究会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李达、李四光、丁西林、高士其、金仲华、陈翰笙、千家驹等，在桂林开展了科技理论研究活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刊《中国农村》战时特刊，武汉沦陷迁到桂林，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开展了对卜凯（金陵大学美国籍教授）为代表的大农经济论的批判，对任曙、严敏峰、王宜昌等人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上的托派理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批判；报道了陕北、皖南、晋察冀、华北根据地的农村调查和对敌斗争的情况。

中国工业合作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工业》，刊登有关工业调查、工业经济、工业合作、工业救济以及有关民营工业界的呼声等文章和资料。

广西当局筹办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反蒋的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容纳知名人士，网罗人才，联络各派系，壮大声势，对蒋介石“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该会由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广西党政军的高级官员几乎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但他们只当官，不办具体事情。后又请李济深任名誉会长。实际主持会务的是常务委员李任仁、陈劭先。他们是国民党民主派，思想开明，靠拢我党。同时，经我党引荐，夏衍、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姜君辰、杨东莼、李达、李四光、欧阳予倩、陈此生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著名进步专家、学者应邀入会，成为该会的研究骨干和台柱人物。胡愈之、千家驹、陈此生等，还分别担任了该会各部门要职。该会当时是我党联系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扩大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它对有关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出版了《建设研究》、《时论分析》、《敌国舆情》等定期刊物。还出版了《广西之建设》、《列国国势要览》等丛书。1940年5月，该会进步分子响应中央倡议，成立广西宪政协进会，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除了在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等方面深入开展外，还普及到工人群众

当中。例如桂林被服厂的工人，在厂中共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业余话剧团、歌咏队、篮球队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工人学习班、读书会，学习文化、拉丁文、世界语，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他们还邀请胡愈之等知名人士到厂讲演，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二、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桂林形势日趋恶化。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接着，《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和一批进步文艺刊物，先后被勒令停业停刊。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为国民党“中央干训团”所代替。许多文化人士在我党的具体安排和帮助下转移到新四军和香港等地。广西当局还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使我广西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1941年至1943年，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面临十分艰难困苦的局面，但仍在坚持和发展。

桂林八办被迫撤销以后，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194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来到桂林，组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李任书记。同时，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等负责的党的文化工作组。当时，周恩来对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

挥作用。同时，周恩来还指示李亚群，邓荃麟等，要做好交朋友的工作，广西同国统区的其他地区有差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出版一些好书刊，不仅能够在广西起作用，并要向国统区其他地区发行。李亚群受命到桂林后，立即按党员的社会职业、社会关系、工作关系，重新组建或恢复因皖南事变被破坏的桂林文化、教育界的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面力量，继续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不久，恢复和建立了文化供应社、广西艺术馆、汉民中学、中山纪念学校、黄花岗学校、新中国剧社、环球印刷厂等一批单位的党组织。这时，南方局还派了张友渔、陈翰笙、狄超白等党员到桂林工作，由李亚群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配合李亚群工作。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在抓紧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40年4月，国民党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行营主任白崇禧调重庆，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此后几年，李济深虽无多大实权，但名义上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首脑。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和桂林的实际情况，把统战工作转到以李济深为重点对象。对李济深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当时在李身边工作的胡希明去进行。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九龙沦陷。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尽快把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港。指示说，这批人中有的我国文化界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党组织的具体安排下，何香凝、柳亚子、茅

盾、夏衍、沈志远、金仲华、冯和法、梁漱溟、陈翰笙、萨空了、杨东莼、陈此生、胡绳等，于1942年春，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和广州湾（今湛江）等地返回桂林。此时，南方局指示李亚群在桂林建立秘密接待站，接待由港脱险到桂林的文化人。当夏衍脱险到达桂林后，南方局即指示其留下，以文化人身份出现，协助李亚群做接待工作。1942年2月下旬，张友渔按照由廖承志转达的南方局的指示，到桂林接替夏衍的工作。这批人脱险回到桂林后，生活非常困难，工作没有着落，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一方面通过邵荃麟、张友渔、徐鸣等动员各方筹集经费，给予支援。徐鸣将其父在桂林的家产变卖，得3万元，交给组织作应急经费。另一方面，通过胡希明直接找李济深，得到李在经济上的资助，使回桂人员的生活问题得到暂时解决。随后，经桂系上层人物默许，陆续将这些文化人安排到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应社和一些大中学校，使他们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安置。

由于南方局的周密部署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内外文化工作者的紧密团结，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艰难的条件下，又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出版方面 1942年，新开设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就有20余家，新创办的进步刊物就有近20种。皖南事变后，《文化杂志》首先创刊，它的出版，象一颗重型炸弹，震破了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禁区，《广西日报》称赞它“满目琳琅，为最近文化权威”。紧接着，《诗创作》、《中学生》、《自

学》、《戏剧春秋》等进步杂志，就破土而出，相竞出版，蔚然成风。

文学方面 这个时期，虽然国民党反动派的禁令如山，文网森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受到严酷禁锢，但是，在党领导的文学工作者的带动下，桂林的文学运动仍然在斗争中前进、发展。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故乡》和《山野》、周钢鸣的《浮沉》、巴金的《火》（第三部）、骆宾基的《幼年》和《仇恨》、司马文森的《雨季》、于逢、易巩的《伙伴们》等。这个时期的杂文，主流是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和社会的黑暗面。原来的《野草》，新颖的作品更多，战斗性更强。汇集聂绀弩、秦似等作品的《野草丛书》和杂文集纷纷问世。这个时期的诗歌，也逐渐“走到人民大众中去”。

戏剧方面 这个时期，诞生了我党直接领导下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它于1941年10月成立。名誉社长田汉，社长杜宣，主要导演是瞿白音、洪深等。剧社成立大会，各界都来祝贺，到会1000多人。剧社成立后，把原来在桂林的、从香港回归的和从四战区来的剧作家、导演、著名演员都组织了起来。剧团初创的一年间，就举行了7次公演，演出了《大地春回》、《大雷雨》、《秋声赋》、《重庆二十四小时》、《钦差大臣》、《海国英雄》和《风雨归舟》（《再会吧，香港！》）等剧目。1942年10月，剧社出发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文化运动的影响。

这时，转战各地的抗敌剧宣四队、五队、七队，分别从柳州、滇边、曲江回到桂林。他们演出了不少以抗战为主题的剧目。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艺术馆桂剧实验剧团，仍然保持原来的演出活动。孟超主持的国防艺术社也在困难中坚持工作。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间，在桂林编导和上演的进步戏剧共有45个剧目，每月都有一个以至几个新剧上演。1942年上半年，演出了话剧30个，平均每月就有5个，人们称之为“话剧年”。

音乐方面 皖南事变后，新音乐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仍在进行，《新音乐》杂志照样刊行。1942年1月又创办了《音乐知识》月刊。分社以刊物为工具，以学生合唱队为骨干，继续推动新音乐运动向前发展，为抗战服务。这期间，桂林音乐界举行了各种抗日音乐会20余次。1941年5月28日，进步音乐工作者在市体育场举行了大型歌咏会，万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歌声震动了桂林山城，鼓舞了人民群众，显示了抗战歌声的力量。

美术方面 1941年，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桂林的会址被广西当局封闭，所编刊物《木艺》亦被迫停刊。但经过美术界同人的斗争，1942年4月26日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会桂林分会。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各种活动，多次举办画展。同年9月举办的画展，展出的作品中有徐悲鸿在桂林创作的《天马》和《古松》。1942年12月，举办的《香港的受难》画展，展出的作品以描写香港失陷前后的情景为主题，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了

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目。其后，新波、余所亚等还举办了“夜萤”画展。余所亚的漫画《前方马瘦，后方猪肥》，讽刺辛辣，寓意深刻，切中时弊，深得时人赞赏。

新闻方面 这个时期，《广西日报》由于有进步记者和报社负责人莫宝坚、莫乃群等在其中起骨干和主导作用，它的新闻报道和副刊仍然坚持进步方向。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力量所掌握，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粮食，在培养青年作者方面，也还有所作为。

教育方面 一些学校的抗日文化活动仍在开展。例如桂林中学一批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从学生军回校复学以后，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学生中组织时事座谈会、文艺研究会、漫画木刻研究会、抗日工作团和其他一些文化团队，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文化活动。抗日工作团曾深入到桂东南各县进行宣传工作。学生会出版《青年先锋》杂志，并经常组织话剧、歌咏、演讲和诗歌朗诵比赛。学校的抗日文化活动又蓬勃发展了起来。

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是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在南方局领导下，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要“封”进步书店，“禁”进步图书。进步书店就用化整为零、隐蔽精干的办法和他们作斗争。生活书店被封前，该店就举行廉价大拍卖，扩大事态的影响，随即把存书和人员转移到三户图书社，照常营业。同时，筹办学艺出版社和致用书店，继续出版原生活书店计划出版的图书。新知书店宣布结束时，把门市部转让给了文化供

应社，由文供社把它的发行任务承担下来。读书出版社被封了，又以新光书店的招牌出现。三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仍留在桂林继续斗争。1942年3月，广西省图书审查处宣布，各印刷所不得承印未经送审的文稿，违者惩处。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通过胡希民找李济深出面支持，使多数进步刊物没有被查封。接着广西当局又宣布，任何一个戏剧，都必须在演出前三天把剧本送去审查，未经允许，一律不准上演，违者罚款。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对此又采取了措施，一面疏散可能被捕的同志，一面争取演出了苏联名剧《大雷雨》等剧目。同年，欧阳予倩写的历史剧《忠王李秀成》，送审时被删掉50多处，改动30多处，仍然坚持上演。新中国剧社上演话剧《再见吧，香港！》，演出前已领得了许可证，可是，临开演时，国民党中央特务通过广西当局下令禁演，只演完了第一场就强迫停演。其后，经过反复斗争，该剧更名为《风雨归舟》，重新上演。

三、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和尾声

皖南事变后，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坚持发展，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

1944年，经过中国剧运先驱者欧阳予倩、田汉和抗战剧运的中坚人物、中共党员吕复、熊佛西、瞿白音等的倡议和筹备，在桂林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

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剧展于2月15日开幕，至5月19日结束，历时3个月零4天。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粤桂湘赣四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895人，加上大会工作人员，与会者近千人。演出的节目，有话剧23个，评剧29个，桂剧8个，歌剧1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175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展出的资料有：剧运文献，戏剧团队史，戏剧珍本，戏剧论著，作家手稿，创作经验，导演手记，舞台模型，化装模型，戏剧脸谱，以及各种统计图表、剧照、图片、生活素描、宣传品等，共1000多件，观众达36000多人次。在剧展期间，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西南32个戏剧团队的成员和特邀戏剧专家，共千余人。大会由欧阳予倩、田汉作了中国剧运的报告，由十多个团体的代表作了本团队的工作报告，由熊佛西、张客、赵如琳分别作了关于戏剧大众化、戏剧团队作风、中国艺术体系问题的专题报告，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西南分会和制订剧人公约等37项提案。大会还举行了“戏剧运动路线”、“歌剧的认识和改造并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剧”等问题的专题座谈。此外，剧展大会还组织了会外演出、电影观摩、球类比赛、诗歌朗诵会和游览等活动。剧展大会的全过程，洋溢着广大戏剧工作者朝气蓬勃、互相观摩、共同探索、团结战斗的气氛。

这次剧展，是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大会筹委的30多名委员中，大会的组织者、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坚人物，

是追随我党的欧阳予倩（解放后入了党）和中共党员田汉、熊佛西、瞿白音、吕复、丁西林、吴荻舟、徐洗尘、姚平等。在参加演出、展览的20多个戏剧团队中，骨干的队伍是我党直接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和剧宣四队、七队、九队。桂林文协组织了由中共党员田汉、周钢鸣、华嘉、骆宾基和党的积极分子组成演出剧目评论团（亦称十人团），掌握评论的方向，正确开展对演出剧目的评论。此外，还成立了有中共党员瞿白音、张客等参加的剧展演出检讨会，发动各团队人员对每个演出团队的工作作风、艺术倾向和戏剧路线问题，进行评议和研讨，促进各团队互相观摩，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参加了剧展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当时在重庆和桂林文化界工作的党员负责同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明剧展的指导思想，对剧展和剧运中的问题，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30多篇社论、评论、通讯、报道，及时宣传和大力支持了剧展。

在党的领导下，剧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演出、展览的众多节目，其思想内容的主流是抗战、团结、进步。剧宣七队的《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的《胜利进行曲》，这两出反映爱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歌剧和话剧，演出的效果最好，影响最大。两剧除了在剧院演出外，还在公共体育场连演五场，场场“爆棚”，每场都有上万观众。曹禺、夏衍、阳翰笙、欧阳予倩创作的以抗战为题材的戏剧，在整个演出、展览中占很大的比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历史剧，借古喻今，也起到了提高人民的爱

国主义思想，鼓舞人民抗战热情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剧展的主持者们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邀请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会长，又通过黄旭初邀请西南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的上层领导人物担任名誉会长，邀请各省、各战区的一些中层人物担任指导长。这些被邀请的人物，绝大多数都复了信应邀，并对剧展表示“衷心祝贺”。剧展期间，大会名誉会长李济深、白崇禧、张治中等出席了大会，参观了戏剧资料展览，并对剧人们讲了话，作了勋勉。李、张还捐了款给大会作活动经费，奖励工作成绩显著的戏剧团队。由于大会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使剧展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避免了反动势力和特务分子的破坏，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西南剧展规模巨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①

西南剧展刚刚结束，湘北日军南侵，占领长沙，进逼衡阳，企图打通粤汉线，并向湘桂线西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桂林危急，国民党当局于5月下旬下疏散令。在这个危急关头，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了起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

^① 《爱金生赞扬西南剧展》，《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

5月25日，文协桂林分会在艺术馆举行“桂林诗人为保卫中原而歌”的诗歌诵唱晚会。诗人和剧人们放声朗诵以“中国在燃烧”和“我们的心向中原”为主题的激情诗篇，高歌以“黄河之歌”为主题的抗战歌曲。晚会上，声声、字字是血泪的呼喊，慷慨悲壮，激励了文化人，也激励了人民群众。

由文协桂林分会倡议，经田汉去找李济深，取得李的同意，再由李济深、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约百人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决定从6月14日起至20日止，连续开展动员抗战宣传。头一天，李济深以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名义发表了讲话。第二天，李又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

宣传周活动的进程是：6月14日为动员日，15日为音乐日，16日为美术日，17日为戏剧日，18日为电影日，19日为义卖日。18日至20日，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在宣传周内，还有李任仁、梁漱溟、金仲华、千家驹等人，围绕保卫大西南的主题作了演讲。这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张申府、邓初民、茅盾、夏衍等联名致电广西党政军学文各界，热烈声援桂林文化界发动的保卫大西南运动，要求采取民主方法，组织人力，物力，保卫西南。

6月18、19两日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游行队伍上万人，在桂文化人悉数参加。李济深、柳亚子、田汉和桂林开明绅士龙积之等“长老团”走在前头，由50多名文化战

士和学生抬着一面特制的巨幅国旗跟随其后。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沿街广大群众、商店老板、小姐、太太纷纷把钱、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投到国旗上。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口号声、歌声和群众欢呼声响彻云霄。接着，6月24日至27日，新中国剧社公演战时特写剧《怒吼吧，桂林！》。宣传周前后，桂林又掀起了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

宣传周和国旗献金大游行结束后，桂林文化界召开联席会议，推选人员将献金、募捐所得的款项、物资，一部分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国民党部队；同时决定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经过筹备，文抗会于6月28日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统战组织。李济深任会长，李任仁、陈劭先、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周钢鸣、李文钊、张文、左黎民9人任常委。7月，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由田汉任总队长，华嘉任总队秘书，下分两个队，周钢鸣、陈残云分别任队长。队员经集中学习后，合并为一个队，共70多人，队长陈残云，党的负责人华嘉。接着由田汉带领，从桂林出发，到湘桂铁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抗击日军。文抗队的活动对前线军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惧恨，遭受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8月下旬，文抗队被迫返回桂林，宣布解散。队员们分别转到桂东、柳北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文化活动或参加游击战争。与文抗队到桂北地区

进行宣传活动的同时，桂林艺术馆演出了讽刺剧《草木皆兵》，连演17场，场场满座。这时，战火逐渐逼近桂林，但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仍然情绪高昂，斗志旺盛。

在湘桂战事紧急的时候，南方局派李亚群专程来桂林布置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疏散、转移。7月8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报告派李到桂工作情况及疏散情况，并报告由狄超白、邵荃麟、张锡昌继续办理有关事项。7月25日，中共中央复董必武电，表示“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指示对何香凝、柳亚子等“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并指示“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将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熊佛西等，撤往贵阳、重庆。司马文森、张琛等，转移到柳北与当地的党组织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铁生、张锡昌等，走桂东贺县、昭平。他们在桂东，一方面联系当地爱国民主人士，成立昭平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一方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继续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路线方针，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写下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最后一页。

（韦文华 苏上杰整理）

满洲省委概述

韩志峰 王家德

(一)

东北三省，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是帝国主义垂涎之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它们设商埠，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大肆掠夺东北的资源。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强，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20年代中期，东三省产业工人已达30万人，主要集中在奉天、大连、抚顺、哈尔滨几个中心城市。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奉系军阀的封建统治，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东北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主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工作。1921年末至1924年，中央先后派陈为人、李振瀛、邓中夏、罗章龙、马骏等到哈尔滨、吉林、奉天、大连、沟帮子等城市进行革命活动。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大连成立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奉天相继出现了南满医大及满洲银行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加强了对东北建党的领导工作。

9月，组建了奉天党支部。1926年1月，建立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5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中共大连特支改组为中共大连地委。在此前后，中共北满地委成立，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向长春、吉林和中东铁路沿线开展建党活动。至1927年9月，沟帮子、长春、吉林、台安都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吉林的柳河、海龙一带也有了党的活动。

党组织建立之后，立即肩负起了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奉天、哈尔滨、大连、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和附近县城，都发起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进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和募捐活动，掀起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1926年4月，大连市郊周水子“满洲福岛纺织会社”的1000余名中国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举行大罢工，发表了《1100多工友泣告各界同胞书》，揭露日本资本家虐待工人的种种罪行，抗议逮捕工人领袖。在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坚持斗争三个多月，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

1927年5月，奉天制碱株式会社的700多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为要求发放和增加工资，掀起了同盟罢工。罢工坚持了27天，最后以日本资本家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释放被捕工人而宣告结束。8月23日，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4500多名工人，因对工资低不满而举行罢

工。罢工工人袭击了该公司的事务所，砸坏了变电所。罢工遭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24人被枪杀，重伤44人，失踪者百余人，遭逮捕而受到严刑拷打的270多人。这次罢工震动了日本当局，惊呼这是“职工暴动”。奉系军阀当局迫于“人命关天”，也不得不向日本提出“抗议”。

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要求东北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党的领导。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常委于5月18日至19日在汉口日租界鲍罗廷公馆召开了“东北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讨论了东三省的工作，决定成立东三省省委，即满洲省委。指派南满地委书记邓和皋（邓洁）为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6月上旬，邓和皋由武汉回到大连，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中共大连地委为大连市委，直属中央领导，邓任市委书记。市委派王立功去北满，向吴丽石传达“五大”精神和中央关于成立满洲省委的决定。下旬，吴丽石来大连。邓和皋召集吴丽石、王立功（市委工运部长）、陈一仁（市委组织部长）商谈组建满洲省委事宜。正当省委筹建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大连地下党组织遭致严重破坏，邓和皋于7月25日被捕，省委筹建工作随之中断。

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来北方，组织成立了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省党部的北方局。9月，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委派陈为人来东北，继续进行省委的组建工作。中旬，陈为人与夫

人韩慧芝一起从天津到达奉天。与吴丽石、张任光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往返于奉天、哈尔滨、大连、抚顺、长春之间，筹划商讨建立满洲省委问题。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于10月宣布成立。

(二)

中共满洲省委从1927年10月成立到1936年3月撤销，其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 开拓前进时期

从1927年10月省临委成立到1928年11月省委被破坏，是满洲省委的开拓前进时期。

1927年10月末，在陈为人等同志组织下，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等地的代表20多人。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确定了东北党组织反帝、反封建军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纲领。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任书记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吴丽石（吴苓生）任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张任光（张福堂）任团省委书记，王立功负责工运工作，韩慧芝（王英）负责妇女工作兼管省委机关工作。后来又调北满地委书记胡步三（胡谦之）负责军事工作。省委机关设在奉天。会议结束之后，满洲省临

委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临字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现据中央新决议及满洲各地活动同志大会决议，已成立满洲省临委，管理奉吉黑三省党务”。这就正式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宣布了东北地区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的诞生。

满洲省临委成立后，立即担负起领导东北地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在满洲省临委的领导下，对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了恢复和整顿工作。临委先后派杜继增（杜省吾）、王立功、曲文秀、王仁斋等去大连、哈尔滨、抚顺等地视察，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大连，在被破坏的中共大连市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关东县委，下设10个支部，共有党员45人。在吉林，将东边区委扩建为中共吉长临时县委，下设5个支部；1928年7月，延边支部扩建为延吉区委。在黑龙江，撤销北满地委，改组为哈尔滨临时县委；1928年8月，又将县委改为市委，下设23个支部，党员95人。在辽宁，从省城到县城，都有党的活动。1928年10月至翌年2月期间，成立了奉天市区委，党员57人。沟帮子和台安支部改为特支。抚顺、安东特支和辽阳区委也先后成立。在此期间，还建立了营口、朝阳和建平三个支部。据1928年11月统计，中共满洲省临委领导的党组织有哈尔滨县委，奉天、沈北和延边区委。

与此同时，省临委还加强了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省临委出版了秘密的党内刊物《满洲通讯》。在1927年12月出刊的第一期上，刊载了《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和《临

字通告第一号》。到1928年10月，《满洲通讯》已编发了13期。它在宣传党的主张，启发群众觉悟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1928年11月，在奉天还出版了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革命文艺刊物——《关外》杂志，每期发行700余份。省临委还办了三期训练班，为各地培养干部，提高了干部素质。

台安的党组织办了“平民夜校”，并通过演剧、出版油印刊物等方法，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鼓舞群众斗志。延边地区的党组织，也通过演戏、散发传单等形式，团结朝鲜族同志向日警展开各种方式的斗争。奉天、大连、哈尔滨、营口等地的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和政策的影响下，散发反日传单，进行反日的宣传活动。

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营口烟草业，奉天造纸业，窑业，大连油篓业，长春的烧锅、染色、服务等各行业，都曾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罢工斗争，取得了部分的胜利。1928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侵略，妄图修筑由吉林到朝鲜会宁的吉会铁路，东北人民对此极为愤慨，掀起了反日保路运动。满洲省临委为了更好地领导这场群众斗争，组织了反日运动委员会，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并从奉天、哈尔滨两地派出30余名同志，组成“反日宣传队”，向群众散发传单，鼓舞人们斗志。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高呼“路权自主”、“打倒卖国贼”等口号。斗争坚持了7个月，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修筑吉会铁路的计划。

1928年1月末或2月初，中共满洲省临委在奉天召开

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完全肯定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纲”和“决议案”，决定今后工作的目标，仍要造成工农暴动，与统治阶级形成割据的局面。并规定训练干部、建立健全各级党部、努力进行秘密工作、组织农民斗争和加强兵运等六项工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会议还通过了《满洲省临委政治党务报告》，改选了省临委。设常委3人：陈为人、吴丽石、刘相益。书记仍由陈为人担任，其他成员的职务没有变动。3月，由唐宏经接替了王立功的工运工作。不久，刘相益的职务被撤销，补选了金红（唐宏经）为省委常委。

1928年9月，满洲省临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包括由六大回来的代表）共21人，代表25个地区的230名党员，大会共开了两天。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六大”的决议，总结省临委的工作，纠正过去的错误，规定新的政治路线及目前党的任务，改组满洲省临委。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传达报告和满洲省临委的“政治报告”、“党务报告”。通过了《政治党务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会议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员会、选出省委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陈为人任书记，吴丽石管组织，张子安任工委书记，韩慧芝做妇运工作，王鹤寿做青年团工作，连玉冈做军事工作。

大会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对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以来满洲省临委工作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指出：“过去

因在全国盲动主义行动之下与本身的幼稚软弱，在政治上发生了空想暴动而不能暴动的不动主义的错误”。大会认为，盲动主义在满洲造成的损失，“虽然不象其他各省遭反动势力严重打击，损失了党的中坚分子，但是脱离群众，在工农中未建立党的基础，发展广大的组织，在党内兴奋不起来同志的革命情绪，妨害党的工作，党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发展，平时提出口号很高，乃至炸案（指“皇姑屯事件”）发生，广大群众工作到来，我们反而束手无策，这就是盲动主义的巨大损失”。①

大会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任务。大会指出：满洲“党的政治总路线是要适应目前革命的局面，从引导日常斗争中取得成千成万群众围绕在党的口号周围，尤须注意促成工人阶级革命领导权，以准备革命高潮的到来”②。

这次会议，对纠正省委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推动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1928年12月23日，满洲省委在奉天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以及王鹤寿、牛思玉、张任光、李振琪（李梅五）、刘国栋、潘任德（潘敬久）、李正权、张德禄、王赞生、王任民、李荣等14人。由于不注意秘密工作，缺乏周密布置，被敌人发觉，陈为人、吴丽石等13人被捕（张任光中途跑掉），满洲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的破坏。

① 《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1928年9月或10月。

② 《满洲省委政治报告》，1928年9月或10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潘汉年

刘 昌 亮

潘汉年是一位老革命家，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在党内外历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1955年4月3日，以所谓“内奸”问题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从此，人们很少再提及他的革命生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立案审理了潘汉年的全部历史。1982年8月23日，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可是，潘汉年早在1977年4月14日于湖南米江茶场含冤离开了人间。

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 领导建立“左翼作家联盟”

1924年春，18岁的潘汉年来到了上海，进入黎锦晖办的国语学校学习。他努力研读新文艺作品，参加进步文艺运动，不久即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与周全平、叶灵凤等编辑《洪水》半月刊，成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五卅”运动后，他加

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著名的中共代表瞿秋白的讲话。同年冬，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在上海继续从事文化革命工作。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没有被吓倒。经过大革命实际斗争锻炼的左翼作家和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年，陆续聚集于上海，打起了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帜，开始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当时，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学社团有“创造社”和“太阳社”。“创造社”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李初黎、冯乃超、郑伯奇、彭康、张资平等。“太阳社”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主要刊物有《创造月刊》、《文艺批判》、《太阳月刊》。此外，还有以鲁迅为中心的一批革命作家，包括郁达夫、柔石等，创办有《奔流》、《大众文艺》等刊物。

1928年至1929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等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争。论争涉及到了文学的阶级性、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战斗任务和作家思想意识的改造等重要问题。这场论争，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对战斗在文化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确实起了鼓舞和激励斗志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场论争如继续下去，将不利于革命文化战线的团结对敌。而且在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复杂形势下，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党中央逐

渐注意到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重要性，遂派人加强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潘汉年就是我党派出做文化统战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8年春，潘汉年与创造社成员、中共党员李一氓、阴翰笙等为同一党小组，隶属于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潘汉年任支部书记。同年夏，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的指示，潘汉年在上海文化团体中成立了“文化党组”，成员有李一氓、阴翰笙、钱杏邨、孟超、潘梓年、张庆孚等，潘汉年任书记。不久，潘汉年又介绍创造社成员冯乃超、李初黎、朱镜我、李铁声等入党。同年冬，“文化党组”划归中宣部领导。不久，“文化党组”改名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为“文委”书记。

潘汉年根据党的指示分别找创造社、太阳社主要成员冯乃超、朱镜我、钱杏邨、洪灵菲、沈端先（夏衍），以及冯雪峰等谈话，指出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错误。希望停止论争，与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团结对敌。

为缓和论争，潘汉年首先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通讯——普罗文学题材问题》的文章。文章针对论争中狭隘的偏激情绪，指出：“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来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①

1929年10月中旬，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公啡”咖

^① 《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1930年4月25日。

啡馆的楼上，由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冯雪峰、夏衍、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阳翰笙等以及党外的郑伯奇。会上，潘汉年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一，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我们应该团结他，尊重他。创造社、太阳社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二，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内部不要搞派别争论；三，希望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等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会者同意中央的意见，决定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并确定以鲁迅、冯雪峰、夏衍、冯乃超、郑伯奇、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彭康、洪灵菲、柔石等12人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筹备小组12人名单，夏衍与冯雪峰回忆略有出入。除以上11人外，夏衍回忆还有戴平万；冯雪峰回忆有沈起予）^①。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二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发起人名单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确定；“左联”纲领委托冯乃超起草。发起人名单和“左联”纲领拟好后即送鲁迅，征得其同意，再由潘汉年送中央审查。

此后，潘汉年即以中宣部联络员的身份多次主持“左联”筹备会议，具体领导“左联”的筹备工作。

当时从苏联回国在中宣部工作的吴黎平，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潘汉年曾同吴黎平一起，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人开的

^① 见《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册。

内山书店拜访了鲁迅，向他传达了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请他在组织筹建“左联”的工作中多指导。鲁迅完全赞同党的意见，并答应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①之后，潘汉年、冯雪峰等先后多次走访鲁迅，共商成立“左联”事宜。

1930年2月16日下午，鲁迅、夏衍、柔石、阳翰笙、冯雪峰、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钱杏邨、潘汉年等12人，在上海“公啡”咖啡馆秘密举行“左联”筹备会。会议以“清算过去”，“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题目进行讨论。一致认为过去的争论存在问题是：“（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②在讨论到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时，会议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旧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三）新文艺理论的建立”。^③这次会议是对持续一年多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论争的一个总结。同时沟通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与会代表一致认

① 吴黎平：《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坚决斗争的潘汉年同志》，《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②③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为应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到此，由潘汉年具体领导的关于成立“左联”的一切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到会的约有40多人，原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团体的成员大多都参加了。大会首先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3人组成主席团，冯乃超、郑伯奇报告“左联”筹备经过，潘汉年代表党讲了话，鲁迅发表了著名演说，即《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演说中，结合自己切身的斗争实践，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总结了几年来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指出停止“新文学者与新文学者的斗争”的重要性。最后，鲁迅鲜明地提出联合战线必须要以共同的目的——为工农大众作为必要条件。这篇讲演是大革命失败后，鲁迅政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左联”成立后，潘汉年即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对“左联”成立的意义和任务作了明确的阐述。关于“左联”的任务，他指出：（一）加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克服文艺理论与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倾向；（二）确立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文学运动应与政治斗争，即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实际相联系；（三）发展大众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创造大众化的作品；（四）加强自

我批判，“坚决实行自我批判”，“巩固与加强我们斗争的阵线”，“克服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①

“左联”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文艺战线领导的一个伟大胜利，也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我党领导广大左翼文艺战士进行文化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继“左联”的成立，潘汉年代表党又先后领导了“剧联”（即“左翼剧团联盟”）、“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不久后成立的“中国左翼文艺总同盟”（简称“文总”）的第一任党组书记。

“文总”是党领导下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总机构。

在“左联”从筹备到成立的全过程中，潘汉年代表党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1年初，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专门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工作。此后，他基本上脱离了文化战线，转入了另一条战线，开始了更为艰险、隐蔽的对敌斗争。

为抗日反蒋与闽、粤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谈判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同年夏，潘汉年也调离上海到了中央苏区。他在苏区先后担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潘汉年曾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与

^① 《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闽、粤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联合抗日反蒋的谈判。

1. 与福建十九路军谈判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路线。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屈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并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入闽“围剿”红军。

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受挫，广大士兵厌战情绪日增，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宣言的感召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决定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

1933年9月，陈铭枢在香港召见了陈公培，请他去中央苏区联系。陈公培从香港到福州会见了蒋光鼐、蔡廷锴。蒋、蔡派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代表，秘密去苏区与红军联络。9月22日，陈公培到红三军团驻地王台。彭德怀当即电告中央。中央电示同十九路军谈判条件是：停止对苏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保证反帝运动与反帝组织之自由；发表反日反蒋政治宣言等。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的指示与陈公培进行了谈判。并议定十九路军再派全权代表到瑞金，与党中央直接谈判。

不久，十九路军即派徐名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曾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瑞金。10月

下旬，徐名鸿等到达瑞金，潘汉年（化名潘健行）受命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身份，与徐名鸿进行了具体的谈判。这次谈判取得了积极的结果，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在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管辖境内允许一切革命组织的活动。协定还规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按照本协定的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之准备”。

根据协定的规定，苏维埃政府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的全权代表，黄火青为秘书。潘汉年在谈判结束后，即随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入闽。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等亲自送行。11月上旬，潘汉年经龙岩、漳州、泉州，到达福州，秘密住在十九路军绥靖公署内。

潘汉年驻闽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闽变”后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各方领导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特别是在苏区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实行物资交换，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落实。潘汉年把洽谈情况及时电告中央。“闽变”中发给中央的电报，均为潘汉年所拟，由黄火青译成密码，交给十九路军电台发出的。

2. 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

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陈济棠当时被蒋介石封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有摆脱蒋介石控制，保持广东独立并进而与蒋的南京政府

对抗的打算和行动。他不愿意为蒋介石“围剿”红军而消耗自己的力量。同时，他还深知自己不是蒋的嫡系，终不会为蒋所信任与重用，因此，在对待红军是“剿”还是“和”这一重大决策上，不得不慎重行事。

1934年6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告白军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广大官兵不要打红军，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决不先打你们，快点约定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7月15日我党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了1933年1月17日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原则。在这种形势下，陈济棠对红军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决定同我们谈判。

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派李君到瑞金与我联络谈判事宜。周恩来、朱德热情接待并与其进行了交谈。在当时红军即将开始战略转移的紧张形势下，周恩来亲自安排了这次谈判，对谈判方案、代表、通讯密码、联络办法直至谈判地点等均作了周密部署。双方商定谈判地点在赣南寻乌一带。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登及驻筠门岭（江西会昌县境内）的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楨。我方派出的代表是潘汉年和何长工。

朱德为这次谈判专门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信中热情赞许了陈济棠抗日反蒋的决策，并明确提出了谈判的主要内容：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贵军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武装民众；立即开始作各项反日反蒋之军

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等。

周恩来为落实与陈济棠的具体谈判，召集潘汉年、何长工亲自交待谈判任务：“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而作”。10月5日，周恩来致电陈济棠：“我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于明日动身，7号中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

潘汉年到筠门岭后与陈济棠的代表黄延楨师长进行了3天3夜的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一）就地停火，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布的封锁；（四）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代购；（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后陈济棠决定，暂时拨给红军弹药10余万发，盐、布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从筠门岭转运到苏区。

长征前夕，潘汉年代表党与陈济棠的这次谈判，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却是成功的。当时，中央红军面对蒋介石疯狂的军事“围剿”，形势十分危急。陈济棠是南路军总指挥，指挥十余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南线闽、粤、赣交界地的安远、寻乌、武平、上杭一带。由于我党与陈济棠谈判的成功，不仅使我军得到了陈济棠对苏区的部分军火、物资的援助，在军事上大大减轻了来自南路的威胁，为中央红军长征突破蒋介石的最初军事封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前后，潘汉年与闽、粤国民党军阀的两次谈判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国民党营垒矛盾加深、不断分化的历史背景下，探寻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实行联合、共同抗日反蒋的成功尝试。

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与谈判

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通知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再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

当时，安排潘汉年由遵义到贵阳，通过贵州地下党设法经广州、香港去上海。为了安全，国家保卫局邓发找了一个熟悉路线的广东商贩，同化了装的潘汉年一起去贵阳。潘汉年在贵阳找到了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秦天真派人护送潘汉年及广东商贩到独山。然后按一般的商旅路线，经柳州、梧州到广州，再经香港到上海。

潘汉年到上海后，首先找到了隐蔽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谓年（潘汉年之弟），通过这个关系，找到了当时上海局的董之学。董约潘汉年和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浦化人见面。当潘汉年说到中央派他到上海寻找国际联络关系时，浦化人说，上海已没有国际方面负责人。由于上海不安全，浦化人便让潘汉年到香港等候消息。

潘汉年在香港会见了搞情报的梅龚彬、特科派在香港的钱铁如，以及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柯灵、叶挺等人。当潘汉年得知共产国际将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决定去苏联。在办理去苏联手续过程中，经梅龚彬介绍，潘汉年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鼐等，想通过他们解决去苏联的问题。后来潘汉年乘苏联商船离走的，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但少共国际会议还在举行，潘汉年列席了会议。

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确立的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经过集体讨论，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侵占华北，而且妄图吞并全中国。这就直接威胁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英美与日矛盾随之加深，并开始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要求联共抗日，其他有识之士也希望国共两党全力御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人秘密同共产党接触，同时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1935年春，国民党政府派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邓在苏期间，曾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多次接触。1935年底，蒋介石曾打算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后改为在南京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交涉。

潘汉年在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汇报了情况。王明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的陈果夫、陈立夫等接洽进行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联络工作，同时向延安党中央

汇报并恢复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潘汉年回国前，曾专门学习了密码，听取了共产国际苏共代表曼努意斯基等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意见，会见了邓文仪。邓将与陈果夫等联络的具体办法告知潘汉年。

1936年2月，潘汉年由列宁格勒乘船前往希腊，因希腊政局变化，船不能靠岸，又返回苏联。这时，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胡愈之，也正准备回国对东北军张学良进行联合抗日反蒋工作。王明决定让胡愈之与潘汉年一同回国，并告诉胡愈之，以后由潘汉年直接领导。1936年4月间，潘、胡乘车到巴黎，经马赛乘船于5月间到香港。

潘汉年在香港和救国会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李宗仁在香港的代表人物王公度、刘仲容、黄皓明，以及梅龚彬、钱铁如、柯灵、叶挺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派人去上海打听我党的消息，以便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同时写信给陈果夫，要他派人到香港商量两党谈判。

陈果夫随即派张冲（当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到香港与潘联系。潘汉年便随张冲经上海到南京，住下关杨子饭店。张冲按陈果夫授意对潘汉年表示，你从莫斯科来，只是代表王明等中共代表团关于两党合作谈判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中共当局。因此他们暂时不便直接与你接触，

先派曾养甫（国民党铁道部常务次长）为代表与你联络，待你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时，再与陈果夫面谈。之后，张冲陪潘汉年会见了曾养甫。

本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决定，要求国民党方面护送他到西北找红军，并建立国共两党电讯交通联络办法。但曾养甫等强调中央军未同红军直接对峙，与红军直接相对峙的，在陕西有张学良部，山西有阎锡山部，我们没有办法送你过境。他们告诉潘，陕北红军方面已有人经常来往于上海。同时，张冲还给潘汉年一个经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彭昭贤代转的密码。

1936年7月间，在潘汉年与张冲、曾养甫接触同时，胡愈之在上海通过救国会的沈钧儒、茅盾找到了党中央派到上海开展工作的冯雪峰。冯雪峰随即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潘从冯处了解到上海有秘密电台可同党中央联系，以及西安到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其间刘鼎也到过上海，曾向潘讲述了我党与张学良秘密联络的经过，提出潘去西安可直抵七贤庄兰道牙医生的住所（兰道牙是与史沫特莱、宋庆龄有关系的外国革命者）。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西安，住七贤庄。不久，潘到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同国民党接洽两党合作抗日的经过。

8月10日，潘汉年返回西安，等待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具体部署和指示。8月25日、26日，毛泽东电示潘汉年：“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请张学良“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同时要求潘汉年接电后

一周内回到保安，面告谈判方针，并带亲笔信去南京。

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最高代表，携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以及由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离开保安，经西安去上海。

潘汉年在西安通过刘鼎和孙铭九、苗剑秋一起与张学良多次会见。潘向张谈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意义和东北军如何对付蒋介石企图把他们调离西北的对策。潘及时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潘汉年怕在西安停留时间太久，延误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于是密电张冲，说明稍待时日，即可将中共中央给南京方面的信件送去。张冲得电后，立即秘密到西安与潘会见，询问中共中央对两党谈判的方针。潘汉年返回上海途经浦口过轮渡时，把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信交给张冲，约定几天后到南京正式联络。

10月初，潘汉年到南京，由张冲安排会见了陈立夫（因陈果夫患病，由陈立夫代替他的工作）。潘向陈谈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的诚意，表示愿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尽力促成合作，陈对此表示满意。但会见时，陈鼓吹了蒋介石逼迫红军领导人放下武器，出国考察，以收编红军的企图。10月上旬，蒋介石去西安前对冯玉祥表示：国共两党“很难和解”，“有不得不打的原因”，“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队伍呢？何况他们现在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①针对这

^① 潘汉年1936年10月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

一情况，我党采取“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逼蒋抗日的方针。^①

1936年11月10日，由张冲约定，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潘汉年将周恩来致蒋介石及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陈立夫。潘汉年根据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精神，陈述了我方关于谈判合作的条件：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立夫对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提出如下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目前红军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陈表示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例”，“请问陈

^① 洛甫等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抵抗之心，未知从何做起？”^① 这义正辞严的责问，使陈立夫非常难堪，于是调转话题说：“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指出：“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我党一方面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去西安与张、杨会谈；一方面及时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以及最低限度条件”。^③

潘汉年根据我党的指示，很快和张冲联系，并通过宋庆龄转告宋子文：我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与张、杨面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经过我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但和平局面很不稳定。国民党中央军与东北军仍处于对峙状态，南京亲日派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破坏和平局面。我党指示潘汉年与南京方面迅速联络，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

①② 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

③ 毛泽东1936年12月19日给潘汉年电。

并要与宋子文接洽，尽快弄清南京情况，要求宋子文实践周恩来与他及蒋介石在西安商定的六项条件。1937年1月初，潘汉年带张冲到西安与我党领导人商谈西安事变善后问题。之后，潘汉年又去南京与陈立夫商谈两党具体合作问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就合作抗日的具体问题，如红军编制、经费以及陕甘宁边区的设置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了六次会谈。这期间，潘汉年继续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联络代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37年3月下旬，他陪同周恩来去杭州与蒋介石会谈。

潘汉年除与宋子文、陈立夫、张冲等接洽，进行国民党上层社会的活动外，还与冯雪峰、夏衍一直保持着联系，通过他们与上海地下党发生关系，同时，他与宋庆龄也有经常的联络，通过宋庆龄将有关情报传到国际方面去，部分地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事务关系。“七七”事变后，潘汉年就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从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我们可以充分看出这位老革命战士对党的忠诚。他长期战斗在白区，不管环境多么艰险，情况多么复杂，他都无条件地接受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等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潘汉年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十余年了，但他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存的。他的革命业绩将永为人民所铭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简述

晋察冀大事记编写组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最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位于同浦路以东，正太、德石路以北，东临渤海，北抵长城，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面积约80万平方华里，人口2000余万。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地区，108县。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直接威胁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保定、唐山等敌人的战略要地以及伪满洲国。因此，在抗战八年中，这一地区敌我斗争甚为激烈、残酷。

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1937年

全国性抗战爆发 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深入战争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指示》。

平津沦陷 7月14日，日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华北，对北平、天津形成三面包围之势。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平汉线省委成立 7月上旬，以原中共保属（保定）特委为基础，建立了中共平汉线省委，李菁玉任书记，刘秀锋、李雪峰、薛振彦（又名肖悌）等为委员。平汉线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布置、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负责领导河北省中部、南部党的工作。与此同时，将原中共河北省委改为地下省委，李运昌任书记，负责领导平、津、唐三大城市党的工作和准备在冀东农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华北人武会成立 七八月间，原在天津的“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称“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团体，中共党员李楚离、王仲华（董毓华）、胡锡奎等人任专职负责人，李楚离为党组书记。

北方局迁出北平 8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从北平迁至太原。当时的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杨尚昆任宣传部长，朱瑞任军委书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黄敬任北京市委书记，姚依林任天津市委书记。平、津失陷后，党动员在城市的党员、民先队员、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华北各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去农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第115、120、129三个师。全军共4万余人。部队划入第二战区序列。

日军全面进攻华北 8月27日，日军占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9月13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当时，日军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8月31日，侵华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少将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北平。

中共中央派孟庆山赴冀中平原 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红军干部孟庆山赴河北冀中平原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9月上旬，平汉线省委命孟庆山为保东特委军事委员。

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 8月底至9月初，八路军各师主力，先后奉命从陕西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战场。9月中旬，115师开赴晋东北前线。

中共中央部署冀东游击战争 8月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敌后河北省委（在天津），立即把工作中心和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派遣李运昌赴北宁路北雾灵山区，组建中共冀热边特委；派遣胡锡奎赴冀东北宁路南地区，组建京东特委。两特委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冀东人民抗日起义，发动游击战争。李运昌去冀东后，由马辉之接任河北省委书记。

“国民抗日军”的组建 八九月间，北平地下党协助

旧军人赵侗在北平西郊组建一支近千人的抗日武装——“国民抗日军”。12月中旬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部队开到阜平地区整训，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1938年初，该部队奉命开赴宛平县斋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 9月22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

毛泽东部署华北游击战争 9月24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华北的任务，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到10月间，我军先后收复广灵、曲阳、灵丘、蔚县、易县、浑源、完县、满城、平山等县城，初步形成了以五台、阜平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平型关大捷 9月25日，我八路军115师主力在晋北平型关地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第五师团1000余人，击毁和缴获其全部武器、辎重、车辆，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罗荣桓在阜平 9月下旬，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和少量部队，从五台县出发，东进阜平地区，发动、组织冀西山区群众，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国民党军弃守河北平原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平汉、津浦两线国民党军队迅速南退，日军先后占领保定、沧州、德州、石家庄。冀中平原各县国民党县长和军警纷纷弃职南逃，当时土匪蜂起，汉奸肆虐，社会秩序极度混

乱。

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动 9月末，中共冀热边特委为了发动冀东地区的人民抗日起义，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经过同各界爱国人士（包括一些国民党员和民团团团长）协商，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特委书记王平陆任常务委员。一两个月内，会员很快发展到15000余人，分布在冀热边十余个县中。

平汉线省委紧急会议 9月底10月初，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一）所有党员干部坚守岗位，一律不撤退；（二）领导全党，动员一切力量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三）如果不能在当地存在时，可拉进太行山区活动。会后，省委委员肖悌到保定特委传达会议精神。鉴于当时日军大举南侵，平汉线路西、路东将被敌分割的形势，肖悌提议，将保定、保南两个特委合并，改组为保属省委，以便统一领导冀中平原人民的抗日斗争。省委主要领导成员有：张君（书记）、吴健民（组织部长）、孟继光（宣传部长）、孟庆山（军委主席）、侯玉田（军委副主席）。

阜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 10月初，罗荣桓经与冀西国民党驻军首长第九十四军军长朱怀冰及地方士绅协商，成立了“阜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由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王平任主任，国民党阜平县长张仲孚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冀西其他县也相继建立了“动委会”。石家庄失陷后，张仲孚不辞而别，王平当即接任阜平县长职务，并接管了县保卫

团、警察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最早的县抗日民主政府。至10月末，晋察冀三省边界各县，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协助下，迅速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各级“动委会”和各界救国会，并开始组建抗日武装。在阜平城内，成立了“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由王平任总指挥。

“人民自卫军”诞生 原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官兵，在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率领下，于10月14日，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丢掉国民党军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该团原地下共产党负责人李晓初任政训处主任（11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李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后，先后进驻深泽、安国、安平等县城，配合当地共产党开展锄奸、清匪、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晋察冀省委成立 11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县建立，黄敬任书记，赵振声任组织部长，刘秀峰任宣传部长。省委创办了党校（对外称“民运干部学校”）和农民妇女干部训练班。

攻克高阳城 10月30日夜，人民自卫军攻占保定东侧之高阳县城，毙俘尹松山部伪冀东保安队和高阳县伪保安团近千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及大量物资。翌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和保属省委机关均迁入高阳城内。

晋察冀军区成立 11月5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13日，宣布成立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

为雁北、察南、平北以及平汉路北平至保定以西之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地域为晋东北之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地区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和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地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太原失陷 11月8日，山西省会太原失陷。至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告结束，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

军区领导机关迁阜平 11月18日，为便于统一领导全区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从山西五台县迁至河北省阜平县。随后，为了大量培养军队基层干部，在阜平创办了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孙毅任校长。

边区军民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11月24日至12月21日，华北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从平汉、平绥、同浦、正太四条铁路沿线出发，分兵八路，首次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妄图一举摧毁这个刚刚诞生的敌后抗日堡垒。在近一个月的反围攻战争中，我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缴获机枪10挺，各种枪支300余支。反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人民自卫军”赴冀西整训 12月上、中旬，奉聂荣臻司令员之命，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主力部队2300余人，开赴冀西山区曲阳县王快镇地区进行整训。受训后，仍回冀中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创办《抗敌报》 12月11日，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共产党机关报《抗敌报》，邓拓任主编。1940年《抗敌报》改称《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

组建“河北游击军” 12月下旬，保属省委决定把“人民自卫军留守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任司令，侯平任政治部主任。只一两个月，河北游击军迅速扩大为三个独立师、三个直属团、一个模范营，还有十三个路，共约四五万人。

军区部队首次整编 12月中旬至1938年3月，各军分区分别编为三个相当于团的大队，隶属于支队，军分区兼任支队的领导。当时边区主力部队已扩大到20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四五万人。

军区首次政工会议 12月25日，在聂荣臻主持下，晋察冀军区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在阜平召开。会议着重研究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带来的各种问题，决定军区所属部队普遍加强政治工作，建立共产党组织，培训干部，清洗混入部队中的各类不良分子，贯彻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38年

王平陆牺牲 1月1日，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冀东三屯营一带发动农民举行反日起义，组建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特委书记王平陆兼支队司令。7日，王平陆率部夜袭伪满青龙县倒流水敌警防所，不幸牺牲。胡锡奎接任冀热边特委书记。

人民自卫军返回冀中 1月上旬，晋察冀省委、军区，具体部署了冀中平原工作，决定派鲁贲到冀中主持地方党工作；决定孙志远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1月18日，吕正操、孙志远、鲁贲率领人民自卫军从冀西返回冀中。自此，“人民自卫军”改称“冀中人民自卫军”。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诞生 1月10日至15日，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召开，到会代表149人，代表着边区全体抗日部队和各阶层、各民族人民。会议讨论通过了军事、行政、财政、文教、民运等决议案，发出大会宣言和向全国的通电，选举产生了华北敌后第一个区域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国民党代表）、张苏、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光、李杰庸9人为委员，张伯瀚、王斐然、孟阁臣3人为候补委员，宋劭文当选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南于八歼灭战 1月21日，驻保定日军第五师团第四十二联队第三中队一百数十人，于拂晓奔袭高阳县南于八村人民自卫军第二团驻地，自卫军在于权伸团长指挥下，与日激战竟日，计毙伤日军百余名（敌中队长早川丹治大尉被击毙）。生俘日军中村颜映等七名，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70余支。

冀中省委成立 1月下旬，中共保属省委在肃宁县城召开全体会议，鲁贲传达了晋察冀省委和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当前的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保属省委，成立冀中省委，由鲁贲任书记，张君任副书记。会议

结束后，冀中省委即从肃宁县城迁至安平县城，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会合。

开辟大清河北工作 2月初，根据冀中省委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决定，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锋队”，到平、津、保三角地区开辟工作。二三月间，该部在当地抗日武装配合下，收复新镇、霸县、牛坨、李家口等城镇，收编杂色武装4000多人，初步打开了大清河北之局面。

创建冀东根据地 2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示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派遣精干部队和得力干部去冀东农村，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接到指示后，即从第一军分区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邓华支队，决定第一步开辟平西地区，然后向冀东挺进。

边区军民首次破袭平汉路 2月9、10两日，为配合正面战场徐州会战，并趁势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统一部署冀西、冀中主力部队，分兵九路出击石家庄以北之平汉路沿线，一度攻入新乐、望都、定县三座县城，发动群众破坏铁路100余华里，平汉路运输一度瘫痪。

彭真来到晋察冀 2月间，彭真由晋东南到达阜平，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

中共路西各特委的成立 二三月间，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四个直属中共晋察冀省委的“特委”（1938年冬改

称地委），王国全任第一特委（察南蔚县、冀西涞源、灵丘）书记；王逸群（后是张连奎）任第二特委（五台地区）书记；厉男（后是刘杰）任第三特委（阜平、完、唐地区）书记；李德中（后是栗再温）任第四特委（平、孟地区）书记。此间，边区各县党的县委机关先后建立起来，并开始大量发展新党员。

边区各界抗联会的成立 3月3日，晋察冀边区工人、农民、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备会，同时在阜平县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边区工人、农民、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王文兴、杨耕田、赵宝瑾分别当选为边区工救会、农救会和妇救会主任。农救会会员已发展到57万人。

边区领导机关迁五台 3月4日至4月10日，日军12000余人，由保定、易县、满城、曲阳等地出动，向晋察冀边区涞源、阜平腹心地区大举进攻。3月8日，日军首次侵入阜平县城，我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迁至五台县。4月9日，我军收复阜平县城。

边区银行成立 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正式成立，开始发行“边币”，关学文任总行经理，胡作宾任副经理。银行准备金为200万元。总行在五台石嘴村，分行在冀中区安平县城。

冀中粉碎日军春季攻势 3月下旬至4月上旬，日军数千人分三路进攻冀中平原。4月初，先后侵占霸县、河间和安国县城。4月上旬，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乘敌在台儿庄前线遭到惨败之际，发动反攻，收复河间、安国、霸

县、高阳、安新等县城。

平西根据地的初创 3月间，邓华支队配合活动在北平西郊之游击第五支队，逐步开辟了房山、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县的工作，建立了三个联合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国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成立 4月1日，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在河北安平县城成立，李耕涛任公署主任。不久，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改称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由吕正操兼任主任，李耕涛为副主任。

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4月上旬，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边区党政军民的主要领导干部和晋东北、冀西、察南、冀中地区一部分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以讨论晋察冀党的建设和斗争任务以及进一步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为主要内容。彭真、聂荣臻、黄敬、舒同等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120师 359旅主力开赴晋东北 4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120师359旅718、719两个主力团，在王震率领下，由晋西北开赴晋东北恒山山脉的浑源、广灵、灵丘地区，配合晋察冀边区开辟桑干河两岸抗日根据地。

冀西政治主任公署成立 4月15日，冀西政治主任公署在阜平县城成立，张苏任公署主任。此时，原山西省晋东北行政区改称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宋劭文兼任主任。

冀中区第一次党代会 4月21日至5月2日，在河北

省安平县城召开了冀中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00余人，代表8000多名党员。黄敬主持大会并传达了中央指示和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大会分析了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大会结束后，冀中省委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由黄敬任省委书记，鲁责任副书记，张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不久，冀中省委改称冀中区党委。

八路军四纵队和平西组成 4月27日，宋时轮支队由雁北开赴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5月27日，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兼纵队党委书记。该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

边区军民第二次破袭平汉线 4月下旬和5月上旬，晋察冀（包括平西、冀中）部队为配合徐州会战，进行了平汉线北段第二次出击，先后攻入保定南关、涞水、涿县、昌平县城，一度占领定县、方顺桥、于家庄等火车站，歼、俘、反正伪军近2000人；并发动群众破坏铁路170余里，平汉路3天不通车，迫使敌人增派石家庄、保定、定县一线的守备兵力。

八路军三纵队诞生 5月4日，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兼，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支队（相当于旅），每支队设三个大队（相当于团）。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军分区领导机关由支队兼。另外，还有五个独立支队，一个挺进支队，以及回民教导总队等部，共计4万余人。

冀中各界抗救会成立 5月上旬，冀中区各县农民、工人、妇女、青年抗日救国会，分别在安平县城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冀中区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机构，郑靠山、周续辉、周克刚、赵亚平分别当选为农民、工人、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不久，又成立了冀中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史立德任主任。

路东中共各“特委”的成立 五六月间，冀中地区党组织根据行政区划，成立了四个分区级领导机关——“特委”（不久改称“地委”）：董汝勤（女）任第一特委书记；张雪峰任第二特委书记；翟晋阶任第三特委书记；罗玉川任第四特委书记。随后，又成立了第五特委，马载任书记。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 6月8日，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向冀东挺进。沿途攻克昌平、延庆、兴隆等县城，军威大振。21日，中共中央向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动员冀东人民配合宋时轮、邓华部队作战的指示》，动员全党与广大群众及一切地方武装，援助宋、邓部队，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周建屏逝世 6月13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红军优秀指挥员周建屏在平山县小觉村病逝。

白求恩大夫来边区 6月17日 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队长、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经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卫生顾问兼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后因抢救伤员时中毒，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

冀东抗日大起义 6月下旬，中共冀热边特委同党外同盟者代表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就冀东全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冀东抗日联军”，由高志远（滦县“民团”首领）任总司令，李运昌和洪麟阁（原天津教育界爱国人士）任副总司令，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任政治部主任。7月6日，冀东七县人民举行抗日大起义。参加起义的各界爱国同胞达20余万人。17日，开滦煤矿7000余工人由中共唐山市委周文彬（朝鲜族）等领导举行起义，组成工人大队，参加冀东抗日联军。8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同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县铁厂镇会师。起义部队攻克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等县城。8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导人邓华召集冀东抗日联军各路将领在铁厂开会，决定成立冀察热军区，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洪麟阁、高志远任副司令员，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李楚离任副主任。此时，冀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10万余人。

边区军民四面出击 7月6日和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配合正面战场的中原作战和冀东人民抗日起义，晋察冀军区命令冀西、冀中部队向平绥、平汉、北宁、正太铁路干线举行破击战。两天中，共歼敌伪军1000余人，炸毁火车头3个、桥梁2座，破坏铁路100余华里。平西部队一度攻入北平西郊区，炸毁石景山发电厂锅炉，使北平一度停电。冀中部队曾攻入安次县城，伪县警备大队长栾寿康率部起义，参加我军。

北岳区成立第五特委 7月间，在雁北、察南地区成立中共第五特委，刘光汉任书记，后刘达继任书记。

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敌后党领导机关名称 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决定党在敌后的省委，改称区委。在区委之下设特委、县委、分区委。10月间，晋察冀省委改称晋察冀边区党委。同时，边区中共各特委均改称地委。

“河北抗战学院”和“冀中民运干校”的创办 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冀中、冀南、冀西抗日根据地在河北省深县县城创办了河北抗战学院，由杨秀峰任院长，谌厚慈任副院长。8月中旬，根据冀中区党委决定，在任丘县北岸村成立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区党委党校前身），李常青任校长，霍炎任总队长。

“冀中回民抗建总会”成立 8月18日，冀中回族人民在河北省任丘县城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冀中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刘文正、马玉槐当选为正、副主任。

王平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9月初，晋察冀军区任命王平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西撤 9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热特委主要领导干部在九间房开会，决定冀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全部西撤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仅留下三个支队共700余人，分别由陈群、包森、单德贵率领，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9月中旬，数万大军分三路开始西撤，途中因食宿困难和遭敌阻击，大部溃散，仅少数部队在主力掩护下于10月下旬到达了目的

地。

边区军民粉碎日寇全面大围攻 9月20日至11月7日，华北敌酋寺内寿一根据日本大本营“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战略部署，调集5万余兵力，分25路，从四面八方围攻我晋察冀北岳山区根据地。10月3日，敌占领五台，4日侵入阜平城。根据地军民，在120师主力部队有力配合下，经过48天艰苦奋战，进行大小战斗136次，毙伤日军旅团长、联队长以下5200余人，俘日军7名，缴获长短枪570余支，轻重机枪49挺，火炮10门及大量其他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摧毁我边区根据地的阴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电慰问边区八路军将士和全体共产党员 9月25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电慰问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全体将士及全体党员。指出：敌人正向边区进攻。边区党委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希望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反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

边区各行政专署的设置 9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冀西政治主任公署以下设一、二、三专署；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以下设立一、二、三、四、五专署。

广州武汉沦陷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5日，武汉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

阶段。

冀东抗日联军返回冀热边 10月下旬，李运昌在平谷县东樊各庄约集冀热边特委干部开会，会议决定由李运昌率领撤退到平西的冀东抗日联军6000余人返回冀热边坚持游击战争。

改造平原地形 自秋末开始，冀中全体军民为粉碎敌人围攻“扫荡”，坚持持久游击战争，展开了大规模的挖道沟、破交通、改造地形的群众运动，使平坦的道路挖成深三四尺、宽五六尺的大车行道，以阻碍敌军车辆、坦克、炮兵运行，便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突袭敌人。至1939年秋，全区共破路挖沟10万余华里，在冀中平原筑起新“长城”。

初创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的成就 到1938年10月，晋察冀根据地已包括晋察冀（北岳）、冀中、平西、冀东的72个县，人口达1000余万，共产党员增至8万余名，正规部队1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和华北友邻地区的对敌作战。

根据地的巩固时期

（1938年11月至1940年底）

1938年

中共中央任命北方局和北方分局成员 11月9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以聂荣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北方分局委员，彭真兼分局书记。

冀中五次反围攻作战 11月12日至1939年3月底，敌纠集2万余兵力，采取“鲸吞式围剿”作战，分地区、分阶段地对冀中抗日根据地接连进行五次大规模围攻战，妄图歼灭我军主力和冀中党政军首脑机关，以占领冀中平原。在五次反围攻战役中，我军同敌人共进行165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3550余名，缴敌轻机枪6挺，步马枪900余支。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边区搞反共磨擦 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晋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保安司令。他们这时的使命是在敌后同共产党搞“磨擦”，从人民手中“收复失地”。

抗大二分校成立 12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政治军事大学第二分校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在陕北瓦窑堡宣告成立，第一任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1939年一二月间，二分校两千多教职学员分两批先后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陈庄地区。从1939年3月至1942年2月，二分校先后办了4期，共培训各级军政领导干部11000余名。1940年，陈伯钧去延安，孙毅继任校长。

“博野事件” 12月16日，张荫梧以“河北民军”总

指挥名义，乘日军大举进攻冀中根据地之际，亲率三个主力团，从冀南闯入冀中，猖狂向博野县境进犯。我军被迫自卫，在战斗中，张部大部分放下武器和起义。冀中军区把河北民军起义和被俘人员编为两个团，改称“冀中民军”，王长江任司令员，张存实任副司令员。

1939年

北方分局正式组成 1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外称“教委会”）在北岳区平山县蛟潭庄正式成立，彭真任书记，刘仁任组织部副部长，李常青任宣传工作委员会书记。分局下辖晋察冀（北岳）、冀中、冀热察三个区党委，并领导平、津、唐等敌占大城市党的工作。

程子华到冀中任职 1月中旬，程子华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冀中，就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兼冀中军区政委，随同程一起到冀中的军队高中级干部四五十名，大多分配在军分区和主力团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程子华到职后，王平改任冀中军区副政委。

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到达冀中 1月25日，贺龙、关向应率领120师主力一部（包括师直属机关、教导团、716团和独立第一支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从晋西北到达冀中河间县城西北的惠伯口村，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2月8日，120师715团亦奉命从绥远大青山区转战来到冀中。贺、关当天召集会议，向冀中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共同确定了当前军事斗争方针，决定120师以主力部队担负主要战斗任务，同时组成新的支

队，与冀中各军分区部队相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

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亦称“苍蝇沟会议”），主要议程是传达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宣布北方分局成立。会议全面总结了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与经验教训，确定边区党在抗战相持阶段中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大会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冀热察区党委成立 1月间，分局和军区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了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挺进军的领导成员：区党委由马辉之、姚依林、张明远等组成，马任书记。挺进军由肖克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下辖平西、平北和冀东（原冀热边）三个地委，周文彬任冀东地委书记，张明远任平西地委书记，苏梅任平北地委书记。会议确定冀热察党政军当前任务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分局党校成立 1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在平山县成立（后迁至阜平县平房村），彭真兼任校长，周荣鑫任教务长，白文治、蹇先佛（女）任党总支正副书记。

“察绥游击支队”的组成 1月间，雁北地区察绥游击军第一、第二支队整编为“察绥游击支队”，刘苏任司令，陈风桐任政治委员。

冀热察挺进军组成 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以原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成立，肖克任司令员，陈漫远任政治委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肖、马为正副书记。冀热察挺进军统一领导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武装斗争。

冀中军政委员会和冀中区作战总指挥部成立 2月13日，120师领导与冀中党政军领导举行联席会议，会上组成了冀中军政委员会和冀中区作战总指挥部。军政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王平、孙志远9人为委员，贺龙任书记。作战总指挥部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指挥。

冀西设立行政专员公署 3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平西设立冀西第六专署，杜伯华任专员。专署辖房良、涞涿、昌宛、宣涿四个联合县。

晋察冀边区党委组成 3月19日，以刘澜涛、赵振声（李葆华）、林铁、舒同、刘秀峰、刘道生、丁元获、赵尔陆、朱艘方、刘杰、栗再温组成边区党委执行委员会，刘澜涛、赵振声、林铁为常务委员。刘澜涛任书记，赵振声任组织部长，林铁任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刘秀峰任宣传部长。

齐会大捷 4月23日，贺龙指挥120师和冀中部队共7个团，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800余人及伪军数十人，包围于河北省河间县东北之齐会地区，经3昼夜激战，击毙敌联队长渡边佳行以下官兵700余人，俘日军7名，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2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创平原歼灭战之光辉范例。这一胜利，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作用。

冀东我军生俘日军驻遵化宪兵司令 4月26日，冀东八路军包森支队在遵化县北孟子院生俘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弟、日军冀东宪兵司令官赤本大佐及随员6人，给敌人以很大震动。

上下细腰涧大捷 5月9日至15日，在王震指挥下，120师359旅717、718团，配合地方武装，在五台地区上下细腰涧战斗中，歼灭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佐佐木支队700余人，俘日军11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马枪400余支。

大龙华歼灭战 5月21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四〇联队第三大队400余人，在内海中佐指挥下，由易县向西进犯，占领涞源以东之大龙华，被晋察冀杨成武支队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毙日军350余人，活捉日军中、小队长以下11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大小炮5门，各种枪90余支，汽车3辆，并缴获日军机密文件50余册。

八路军总政考察团在冀中 6月初，由方强率领的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工作考察团200余人，从延安出发，7月到达冀中，与120师联合组成工作组，协助整训三纵队部队。

“深县惨案”和讨张战役 6月21日，张荫梧率国民党军5000余人，袭击冀中军区驻深县南部的后勤机关和留守部队，惨杀抗日干部战士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22日拂晓，120师主力一部与冀中第一军分区部队相配合，一举歼灭进犯深县地区的全部国民党军。除张荫梧率10余人逃窜外，俘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毙伤500余人。

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保卫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华北联大成立 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华北联大由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院校合并而成。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7月12日，全校师生1500余人从延安地区出发，向华北敌后进军。9月下旬到达晋察冀边区，10月下旬正式开学上课。华北联大从1940年至1945年，毕业学生达8000余人，加上短期轮训的地方干部，共为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培养人才万余名。

孙毅调任冀中军区参谋长 8月2日，晋察冀军区任命孙毅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参谋长。

冀东分委和八路军第十三支队的成立 八九月间，中共冀东地委改为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李楚离任书记。分委下设东部地委和西部地委。同时，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第四纵队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支队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主力团，共3700余人。

120师奉命西调 8月下旬至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领120师师部和358旅主力部队从冀中开赴冀西。与此同时，王震率领359旅主力由雁北开赴陕北绥德地区，留下部队组成雁北支队，继续坚持恒山地区的游击战争。1940年1月，贺龙率领120师师部和358旅主力返回晋西北地区。

雁北察南办事处成立 9月22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

员会雁北察南办事处在灵丘县尚庄成立，王裴然任办事处主任。

陈庄大捷 9月25日至30日，守备平汉路石家庄、正定、无极、行唐、灵寿之日军1500多人，由混成第八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指挥，从灵丘向北进犯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地区，企图消灭我后方机关，破坏后方设施。当其主力进至陈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120师716团和晋察冀第四军分区部队包围，在贺龙师长、358旅旅长张宗逊指挥下，激战5昼夜，全歼该敌。此间，敌曾两次由灵寿出动援兵1000多人，均被我军击溃。此役总计歼日伪军（大部是日军）1280余人，俘日军16人，缴炮3门、轻重机枪26挺、步枪500余支、军马60余匹。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陈勉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回民支队”组成 9月间，冀中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丁铁石任政治部主任。

冀中粉碎日军秋季“扫荡” 10月2日至12月底，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扫荡”。先以6000余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第五军分区；继以1500余兵力，进攻滹沱河以北靠近平汉路地区；最后以12000余兵力，配备汽车300余辆、坦克30余辆、飞机28架，四面合围冀中腹地地区，妄图一举歼灭主力部队。根据地军民奋战一个多月，毙伤敌军2500余人，粉碎敌之“扫荡”。当时，日寇在冀中共建立据点177处，屯兵达22000人。此后，敌即以此为依托，对我平原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

北岳区冬季反“扫荡”的胜利 10月20日至12月8日，敌调集2万余兵力，分12路向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我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以及攻击敌人后方交通和据点等作战方法，挫败了日军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到12月8日，全部敌人被迫撤出根据地。在43天反“扫荡”战中，我军进行大小战斗108次，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缴获炮2门、轻重机枪21挺、步马枪400余支。

分局组织工作会议 10、11月间，为了贯彻8月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北方分局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当时，边区的共产党员已由抗战前的数千人发展到17万余人。会议决定目前边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地停止发展，并克服工作中不平衡现象。从1939年冬到1940年底，晋察冀边区党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全面巩固工作。

冀中区党委成员调整 10月间，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批准，冀中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如下调整：黄敬任书记，刘亚球（原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长）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衡（李之光）任社会部长兼冀中公安局局长，黄兴义任军事部长。

雁宿崖伏击战 11月3日，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共600余人，由辻村宪吉大佐指挥，沿涞源白石口、雁宿崖向银坊进犯，被我第一军分区部队三个团包围，经一整天激战，除极少数漏网外，包括辻村大佐在内500余人被全歼，活捉日军13人，缴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军马300余匹。

黄土岭围歼战 11月7、8两日，雁宿崖歼灭战结束后，日军“蒙疆驻屯军”总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日军1500余人，再次进入雁宿崖地区，企图寻我主力决一死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主力部队和第120师特务团，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将敌重重包围在涞源东南40华里之黄土岭、上庄子地区，经两天激战，共歼日军900余人，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

灵丘事件 11月21日，（阎锡山亲信、晋东北保安司令白志沂，配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之冬季“扫荡”，率部包围我灵丘县抗日政府及群众团体，捆打县长与工作人员，杀害八路军某部营长及团部参谋，制造了“灵丘事件”。22、23日，白部更变本加厉地不断袭击我驻广灵、灵丘的党政机关，捕杀地方干部，致使伤亡近100人。24日，我120师359旅主力一部，在察绥支队配合下，被迫自卫还击，白部大多被歼，其余溃逃。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2月3日，在蒋介石策划下，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随后，蒋介石又命令朱怀冰、庞炳勋、石友三等部，向晋东南、冀南八路军进攻，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由此开始。

神堂村战斗 12月27日，冀中第五军分区部队第二十七团800余人，在雄县神堂村，抗击敌军2000余人的进攻，激战竟日，胜利突围，毙伤敌金田大队长以下400余名，缴机枪一挺，击落飞机一架。创我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军区部队第二次整编 1939年，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

行整编。3月至6月为第一期，8月至11月为第二期。整编的目的是把游击部队上升为基干兵团。到年底，全区共组建33个主力团，计：北岳区12个团，冀中16个团，冀热察5个团。此外，还有北岳区8个游击支队，冀中区两个游击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全军区正规部队共约127000余人，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0年

冀东根据地初步恢复 1月1日，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在遵化县葛龙湾召开会议，决定大力开辟和巩固冀东抗日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实行统筹统支和建立公开的群众团体等。会后，把现有的部队（除调赴平西整训的主力部队外）编为几个游击总队，分散活动，恢复、发展游击根据地。

讨伐朱怀冰部 1月24日，晋察冀军区抽出冀西两个主力团（一团、五团）和冀中警备旅两个团，组成“南下支队”，抵达晋东南，参加讨伐朱怀冰部战役。2月间，聂荣臻、吕正操亦到达晋东南。6月初，“南下支队”完成任务，聂荣臻率部回晋察冀边区。

讨伐石友三部 1月30日，冀中军区抽调5个主力团和120师3个支队及津南自卫军组成“南进支队”，由程子华率领，开赴冀南，配合晋冀鲁豫反击石友三部的进攻。5月底“南进支队”完成反击任务后，3个团陆续返回冀中，支队指挥机关和两个团拨归冀鲁豫军区建制。

开展政治整军运动 1月间，晋察冀军区召开党代表

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决定开展政治整军运动。目的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整军分两期进行:第一期1月至3月;第二期4月至6月。

边区开展民主大选举运动 2月至7月,晋察冀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大选举运动,北岳区和冀中区完成了村一级政权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三三制”,有10000多名为广大群众信任的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开明士绅被选为村政权的成员,近30万名村代表登上了民主政治的舞台。这年夏秋至冬季,北岳区和冀中区又先后进行了区代表和区长、县议会议员和县长以及边区参议会议员的选举。这次选举运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平西区粉碎敌春季大“扫荡” 3月9日至22日,察南、北平郊区日、伪军集结9000余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企图摧毁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部队经过14天顽强战斗,迫敌全部退出根据地。是役共毙、伤、俘日伪军900多人,缴轻重机枪8挺、步枪100多支,击落敌机1架。

晋察冀第五军分区成立 3月12日,聂荣臻电令:在雁北察南地区成立晋察冀第五军分区,邓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由李天焕任政治委员)。军分区下辖:第六团、雁北支队、察南游击队。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撤销雁北察南办事处,另设立第五督察专员公署,李涛任行政专员。

冀中粉碎敌春季大“扫荡” 4月1日至5月底,华

北敌人调集37000余人的兵力,对冀中平原进行春季大“扫荡”,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斗开始后,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冀中军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暂时转移至平汉路西北岳山区。冀中军民经过50多天的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260次,毙伤日伪军3300余名,缴获炮2门、轻重机枪10余挺、步枪800余支。

马仁兴团起义 4月16日,国民党骑兵第十四旅马仁兴团起义,晋察冀军区授予“东北抗日先遣团”番号。该团开赴冀中地区后,改为“晋察冀军区骑兵第二团”。

冀东粉碎敌春季大“扫荡” 5月5日至6月10日,日军调集13000余兵力,对冀东丰润、蓟县、平谷、密云地区进行大规模分区“扫荡”,历时37天。在反“扫荡”中,我军共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并争取伪军一个中队反正。

冀中发动“青纱帐”战役 6月25日至8月10日,我冀中军民对敌发动“青纱帐”战役,重点在河间、献县、安新、蠡县等地区,目的是恢复和整顿该地区的工作。在此战役中,我军共作战146次,毙伤日伪军2600多名,俘伪军500多名,攻克敌据点10处,破坏公路320余里,部分地恢复了根据地。

白草洼歼灭战 6月下旬,包森副司令员指挥冀东八路军第十三支队主力一部,在盘山草洼战斗中全歼日军武岛骑兵中队70余人。这是冀东我军首次整连全歼日军的战斗。

边区调整行政区划 6月30日,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冀

中军区所属的第一、二、三、四、五军分区依次改称第六、七、八、九、十军分区。同时，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在地域上作了适当调整，原冀南第一军分区的大部分县划归冀中第六军分区，同时建立了中共冀中六地委和冀中第六行政专员公署。

柯棣华大夫来边区 6月间，印度援华医疗队员柯棣华·巴苏大夫，到达晋察冀边区，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病逝。

娘子神高干会议 7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在唐县娘子神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三年来边区的军事建设工作，确定了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会议估计敌人进攻边区屡遭失败之后，会更加强调分散守备，采取推广据点，修筑公路，实行分割封锁等手段，妄图压缩和消灭我根据地。当时，敌在我晋察冀边区已构筑了690个据点，其中北岳区206个，冀中432个，平西52个。

冀东军分区成立 7月25日，晋察冀军区决定撤销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列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8月间，部队进行整编，军分区辖十二、十三两个主力团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陈群任第十二团团团长，包森兼任第十三团团团长。

节振国牺牲 7月下旬，冀东工人游击大队大队长，著名的唐山煤矿工人领袖节振国在尤家庄战斗中不幸牺牲。

颁布“双十纲领” 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分20条，简称“双十纲领”。《双十纲领》的颁布和实施，使整个边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百团大战”初期 8月20日，八路军对华北敌军发动“百团大战”。发动此战役的目的，是打击敌对我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敌进攻西安计划，以影响全国战局，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在此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出动了45个主力团。战役初期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作战中心任务是交通破坏战，摧毁正太路。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地区军民全面出击，破击正太、平汉、津浦、平古、北宁铁路以及沧石、北大等公路，在20天的作战中，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俘日军21人，攻克重要据点17处，破坏铁路60余里、公路1000余里、桥梁28座，缴获大批枪支和其它物资。使正太路全线陷于瘫痪，平汉路一度中断。

娘子关歼灭战 8月20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经一夜激战，攻克天险娘子关，歼灭守敌400余人，缴获山炮2门、步枪百余支、轻重机枪13挺，并炸毁井陘煤矿。21日，日军增援部队赶来，我军主动撤出。

“百团大战”中期 此阶段（9月20日至10月5日）作战中心任务是继续扩大交通破袭战成果，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敌人据点。在20天的作战中，北岳、冀中部队向敌展开多次战役攻势，共毙伤日伪军2400余名，俘日军52名，缴获各种枪700余支（挺），攻克据点29处。把

敌占公路破坏得支离破碎。

涞灵战役 9月22日至10月10日，北岳区部队发起涞源灵丘战役。在20天作战中，共歼日伪军1100余人，缴获各种枪290余支（挺），攻克两城外围据点十几处。

分局扩大会议 9月下旬，北方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巩固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巩固与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基本政策问题。会后在全边区掀起了学习、宣传和拥护“双十纲领”的群众运动。

任、河、大、肃战役 10月1日至20日，冀中军民对敌发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20天共作战11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6挺，平毁据点29处，破坏铁路10里，公路300余里。

边区文联成立 10月10日至17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团体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该会组织章程和工作纲领，选举了领导机关，确定了当前边区文化运动的具体任务。成仿吾、李常青、沙可夫、何干之、周巍峙、田间等当选为边区文联执委，周巍峙、叶正宣为正副主任。

平西秋季反“扫荡” 10月13日至28日，敌集中10000余日伪军，分十路向我平西根据地中心区进行重点合击“扫荡”。我平西军民经过半月苦战，虽迫使敌主力撤退，但敌在昌平、宛平地区建立许多据点，并在高碑店至松林店铁路两侧和永定河沿河控制封锁沟，根据地大大缩小。

张学思率领抗大“东干队”来边区 10月下旬，张昉（即张学思，张学良将军的胞弟）、高存信率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原“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98人，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召开欢迎大会。11月下旬，“东北干部训练队”到达冀中平原，由冀中军区分配到军区各部任职。张昉被任命为军区参谋长。

“百团大战”后期 此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作战中心任务是粉碎日军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复“扫荡”。11月9日至1941年初，华北日军纠集12000余人，分13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凶残之极。北岳区军民经过50多天的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我军同敌人作战32次，毙伤日伪军4400余人。

冀中我军发动“冬季攻势” 11月15日至12月17日，冀中军民为了配合北岳区的冬季反“扫荡”，连续对敌伪发动两期冬季攻势作战。首先是破坏敌修通德（州）石（家庄）铁路的计划，打击敌人对冀中平原的点线分割；其后是奉命派两个主力团（十七团、十八团）挺进冀西，破坏平汉路和击敌侧后，在此期间，共作战110余次，毙伤日伪军1700余名，俘日军4名，缴轻重机枪各3挺、长短枪370余支，破铁路30里、破公路130余里。

“百团大战”中边区部队的辉煌战绩 在三个半月里，北岳、冀中、平西我军共作战657次，毙伤日伪军8700余人，俘日军88人，俘伪军830人，攻克据点109处，缴获各

种炮10门、轻重机枪59挺、长短枪1400余支、弹药10万余发。

平北军分区成立 12月间，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派遣程世才、段苏权率领主力团进入平北，建立了平北军分区，程世才任军分区司令员，段苏权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1941年至1943年5月)

1941年

边区党委改称北岳区党委 1月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改称北岳区党委，刘澜涛仍任书记，林铁任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胡锡奎任宣传部长。同时，晋察冀边区各群众团体，亦改称北岳区各群众团体。

南龙岗歼灭战 1月3日拂晓，我冀中部队第十七团在行唐以北南龙岗地区设伏，将行唐出动日军170余人，伪军100余人包围，经三小时激战，除六名敌人侥幸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此役缴获平射炮1门，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110支。我军指战员阵亡74名，伤156名。

皖南事变 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晋察冀边区军民纷纷抗议。声讨蒋介石集团的滔天罪行。

分局一月全会 1月中旬，北方分局召开全委会议，研究了晋察冀边区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方

针、任务。彭真、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分别作了报告。会议指出：华北是敌我必争之地，我们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边区的党拥有17万党员，军队发展到17.7万人，民兵发展到30万，根据地各项建设已有相当基础。全区党政军民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坚持长期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彭真赴延安参加“七大” 1月25日，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离开晋察冀边区，赴延安参加“七大”，离职期间，由聂荣臻兼代分局书记，刘澜涛任副书记仍兼北岳区党委书记。自此时起，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正式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6月上旬，彭真动身赴延安。

分局城委成立 1月间，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兼任城委书记。

“潘家峪大惨案” 1月25日，日军血洗冀东潘家峪，全村1700多人中，惨遭杀害的达1300多人，烧毁房屋1000多间，抢走全部粮食衣物。

冀中人民创造“地道战” 二三月间，冀中人民在反“蚕食”斗争中，创造了适宜平原地区对敌斗争的“地道战术”。最初是干部、群众用以避敌隐蔽的“地下室”，后来逐渐发展为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地道战”。

冀东办事处成立 3月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设立冀东办事处的决定，由朱其文任办事处主任。冀东办事处下辖：第六、十一、十四三个专署。

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自1941年春季起，敌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即由过去着重于军事“扫荡”，改为

逐步分割、“蚕食”的方针，并大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力战”，妄图以此逐渐分割缩小根据地，最后各个击破、聚而歼之。3月30日至4月3日，敌伪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运动重点是，对敌占区人民宣传反共、反八路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向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敌开始全面“蚕食”冀中平原 3月间，日军在冀中平原先以大清河北第十军分区为重点，随后，扩展至其他军分区，推行“蚕食”政策。先行“扫荡”，增设点碉、公路，迫使我军和各级干部撤离，随即派伪“联络员”，建立伪“爱护村”，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的全面统治。至10月份，冀中平原敌人的据点、碉堡由1940年的534处增至1026处，修建的公路由5500华里增至8634华里，封锁沟墙由1180华里增至5502里。铁路两侧遍挖了一至两条深一丈五尺、宽两丈五尺的封锁沟。根据地迅速缩小。

边区抗联会成立 5月15日，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北岳、冀中、冀北各群众团体与牺盟会代表，以及少数民族和各界来宾200余人。黄敬到会讲了话。大会通过了抗联会简章，选出侯玉田、杨耕田、王文兴等45人为执委，侯玉田（始终未到职）、杨耕田当选为正、副主任。

敌大举围攻冀东 5月29日至7月21日，敌调集主力两个师团，连同伪关东军共4万余人，大举围攻冀东抗日

根据地，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于平原地带。冀东我军第十二、十三团，同敌人连续打了几次恶仗，毙敌2000余，跳出合击圈。在此次反“扫荡”战中，我军主力损失很大，十二团团长陈群等数百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加强地方武装 5月份，为了适应对敌斗争新形势，晋察冀军区先后在北岳、冀中、平西编成35个直属于各军分区的“地区队”（相当于小团），增强了各地区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冀中第十军分区暂时沦为敌占区和游击区 6月10日至15日，敌集中2万余兵力，对冀中第十军分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保存革命力量，我第十军分区主力部队突围，暂时转移至平西山区。第十军分区所辖区域暂时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军分区领导机关南下转移到第九军分区白洋淀地区。

边区文化界抗联会成立 6月16日至21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文化界团体代表32人，大会通过了文联纲领、章程，选举产生了文联执委会23人，常委9人，沙可夫当选为主任。

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7月7日至9月8日，华北敌伪开展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其重点是所谓“实行剿共，巩固治安”，对我敌后各根据地加紧进行“扫荡”、“蚕食”。

冀中发动“青纱帐期战役” 7月22日至8月18日，为打击敌“蚕食”政策，冀中军区部队发起“青纱帐期战役”。20多天中共进行战斗86次；毙伤俘日军1300余人，

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50余支。毁敌汽车5辆，平封锁沟150余华里，破铁路9华里、公路32华里，毁敌碉堡14座，收复部分被“蚕食”地区。

驴山、西野北惨案 7月23日至24日，日军一部“扫荡”北岳区平山地区，在温塘镇西北的孤山——驴山中，制造了惊人的惨案，屠杀无辜群众800余人。8月5日，日军在曲阳制造西野北大惨案，日军以机枪扫射，当场死百余人，伤四五十人，对重伤者用刺刀挑死，对逃入室内者放火烧死。

北岳区粉碎敌秋季大“扫荡” 8月13日至10月10日，敌调集兵力7万多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北岳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空前残酷的秋季大“扫荡”。敌实行“三光”政策，并在平北、察南制造“无人区”。在反“扫荡”中，我军同敌作战800多次，毙伤敌5500余人，我军伤亡5900多人，群众被杀被抓2万多人。敌在我边区境内增修点碉100余处，筑公路1000余华里，挖封锁沟300余华里，北岳区第一、二专区变为游击区。

马本斋母亲英勇殉国 8月27日，驻河间日本山本司令官调集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日伪军千余人，凌晨将献县东辛庄村团团包围，逮捕了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老太太，妄图以作人质逼马本斋投降。马母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以绝食反抗敌人，9月16日遇难，时年68岁。

冀中军民发动大规模交通破袭战 9月2日至12月

初，为策应北岳区反“扫荡”和有力地打击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蚕食”政策，冀中军民对敌发动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据不完全统计，共炸毁敌火车4列、铁甲车2辆、汽车3辆，破坏铁路60余里、铁桥1座、公路800余里，平沟200多里，收割电线3.6万余斤，毁敌碉堡37处，歼敌1000余人，缴获机枪2挺、炮1门、长短枪500余支。

梨山、温碛惨案 9月12日，“扫荡”北岳区的日军同时制造梨山大惨案和平山温碛区大惨案，残杀无辜群众670余人，不少户男女老幼被杀绝。

挺进热南 9月15日，冀东地区组织武装工作队挺进热南。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斗争，在东起都山、西至雾灵山一带建立了小块游击区。

狼牙山五壮士 9月25日，日军2500余人，分兵六路围攻晋察冀易县狼牙山，企图消灭我第一军分区第一团。该团以七连六班扼守险要，掩护主力转移。该班同敌搏斗一天，杀伤日军90余人，最后只剩下班长马宝林等5战士，弹药用尽。当敌人逼近时，他们砸毁枪支，一齐跳下深崖，马宝林、胡德林、胡福才3人当场壮烈牺牲，宋学义、葛振林2人被树枝挂住，负伤遇救。

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1月1日至12月25日，华北敌伪实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其重点是配合对各根据地的“扫荡”、“蚕食”，进行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

军区发动大规模交通破击战役 11月10日至12月10日，为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晋察冀军区统一部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交通破击战役。北

岳、冀中和平西，发动群众30余万，共平封锁沟380余华里，破坏公路840余华里，毁封锁墙132华里，毁敌碉堡、岗楼、哨棚170余个，割电线1.7万余斤，毙伤敌伪军1400余名，抓捕伪组织人员、特务汉奸500余名。

冀东发动打伪治安军战役 11月14日至1942年2月15日，冀东根据地军民发动打伪治安军战役，取得辉煌战果。近3个月中，作战23次，歼灭与瓦解伪治安军7个整团，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71挺、各种炮12门，使华北伪治安军溃不成军。此战役的重大胜利，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全区已在7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辖行政村3000多个，人口200余万，全区共产党员发展到4200人，青年救国会会员已达10万余人。

加强敌伪工作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本月中、下旬，晋察冀党政领导机关先后发出指示，要求边区全党全军全民利用日军扩大侵略战争之时机，抓紧开展瓦解敌伪的强大政治攻势。对日军，主要促其反战厌战。对伪军、伪组织，主要促其及早回头，立功赎罪。在12月18日至翌年6月的半年中，北岳区军民先后对敌伪开展了两期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收到极大效果。

1942年

北岳区成立人民武装部 1月1日，北岳区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改为人民武装部，程世才为第一任部长。随后，各专区亦将武委会改称人民武装部。

冀中军民开展反蚕食战役 战役从1月6日至11日，

共作战27次，攻克据点两座，毙日伪军392名，伤日伪军287名，俘日伪军及汉奸119人。破坏铁路一段、公路80余里，毁敌碉堡12座，平封锁沟80余里，炸毁机车1辆、车厢8节、坦克1辆。

分局高干会议 1月15日，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召开分区以上高干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自1942年2月起，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整编三级武装，确定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强调加强党性锻炼等问题。

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政策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上述两个重要文件，全面地总结了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贯彻减租减息的基本经验，有力地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偏向，使减租减息运动得到健康发展。

肖克调任军区副司令员 1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机构撤销，原挺进军司令员肖克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将平西地区改为第十一军分区，平北地区改为第十二军分区，冀东地区改为第十三军分区，均归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冀热察的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委，也改称第十一、十二、十三地委，归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

军区部队再次整编 2月2日，晋察冀军区发出精兵简政整编命令。这次整编，主力军分别编为甲种团和乙种团。北岳区（包括前冀热察区）整编甲种团六个、乙种团

十六个。骑兵团改编成骑、步兵各一个营。冀中区整编甲种团五个，乙种团五个，此外，尚有抗大第三团，骑兵第二团和一个回民支队。地方军分为地区队、县基干游击队与区基干游击队。全军区已有了30个地区队。第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整编后有7个乙种团，8个地区队。

冀中平原大部变成游击区 2月至4月，敌多次调集几百至几千人兵力，对冀中平原根据地分区“扫荡”和逐步“蚕食”，在敌占区强化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在游击区，增设点碉，修建公路，挖建封锁沟墙。至4月底，敌在冀中平原已建点碉1125个，修公路4370余华里，筑封锁沟墙3530余华里。我大部队能活动的根据地基本区只剩下3000多个村庄，人口约280万。与1940年相比，根据地缩小了2/3。

“南村惨案” 3月11日，日军制造灵寿城南村惨案，全村男女老幼800余人被残杀在封锁沟里。

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从3月30日至6月15日，其主要目的是：“为适应大东亚战争及完成大陆作战计划”，“谋得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两大目标”。

冀热边“无人区” 三四月间，敌人为了割断我长城内外的联系，摧毁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在长城内外的山岳区域实行集家并村，制造了从古北口至山海关长达700里、宽80里的“无人区”和“人圈”。

冀东“四一反扫荡” 4月1日至6月20日，日军4万余人，四面围攻、“扫荡”我冀东抗日根据地之中心地区。冀东我主力部队第十二、十三团，5月初跳出敌之包

围圈，转移到长城外热南地区。“扫荡”中，我后勤设施遭彻底破坏，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房屋、家具全被烧毁，干部牺牲很多，约有2万群众遭敌屠杀，2万余青壮年被抓到东北、日本当劳工。

奇袭石佛镇 4月7日，冀中第七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奇袭安国县东石佛镇敌重要据点，激战后，占领该镇，俘伪华北治安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旅长、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缴获大炮3门、步枪200余支、短枪30余支、子弹13000余发。

“鲁家峪惨案” 4月18日，日伪军4000余人，在遵化县鲁家峪地区“驻剿”半月之久，疯狂屠杀当地群众190余人。

冀中“五一”反“扫荡” 5月1日至6月底，华北敌酋冈村宁次调集日军3个师团主力和5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及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配备飞机、汽车、坦克、炮兵、自行车队，由他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所谓“十面出击”、“铁墙合围”的“拉网大扫荡”，企图一举彻底摧毁这个处于华北日伪心脏部位的平原抗日堡垒。在整个反“扫荡”战役中，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和我方对形势估计不足，在予敌以重大杀伤的同时，我党、我军遭到极大损失，不少重要军政领导干部壮烈殉国。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争中，我主力部队同敌作战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我军伤亡1万余人，地方干部损失很大，各阶层人民被日军残杀和抓走共5万余人，冀中平原共有8000多个村庄，而敌军据点、碉堡就

有1753处，封锁沟达6000多华里，根据地被分割为2670个小块。5月底6月初，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暂时撤出冀中平原，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朱德、彭德怀电勉冀中军民 5月1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彭德怀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全体指战员，嘉奖冀中军民顽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号召渡过艰险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个战略区积极出击，以钳制敌人。

“北疃大惨案” 5月27日，“扫荡”冀中之敌一一〇师团一六三联队长上板雄大佐，率500余日军，进攻定县北疃村，我第七军分区驻军与敌激战6小时，予敌以重大杀伤，最后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军被迫同该村1000多群众进入地道。敌人进村后，即堵塞出口，挖掘地道，施放毒气，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共伤亡800多人。

白庄防御战 5月29日，冀中第十七团一个连和警备旅半个连及地方武装一部计300余人，在深泽县白庄村被1000余敌人包围。我军由十七团副营长张子明统一指挥，依托地道战斗竟日，打退敌人五次冲锋，毙伤敌指挥官晋藤联队长以下200余名，夜间胜利转移。

开辟热南 5月间，我冀东军分区为开辟热河地区，出动4000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对敌展开攻势，连克兴隆北水泉、承德县榆树沟、平原县椴栲树、宽城亮甲台等敌伪据点13处，使承德、平泉、兴隆、宁城、青龙、

绥中广大地区相接，并与冀东根据地联成一片。同时，转移到长城外的冀东八路军主力第十三团，以五龙山为中心，配合平北第十团向西北积极发展。第十二团以都山为中心向东北活动，月余时间在原有基础上，使小块游击区连成一片，建立起热南山区游击根据地。

宋庄防御战 6月9日上午，“扫荡”冀中之敌板本旅团精锐部队300余人，合围深泽县宋家庄。我军第十八团、第二十二团、警备旅一团各一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共1000多人，在二十二团团团长左叶统一指挥下，据守村落英勇奋战，打退敌数次冲锋。下午1时至5时，敌陆续增援到1800余人，向我猛烈围攻，我军沉着应战，血战16个小时，击退敌30多次冲锋。至深夜，我军分两路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少将坂本吉太郎，毙伤敌军800余人。

掌史突围 6月12日，吕正操、黄敬、沙克、卓雄、张昉率领冀中领导机关部分干部及二十七团（两个营），跳出敌“扫荡”合围圈，转移至冀南区南营、成县之间的掌史村，被敌1300余人包围。我军依据临时构筑的工事，与敌血战竟日，于夜间胜利突围，越过平汉路到达晋东南地区。这次战斗，共毙伤敌300多人，我军伤亡90多人。这一胜利，受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冀东“青纱帐复仇战役” 6月15日至7月底，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为恢复原中心根据地工作和配合冀中反“扫荡”，从热南返回长城内，发动了以打击日军为主的“青纱帐复仇战役”。此役我军共作战50余次，毙伤日军

联队长蒲田少将以下官兵686人、伪军584人，俘伪军591人，缴获重机枪3挺、轻机枪23挺、长短枪570余支，毁敌汽车27辆。经此次战役胜利，不仅恢复了根据地中心区工作，还开辟了滦河东及北宁路南地区的工作。根据地人口发展到279万。主力部队发展到5090人，地方武装达1920人。

冀中各军分区主要领导成员重大变动 7月5日，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从太行山区发出“关于扫荡冀中之敌军大部撤走后我恢复工作的布置”。决定：今后各军分区领导机关完全实现地方化，地委书记均兼任政治委员，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任命以下同志为各军分区主要领导干部：（一）六军分区司令员马迎泽，政治部主任龙福才；（二）七军分区司令员尹诗炎、政治部主任甘春雷；（三）八军分区司令员姚广同、政治部主任张逊之；（四）九军分区司令员孙然、政治部主任方国南；（五）十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治部主任吴建中。

平北夏季反“扫荡” 7月9日至8月中旬，敌调集万余兵力，向平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扫荡”。平北我军以大胆向游击区挺进，往返调动敌人加以打击，迫使敌人陆续撤出中心区，于8月19日结束“扫荡”。这次反“扫荡”中，我军作战38次，毙伤敌伪军291名，俘30名（其中日军3人），缴获轻重机枪1挺、步枪18支。

成立冀东地委 7月15日，晋察冀分局决定成立冀东地委，以李楚离、李运昌、周文彬、张致祥及潘峰为常委，

李楚离为书记。18日，决定段苏权为第十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并代理平北地委书记。

北岳区学委成立 7月18日，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晋察冀北岳区成立学习委员会，刘澜涛、胡仁奎任正、副主任。学习委员会制定了学习条例和半年学习计划。自8月1日起，晋察冀机关和北岳区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分局设东北工作委员会 8月间，晋察冀分局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聂荣臻兼任书记，韩光为副书记。同时，决定在冀东也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李楚离兼任书记。

分局寨北高干会议 9月11日，在聂荣臻主持下，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确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口号的。此次会议对于扭转全边区对敌斗争被动局面、逐渐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和开展敌占区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

冀东秋季反“扫荡” 9月14日至12月中旬，敌调集64000余人，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战役开始不久，我军主力避敌锋芒，先期转入关外热南山区，仅留少数精锐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分散游击活动，并组织武工队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敌人在3个月的“扫荡”中，在我根据地腹心地区惨无人性地实行“三光政策”，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冀东根据地大部变为游击

区。

程子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 9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黄敬调任冀鲁豫分局书记，由程子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任副书记。此时，冀中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迁至北岳区唐县洪城、张各庄等村。10月下旬，吕正操、卓雄率领冀中部队和干部从太行到达北岳区，同冀中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会合。

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从10月8日至12月10日，华北敌人实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和目标是进行“军、官、会、民总动员”，配合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实现“灭共”，以及加紧对占领区的物资掠夺。

“潘家岱大惨案” 10月28日，日军血洗冀东滦县潘家岱庄，全村1280名男女老幼同胞被屠杀，家什牲畜被抢光，大部分房屋被烧毁。

雁北指挥部成立 11月间，晋察冀军区雁北指挥部奉命成立，韩伟任司令员，罗元发兼任政治委员。

1943年

边区政府号召全民加强对敌斗争 1月1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表《元旦告边区同胞书》，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提出了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七项任务：（一）加强民兵工作；（二）随时准备反“扫荡”；（三）提高警惕，清查汉奸；（四）争取伪军、伪组织；（五）不资敌，保卫抗日干部；（六）瓦解敌军；（七）拒用伪钞。

首届边区参议会召开 1月15日至21日，晋察冀边区首界参议会在阜平温塘村开幕，到会参议员288人，来自晋东北、冀西、冀中、冀东、平北、平西、察南、雁北各地区、游击区和敌战区，包括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共30余人）、无党派人士、开明士绅、文化界人士、科学技术专家、少数民族代表、各群众团体代表、军队代表及敌占城市的抗日爱国人士等。大会选出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成仿吾、于力、阎力宣、李楚南等11人为大会主席团。聂荣臻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宋劭文作了《五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大会决定以中共晋察冀分局提出的施政纲领（即“双十纲领”）作为边区目前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9人与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最后通过会议宣言。成仿吾当选为议长，于力为副议长，推选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王斐然为高等法院院长。

冀中区党委“张各庄”会议 1月间，在程子华主持下，冀中区党委在完县张各庄村召开来路西汇报工作的各地委书记会议（又称“张各庄会议”），详尽研究和总结了自1942年“五一”反“扫荡”以来，冀中平原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教训，明确规定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和具体策略，决定彻底精简党政军机关，把编余的军队干部组成军区干部教导团，地方党政群干部到分局和区党委党校学习。

军区部队进行整编精简 一二月间，晋察冀军区部队

再次进行整编和精简。把所有大团改为小团。经过精简，北岳区共编为19个团，10个区队；冀中区共编为6个团，11个区队。冀中的6个团编入北岳区序列。撤销第十二军分区，将平北划为两块，东部划归冀东区，西部归平西地委领导。

冀热边发动恢复基本区战役 2月1日至20日，冀热边发动了恢复基本区战役，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十一、二、三3个主力团，分左、中、右三路，由热河向关内挺进。消灭一批日伪军，摧毁一部分伪组织，使丰（润）、玉（田）、遵（化）和丰（润）、滦（县）、迁（安）地区基本恢复。当时，为了适应形势需要，除充实主力外，还扩编了7个地区队，每区队下辖3至5个连。

日人华北反战团体成立 2月11日，晋察冀日人反战同盟与冀中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召开“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地方分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宫本哲治、津田秀、渡边、上原建治、东忠5人为执行委员，宫本哲治、津田秀当选为正副书记。

边区经济委员会成立 3月1日，北方分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与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决定》，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经济委员会，程子华兼主任。3月5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在专区和县亦成立经济委员会。

“刘庄惨案” 3月1日拂晓，灵丘北泉据点之日军40余人包围刘庄，以“开会”为名，强迫200余村民集合在屋内，然后纵火焚烧，215名男女老幼同胞惨死，灭门21家。

冀中平原根据地逐渐恢复 三四月间，冀中平原根据地工作已经逐渐恢复，首先打开第十军分区（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局面，继而先后恢复了第九、八、七军分区的局面，游击根据地日益增多，地方武装不断扩大，形势日渐好转。

北岳区粉碎敌“辗转扫荡” 4月19日至5月17日，敌纠集1.2万余人，对北岳区东部地区，由南而北地进行分区“辗转扫荡”。在反“扫荡”中，主力部队采取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极打击进犯之敌；民兵积极开展地雷战；活动在敌后的小部队则乘敌后空虚，积极打击敌伪，开辟新地区。我军共作战25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2500余人，缴获长短枪23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分局抽调大批中高级干部赴延安学习 春夏之交，晋察冀分局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和保存干部的指示，先后从游击区（主要是冀中平原）分期分批抽调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干部近千名，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野场村惨案” 5月7日，日军把完县野场村200余名无辜群众赶到一起，以机枪扫射，并把没有断气的人用刺刀挑死，有118人惨遭杀害，54人身受重伤。

“狼牙山惨案” 5月14日至17日，日军对北岳区易县狼牙山周围进行“扫荡”，残杀群众300余名，伤200余名，烧毁房屋7000余间，抢去牲口500余头。狼牙山麓纵横50余里，70余村，变成瓦砾焦土。

北岳区被“蚕食”地区开始恢复 五六月间，由于北岳区自1942年实行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和执行党的一元

化领导，使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挫败了敌人的点碉沟墙、“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半年中，共恢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建立了多块游击根据地和隐蔽根据地。

根据地恢复和再发展时期

(1943年6月至1944年4月)

1943年

边区参议会提出当前三大任务 6月6日，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发表《告边区同胞书》，提出当前三项重要任务：（一）开展李勇爆炸运动；（二）加紧生产事业；（三）巩固民主政治。

冀东再次发动恢复基本区战役 从6月下旬至8月底，共作战87次，攻克敌据点22个，碉堡17座，歼敌2337人。根据地已有22个联合县政权，118个区，9094个村，363万人，武装部队发展到10050人。至1943年末，冀东被敌“蚕食”地区已基本恢复。

分局动员全边区党员干部深入整风学习 7月1日，晋察冀分局举行盛大的干部晚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动员全边区党员干部深入整风学习，到会的有分局、军区、北岳区党委及各机关团体党员干部近千人。刘澜涛宣布开会后，聂荣臻作了《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

冀热边特委和冀热边行署成立 7月7日将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十三专署改为冀热边行署，十三军分区

改为冀热边军区。下设五个地委，五个军分区和五个专员公署。李运昌任特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行署主任。李楚南任特委副书记，朱其文任行署副主任。特委委员有周文彬、李子光、李中权、朱其文、苏林燕、于振军、曾克林、吕光、焦若愚等。一地委书记李子光；二地委书记苏林燕；三地委书记徐志；四地委书记丁振军；五地委书记焦若愚。7月7日，在冀东某地举行行署正式成立典礼，到会军民5000余人。

吕正操率冀中主力部队到晋西北 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电示聂荣臻、肖克并转吕正操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从晋察冀军区调六个主力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到晋西北待命。8月27日，吕正操率原冀中军区一部分军政干部和七个主力团，分左、右两个纵队，先后从北岳区启程西进，9月中旬到达晋西北兴县地区。

平北粉碎敌秋季“扫荡” 8月8日至9月中旬，敌人以6000多兵力，突然向平北发起“扫荡”进攻，企图一举将我北山地区主力部队消灭。平北军民经过40天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成员名单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人：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肖克、杜里卿（许建国）、赵振声、刘仁为分局委员，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克为副司令员。聂荣臻到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随后，对分局其他成员亦作了如

下变动：组织部赵振声为部长，刘仁、林铁为副部长；宣传部刘澜涛为部长，胡锡奎为副部长；姚依林为秘书长。

北岳、冀中工委成立 8月25日，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合并，建立北岳区和冀中区工作委员会。北岳区工委由林铁、刘澜涛、胡锡奎3人组成，林铁为主任。冀中区工委由马辉之、周小舟、张国坚组成，马辉之为主任。

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七大” 8月27日，聂荣臻奉命从阜平地区启程，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 8月末，北岳区抗联会与冀中抗联会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杨耕田任主任，岳志坚任组织部长，沙可夫（后冯宿海）任宣传部长，王文兴任工人部长，郭强任农民部长，白芸任妇女部长，刘国华任青年部长，顾德任秘书长。

敌对北岳区发动毁灭性秋季大“扫荡” 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3个月的“毁灭扫荡”，其目的在于彻底破坏我北岳区根据地，毁灭我军生存的物质基础。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5600多次（包括民兵），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迫使敌军退出根据地。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

敌在冀中推行“新国民运动”失败 10月初，驻冀中日军为了阻止我恢复和扩大地区，推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在任丘、高阳地区作“突击示范”，把群众圈去3万多人，妄图以活埋、不准吃饭喝水等手段，威迫群众交出隐藏的武器、

粮食，供出我地下组织名单。许多人被饿死、杀害，宁死不屈，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敌这一阴谋迅速破产。

“平阳大惨案” 10月18日，进攻北岳区之日军荒井大队500余人，以阜平平阳为中心，对四周四五十里以内100多个大小村庄残酷“清剿”，用枪杀、火烧、刀刺、活埋等残忍手段，杀死群众1000余人。

冀热边大力恢复热南 10月11日，冀热边特委作出《关于恢复热南工作的决定》，指出：热南形势的好坏，对整个冀热边形势有重大关系。因此，恢复坚持与巩固热南阵地，是我冀热边全党的紧急任务。随后，加强了热南游击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力量。

“黑水坪惨案” 11月24日，进攻北岳区日军，在井隆县黑水坪附近捕去无辜平民（包括妇女、老人、小孩）400余人，集中在黑水坪村全部杀害。

“岗南惨案” 12月12日拂晓前，日军将平山县东西岗南村包围，抓捕群众134人，其中有27人被驱至村东用刺刀挑死，其余被活活烧死。

1944年

中共中央电贺敌后军民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敌后军民贺电》。指出：在抗战六年半的长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最前线。1943年，你们战胜100万敌伪军几十次的“扫荡”、破坏，克服了严重困难。贺电还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

边区各级党委成立整风委员会 1月1日，晋察冀分

局作出《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县以上党委成立整风委员会，在全区造成普遍深入的整风热潮。

桃林营伏击战 1月12日，冀东八路军第十二团3个连在卢龙东北的桃林营伏击由侯各庄向燕河营护送给养的伪绥靖军约500余人，经一个半小时战斗，生俘连长以下188名，毙营长以下80余名，缴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148支、子弹1.2万余发。

分局确定边区党四项中心任务 1月20日，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1944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指出这一年应将“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全年大生产运动，贯彻完成整风，强化时事教育”作为边区党的中心任务。

冀中春季“摧碉战役” 2月初至4月底，冀中八路军发动春季“摧碉战役”，各专区、县、区党政军群积极动员组织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两个月中，共攻克、迫退敌人据点碉堡519处，使盘据冀中敌人据点碉堡由1943年的1082处减至563处。

边区军民掀起大生产热潮 2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敌后解放区，开展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为此，晋察冀分局、军区、边区政府和各地委、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同广大军民一起开荒、种菜、搞副业、筑河坝，全区军民掀起了生产热潮。

马本斋病逝 2月7日，优秀回族共产党员、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在莘县逝世，终年43岁。

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 2月10日至14日，晋察冀边区

党政军民联合在阜平召开第一届群英大会。由于冀中、冀东和平北各根据地同北岳区尚处在分割状态，交通不便，所以只有北岳区的英雄模范人物参加。北岳区的英雄模范共104名（其中一部分还在医院养伤），实际到会70人。边区党政军民领导人程子华、刘澜涛、宋劭文、成仿吾、杨耕田等以及各界代表出席了大会。在群英大会上，晋察冀分局、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边区行政委员会暨边区抗联联合决定：赠予邓世军以“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赠予李勇以“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赠予戎冠秀以“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母亲”的光荣称号。最后通过了大会宣言和致毛泽东、朱、彭总副司令电。

边区召开司法会议 3月13日至23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召开司法会议。会议以座谈方式进行，对边区6年来司法工作作了全面总结，清算了司法人员的旧思想，加强了群众观念，介绍了司法工作的先进经验。会上，边区高级法院院长王斐然作总结发言，宋劭文主任作总结报告。

分局确定北岳区发展方向 3月24日，为利用敌统治弱点扩大我之阵地，晋察冀分局决定，北岳区向北发展，于年内打开察南10县及平绥路应南雁北地区。第一、二军分区和雁北、平西军分区应各有重点齐头并进，二分区应以山阴为主，加强武装与工作，向北向东发展；雁北以大力向西（桑干河两岸和大同、怀仁等地）；平北应向北向东发展，使察南10县全归我有，并和平西完全连结，从而全面夹击平绥路。为加强察南、雁北结合地带工作，弥

补其空隙，分局决定阳原、广灵及蔚县之一部（西合营、北水泉以西地带，具体村庄由平西提出具体意见），划归一分区，以此为阵地，逐步向北（天镇等地）发展。

军区 6 个主力团和抗大二分校调陕甘宁边区 3 月底 4 月初，晋察冀军区第一、五、九、三十四、三十五团和骑兵团，编为教导第二旅，调赴陕甘宁边区。抗大二分校和白求恩医院之大部、陆军中学和抗大附中全部，也先后调赴陕甘宁边区。

耿长锁“土地合伙组”的诞生 春季，冀中饶阳县五公村老贫农耿长锁响应党和政府“生产渡荒”的号召，带头成立四户贫农参加的副业打绳组，不久，发展为“土地合伙组”。这是冀中平原最早出现的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互助组织。五公村“土地合伙组”的诞生，对推动冀中平原广大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察冀地区协会成立 4 月 3 日，举行成立大会，津田秀、宫本哲治、渡边冕、林一雄、中山太郎 5 人当选为联盟负责人，津田秀当选为联盟委员长，宫本哲治为副委员长。

根据地军民对敌展开攻势 和举行全面反攻时期

(1944 年 5 月至 1945 年 9 月)

1. 9 4 4 年

沟里镇大捷 5 月 2 日，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在行唐县

沟里镇伏击伪绥靖军第六集团军第十五团，获得大捷。击毙日本指挥官、伪营长、连长以下35人，伤伪连长以下43人，俘伪团长以下官兵47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50支，短枪9支，子弹1000余发。我军伤亡15名。战斗后，敌伪十分恐慌，5月3日，该地区敌伪连撤18个碉堡。

冀中“护麦战役” 5月20日至6月底，冀中部队发起“护麦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各部队作战100余次，攻克、逼退点碉42处，毙伤日伪军306名，俘伪军1170多人。敌人在冀中平原的点碉已不到450处。

夜袭文安城 5月24日，冀中第九军分区部队夜袭文安县城。城内伪军300余人全部投降。25日，该地日军60余人，在两架飞机掩护下，乘12艘汽艇、木船仓皇逃跑，我军击伤其飞机1架，缴获汽艇1艘，解放了文安县城。

冀热边夏季攻势 五六月间，冀热边区我军对敌发动夏季攻势，收复蓟（县）玉（田）宝（坻）地区，冀东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这时，冀热边行署下辖5个专区、19个联合县和2个办事处。部队扩大为3个团、9个地区队、7个县游击队和众多的区游击小组，共计12000多人，比1942年壮大了一倍。活动地区：东至伪满锦州省境内，西至密云、通州、武清，北至热河凌源，南至渤海。

加强城市工作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占领大城市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应把占领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提到极重要地位。晋察冀各地区，从1944年起，进一步加强了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县以上党委建立了城工部和敌工

部，靠近交通要道和敌占区城市的区党委和支部都设立了敌工委员。

冀中“青纱帐战役” 6月10日至7月20日，冀中军民向敌伪发起青纱帐战役，毙俘敌（主要是伪军）3000余人，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0余支及大量各种物资，攻克据点数10处。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任主编。全书分5卷，约50万字。它是我国革命出版史上最早的《毛泽东选集》。

分局柏崖高干会议 7月中旬至10月上旬，晋察冀分局在阜平县柏崖村召开扩大的高级干部会议。边区县、团级以上干部30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全面总结六年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会上，程子华作了关于形势估计与军事方针的报告，刘澜涛、赵振声、朱良才分别作了地方和部队工作情况的报告。

冀西、晋东北联成一片 7月20日至8月底，北岳区八路军扫除敌第一线点碉，使晋东北与冀西联成一片。

开展“满洲”工作 9月4日，中共中央就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的局面，而且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特决定：晋察冀分局、冀中和冀热地区，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敌疯狂“扫荡”冀热辽区 9月15日至翌年1月底，敌人为了确保东北与华北之交通“咽喉地带”，集中日伪军6.6万余人，对我冀热辽根据地展开了空前大规模的“扫荡”、“围剿”。在反“扫荡”中，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党政军民，就地分散，坚持斗争，一面反“扫荡”，狠狠打击敌人；一面抓紧空隙时间，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至1945年1月底，敌“扫荡”被粉碎。冀东部队在反“扫荡”中共作战106次，攻克和迫退敌据点58处，击毙伪军1100余人，俘伪军1200余人，伪军反正187人。缴获各种枪炮子弹甚多。

晋察冀军区组成四个二级军区 9月19日，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军区。赵尔陆为冀晋军区司令员，王平为政治委员，张连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开荆为参谋长；郭天民为冀察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易耀彩为参谋长；杨成武为冀中军区司令员，林铁为政治委员，李志民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沙克为参谋长；李运昌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詹才芳为副司令员，彭寿生为参谋长，李中权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晋察冀军区共辖18个军分区。

肃宁县全境解放 9月29日夜至30日晨，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肃宁县城周围据点，俘伪副联队长及大队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枪枝和其它物资甚多。自此，肃宁县全境宣告解放。

晋察冀边区成立四个行署 9月30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设冀晋区、冀察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四个

行署。杨耕田为冀晋行署主任。张苏为冀察行署主任。罗玉川为冀中行署主任。李运昌为冀热边行署主任。

冀晋、冀察区党委的成立 9月下旬，原北岳区成立冀晋、冀察两个区党委。冀晋区党委书记王平，委员有赵尔陆（司令员）、王昭（副书记、组织部长）、杨耕田（行署主任）、易清源（社会部长）、王延春（宣传部长）、苟长武、方国华、唐子安等。冀察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委员郭天民（司令员），张苏（行署主任）、段苏权、牛树才（组织部长）、梁正美（敌工部长）、冯骥（社会部长）、易耀彩、阎子庆等。

冀中区党委的恢复 10月10日，冀中区党委正式恢复，林铁、金城、杨成武、罗玉川、李志民、王奇才为区党委委员，林铁、金城、杨成武、罗玉川、李志民为常委，林铁任书记。同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把经过战争锻炼的游击队上升为地方主力，编成六个地区队。

冀东杨家铺大惨案。周文彬、丁振军等领导干部壮烈牺牲 10月17日，冀热辽特委和行署机关在丰润县杨家铺村遭日伪军5000余人围攻。200多名干部牺牲，70多人负伤。这是晋察冀边区损失干部最严重的一次。

下村定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11月22日，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离职，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原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调任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由下村定中将续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 12月20日，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阜平隆重揭幕。除冀热辽因反“扫荡”未能出

席外，冀察、冀晋、冀中三区到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共389人，到会各级干部290余人，连列席旁听者，共800余人。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参加了大会。程子华向大会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宋劭文作了《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及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报告。大会一致决议通电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呼吁为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会议在检阅胜利、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布置了1945年的战斗、生产任务。大会于1945年1月30日闭幕。

刘石各庄歼灭战 12月22日夜间，冀东八路军第一区队与内线配合，巧取滦县南50里刘石各庄敌重要据点，伪绥靖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团全部被歼，计生俘伪军官兵450余名。

刘澜涛、肖克赴延安参加“七大” 12月间，刘澜涛、肖克赴延安参加“七大”，由程子华兼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1945年

冀热辽区党委、军区、行署的成立 1月上旬，冀热边特委改称冀热辽区党委，同时，冀热军分区改称冀热辽军区，冀热边行署改称冀热辽行署，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行署主任，李楚离任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委员还有：张明远、詹才芳（兼军区副司令员）、李中权（兼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林晏、钟子云、李子光等。彭寿山任军区参谋长，才山任军区副参谋

长。此时，全区已扩大为21个县，人口达590余万，武装部队已有9个主力团，13个县支队，共20300余人。

冀热辽发动“打伪军战役” 2月初至5月底，冀热辽军区发动了打伪军战役。2月5日至3月底，我集中力量先后打击北宁路北之平（谷）三（河）密（云）、三（河）通（县）香（河）、密（云）通（县）顺（义）地区和北宁路南之昌（黎）滦（县）乐（亭）地区以及古北口以东之长城内外地区的伪军；四五月份，集中打击北宁路南及遵化一带之伪军。我军采取伏击、袭击等战术，在广大群众和民兵配合下，取得重大胜利。在4个月中，共与敌作战230次，毙伤俘日伪军5035名，缴获炮3门、轻重机枪21挺、各种枪1000余支。攻克和逼退一批点碉，粉碎了敌人集家并村的阴谋。这时，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得到大量补充，士气大振。

冀中区生产委员会成立 3月14日，冀中生产委员会成立，罗玉川任主任，林铁、李志民、王耀华、梁耀、李国华、韩启民（女）、张省三为委员。

冀热辽边区首届群英大会 3月16日至19日，冀热辽军区举行首届群英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共3000余人，到会部队英雄模范87名，民兵爆破英雄、拥军模范与模范工作者30名。李运昌司令员、张明远主任出席了大会并给英模发奖。

灵丘县全境解放 3月30日，晋察区部队攻克灵丘县城。这时，晋察冀边区已控制3个完整县，即冀晋区之阜平、冀中之肃宁及新收复的灵丘。

冉庄民兵地道战 4月1日，从保定出动日伪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清苑县冉庄进犯，该村民兵依靠地道英勇抵抗，几次打退敌人。1945年春季，冉庄民兵依靠地道对敌斗争共17次，杀伤日伪军150余人，使敌始终未能进入冉庄。冉庄是冀中平原进行地道斗争的模范村，这里的地道宽1米、高1.5米，顶上土厚2米左右，弯弯曲曲长达50华里。

冀中发动春季攻势 4月13日至5月28日，冀中区部队向敌伪发动春季攻势。这一攻势，是由连续举行的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安（平）战役和武强战役所组成。历时54天，进行大小战斗330次，毙伤俘日伪军3700多名。先后收复任丘、河间、新镇、饶阳、安平、武强、文安、深泽等8座县城，拔除村镇点碉359处，解放村镇527个，把大清河以南、沧石（镇）路以北，子牙河以西，潞龙河以东的基本区连成一片。

中共“七大”开幕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

冀中加强回民工作 5月3日，冀中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回民工作重点是在吸收回民参加政府工作，发展回民党员，提拔回民干部。

德国投降 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8日，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冀晋发动雁北攻势 5月12日至7月3日，冀晋军区

对敌发起夏季攻势，主要进攻方向是雁北浑源、应县、山阴地区和桑干河两岸，以及平绥路阳高至大同两侧地区。参加部队6个团、6个县支队和3个武工队。对冀西及正太路、同浦路等方面，则积极排退敌人点碉，向敌占区伸展。经过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共攻克和逼退日伪据点40多个，毙伤俘日伪军11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6挺、长短枪300多支，解放雁北9个县783个村庄，人口约44万。这一战役，使平绥路以南成为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利于我军进一步开辟路北和向绥东地区发展。

冀察区发动察南攻势 5月12日至7月11日，冀察军区集中主力部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发动了夏季攻势。主要进攻方向是察南，并向平绥路两侧和察北发展，目的是使冀察、冀晋新解放地区连接起来，控制察南、察西，开辟察北和热河西南地区。经两个月作战，毙伤俘日伪军1900余名，缴获炮2门、轻重机枪21挺、长短枪2089支、战马102匹、电台2部，攻克怀安、来源、崇化县城3座，拔据点117处，解放人口约57万。这一胜利，把察北、热西、平西的局面打开，使冀察、冀晋新解放区联成一片。

冀中发动夏季攻势 6月8日至7月18日，我冀中部队对敌发起夏季攻势。这一攻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子牙河东战役，6月8日起至7月2日结束，共进行大小战斗123次，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8挺、掷弹筒40个、长短枪1950支。收复了大城、献城两座县城，拔除了子牙河沿岸日伪的全部据点共37个，解放人口25万、村镇272个。第二阶段是大清河北战役。7月12日

起至27日结束，共作战70次，毙伤俘日伪军3500多名，缴获迫击炮7门、轻重机枪54挺、长短枪2000多支，收复县城1座，拔除据点70余处，解放人口75万。部队逼到平津市郊，使大清河北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局面。冀中平原经过对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已形成包括12个完整县、1.18万多个村镇、近900万人口的解放区，正规部队增至3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0余万人。

冀热辽发动“挺北战役” 6月12日至7月下旬，冀热辽军区部队分西、中、东三路同时北出长城，开展热辽战役（“挺北战役”），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消灭数百名敌伪军，摧毁了敌在热南建立的部分“人圈”，在锦热路南开辟了广大地区。至7月底，冀热辽区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至六七百万人，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5万人，建成10个主力团，民兵发展到27万余人。

苏联对日宣战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100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

边区军民对日举行全面大反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限令日伪军投降，命令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向敌伪举行全面反攻。8月12日，晋察冀军区各路反攻大军，分别逼近天津、北平、张家口、塘沽、唐山、保定、石家庄近郊，准备对敌展开猛烈进攻。

晋察冀军区命令华北日军投降 11日，晋察冀军区奉

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命令，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大将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并飭所部无条件投降，如拒绝，将遭到武力消灭。各二级军区和军分区，也向被围困的日伪军发出通牒。

冀热辽主力部队挺进东北 8月12日，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行署副主任朱其文等率领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八个主力团和“朝鲜义勇队”共10000余人及四个地委书记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跨越长城，向东北挺进。

日本宣布投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边区我军同苏军在察北会师 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察哈尔省之张北、康保、多伦、新明（又名化德）等4城。晋察冀我军一部与苏蒙联军会师。8月下旬，向东北挺进的冀热辽部队先后在承德、平泉、兴城等地同苏军会师。

晋察冀中央局成立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赵振声、肖克、罗瑞卿、刘仁、许建国、胡锡奎、朱良才、成仿吾、赵尔陆、李运昌、詹才芳14人为晋察冀中央局委员，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赵振声、肖克、罗瑞卿六人为常委，聂荣臻为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姚依林为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罗瑞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潘自力为副主任。9月9日，聂荣臻、

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由延安乘苏联飞机到达张家口。9月1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

解放华北重镇张家口 8月23日，冀察军区部队解放华北重镇、伪蒙疆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伪“蒙疆”最高司令官畏罪自杀，伪警察队800余人缴械投降。同时，晋察冀军区部队占领了张家口以东铁路线上的龙烟铁矿、下花园发电厂和怀来、土木、沙城火车站，解放了多伦、康保、宝源、化德、察哈尔盟、锡林郭盟等。

《张垣日报》创刊 8月25日，中共冀察区党委创办的《张垣日报》在张家口创刊。

冀中部队收复大量城镇 8月下旬，冀中第八、十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首先攻克霸县和永清县城，接着收复了牛坨镇、安次、容城和旧州镇、礼贤镇。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一部在天津南拔除了小站、咸水站、葛沽等重要据点19处；另一部围攻天津西面的王庆坨，迫使500多名伪军投降。第七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向蠡县、博野一带的敌人展开进攻，收复了蠡县、博野、安国、安新等县城。第六军分区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向深县、赵县、宁晋等地进攻，攻克了深县城、西杨台、魏家桥、高占庄等据点，接着收复了赵县、宁晋、晋县等城以及辛集镇、辛安车站等据点。

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移驻张家口 9月14日，晋察冀中央局、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同时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成立 8月29日，张家口市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任命张孟旭为市长。

收复山海关 8月31日，我冀热辽军区部队攻克山海关，与苏联红军会合后，迅速向锦州、沈阳地区挺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2日，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八年抗战中的重大贡献 当日本政府签字投降时，晋察冀军区部队业已控制了察哈尔、热河两省全部，河北省大部和山西、辽宁两省各一部。晋察冀解放区已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和东北区联成一片。全边区共产党员已发展到22万人，主力部队发展至30余万人。八年来，晋察冀我军与敌作战28221次，共歼日伪军30.6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220门、掷弹筒860个、轻重机枪1935挺、各种枪11.33万支、各种炮弹（包括掷弹筒弹）4.33万发、各种子弹474万余发、手榴弹12.1万多个。

（肖一平 施友松执笔）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籍贯概览

李 伟

编者按：本辑选登一份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籍贯概览》统计资料，以引起人们从多渠道研究党史和注意对人才学的探讨。

1955年9月至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在此期间，授衔的元帅和将军数目分别为：元帅10位，大将10位、上将57位、中将177位、少将1360位，^① 将帅共计1614位。现将他们的籍贯列表如下。

将 帅 籍 贯 情 况 表^②

省 份	元 帅	大 将	上 将	中 将	少 将	合 计	涉 及 市 县
江西省			3	38	284	325	43
湖北省	1	2	14	31	187	235	32
湖南省	3	6	19	45	129	202	47
安徽省			2	12	113	127	22
河南省			1	9	97	107	37
四川省	4	1	3	3	89	100	38
山东省				3	85	88	44
福建省			3	9	71	83	17
河北省				2	77	79	50

省 份	元帅	大将	上将	中将	少将	合计	涉及 市县
陕西省			3	5	55	63	37
山西省	1		2	1	41	45	27
辽宁省			2	1	29	32	17
广西壮族 自治区			2	4	12	18	13
江苏省				1	16	17	14
广东省	1			4	11	16	12
浙江省					15	15	13
甘肃省					8	8	8
海南省		1	1	2	3	7	5
北京市				1	5	6	2
云南省				2	3	5	4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	4	5	4
黑龙江省					5	5	3
内蒙古自 治区			1		3	4	4
西藏自治 区				2	2	4	1
吉林省					4	4	4
天津市					4	4	2
上海市					3	3	3
贵州省			1		1	2	2
宁夏回族 自治区				1		1	1

- (1) 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一书的“出版说明”中，少将数为1359位。这可能是将补在第二集最后的李健同志疏漏，未计在内。
- (2) 有三位少将（周发田、黄德魁、张向善）的籍贯，目前尚未查实。

有 5 位以上将军市县表

市 县	人 数	市 县	人 数
湖北省红安县	61	江西省瑞金县	12
江西省兴国县	54	四川省通江县	10
安徽省金寨县	54	湖北省阳新县	9
湖南省平江县	52	江西省永丰县	9
江西省吉安县	46	四川省巴中县	9
江西省永新县	41	四川省阆中县	9
湖北省大悟县	37	湖南省长沙市	8
河南省新 县	36	湖北省孝感市	8
安徽省六安县	34	江西省赣 县	8
湖南省浏阳县	30	湖北省石首市	8
福建省上杭县	27	湖北省仙桃市	8
湖北省麻城市	26	四川省宣汉县	8
湖南省茶陵县	25	四川省苍溪县	8
江西省吉水县	18	山东省寿光县	8
江西省泰和县	17	湖南省湘潭县	7
江西省于都县	16	湖南省醴陵市	7
江西省宁都县	14	陕西省子长县	7
福建省永定县	14	江西省万安县	7
湖北省天门市	14	河南省光山县	7
湖北省黄陂县	13	四川省平昌县	7
福建省长汀县	13	江西省安福县	7
河南省商城县	13	福建省龙岩市	6
江西省莲花县	13	湖南省耒阳市	6
四川省达 县	12	江西省南康县	6
安徽省霍丘县	12	湖南省湘乡市	5

(续表)

市 县	人 数	市 县	人 数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	5	河南省固始县	5
福建省武平县	5	湖北省汉川县	5
湖北省荆门市	5	江西省信丰县	5
辽宁省海城市	5	江西省萍乡市	5
江西省万载县	5	山西省定襄县	5
湖北省武穴市	5	山东省文登县	5

将帅籍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含新设立的海南省）中，仅没有青海省和台湾省。

从民族来看，其中汉族1579位，少数民族34位。少数民族中，壮族11位，他们是：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冼恒汉，少将韦祖珍、卢绍武、朱鹤云、吴西、覃士冕、覃国翰、黄惠良；蒙古族5位，他们是：上将乌兰夫，少将孔飞、索立波、廷懋、吴涛；藏族5位，他们是：中将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少将黄正清、桑颇·才旺仁增、凯墨·索南旺堆；满族4位，他们是：中将万毅，少将赵承金、郭维城、白志文；维吾尔族4位，他们是：中将赛福鼎·艾则孜，少将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曹达诺夫·扎依尔、祖农·太也夫；回族2位，他们是：少将刘世昌、刘瑞方；土家族2位，他们是：中将廖汉生，少将彭飞；塔塔尔族1位，少将马尔果夫·伊斯哈克夫。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京族1位，少将洪水。

从将帅的斗争经历看，参加过创建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战争的将帅约占总数的76.1%。其中，出自红一方面军的将帅约占总数的33.8%，他们中大多数是江西、福建、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省籍的人；出自红四方面军（含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的将帅约占总数的23.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省籍的人；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将帅约占总数的10.3%，他们中大多数是湖北、湖南及江西省籍的人；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将帅约5.6%；其他还有出自陕北红军、海南省琼崖等地的将军。“一·二·九”运动前后参加革命的将军，约占总数的16.7%，他们中大多数是山东、河北、山西、辽宁等省籍的人，而且绝大多数为少将。

统计表中，市县的称谓和区划根据国务院1987年底批准的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为准，如湖北省原沔阳县撤销，设仙桃市；广济县撤销，设武穴市。县级行政区划中含市级行政区，或县、市二者同名的，统计中县市名称取其一，如江西省吉安县和吉安市，一并统计在吉安县中；湖南省长沙市和长沙县，一并统计在长沙市中，等等。